
蘇軾研究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55 期）

（季 刊）

卷首语

欧阳修晚年将文坛后事托付苏轼，苏轼 50 岁时也将文坛后事托付给门下学士，他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说：“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张耒）等数人耳。”希望他们共同肩负起提携后辈、培养人才、振兴文坛的使命。

文脉的传承正赖于此，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土的无私、宽宏和努力，文化的河流才能成磅礴之势，一往无前，奔流不息。

9 月 29 日眉山，举办 2018 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收到相关论文 88 篇 80 多万字，100 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以“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为主题展开讨论。本期杂志选取了其中的部分精彩内容，如周裕锴《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唐凯琳《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里的苏轼》等相关的论文与您共享。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55 期）

（季 刊）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周裕锴

□副 主 编：潘殊闲 方永江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
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 年 12 月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 方永江/04

见证苏学“千树万树梨花开” 蒋 萍 熊 莉/07

□特 稿

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 周裕锴/08

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里的“苏轼” 唐凯琳/10

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 衣若芬/12

把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 冷成金/14

□苏学论坛

苏轼涉鼠作品对越南的影响（节选） 张思齐/17

英语世界中苏东坡研究再探 何勤华 汪 单/25

和坡词：无咎酷肖东坡词的初度研判 李 静/32

从学文到学人的转变：晁补之对苏轼的服膺 孙赫男/36

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探析 卓夕又/40

□顾问：慕新海 罗佳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张志烈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朱 刚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 鸣
张海鸥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卢晓光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西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宋元时代的木假山诗文 张 淘/45
论南宋古文选家对苏轼文章的
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杨 曦/53

□诗文鉴赏

苏轼禅诗赏析十题 （二） 周裕锴/61

□新书评介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张志烈/65
——熊朝东《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序

□研究史话

“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六） 舒大刚/70
——历代对苏轼《易传》、《书传》、《论语说》的研究

□苏学专家

王晋川印象 山流水/73

□景苏札记

清辉几缕照客眠 杨 惠/75

□本期关注

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综述 刘清泉/77

□苏学动态

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召开 有余/79
第23届苏轼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秘书处/80
2018年发展会员名单 秘书处/80

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

方永江

自南宋学者李涂在《文章精义》中首倡：“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至清朝杨毓辉在《郑观应〈盛世危言〉跋》中为之张目：“观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直兼乎韩潮苏海，则不啻读《经世文编》焉。”“韩潮苏海”成为文艺评论史上的定论，气势磅礴、汪洋恣肆则引为苏轼文章风格的特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开放包容，是大海的属性，亦是苏轼、苏轼研究的品格。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学会历届领导都在践行：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凡是热爱苏轼、关心苏轼研究的，都可以加入进来。所以，会员才能由最初的 81 人发展到目前的 350 余人，召开了全国性、国际性苏轼学术研讨会 30 余次，出版了以《三苏全书》、《苏轼全集校注》等为代表的著述，渐呈浩瀚气象。

一、开放合作形成合力之美

眉山生三苏，草木自葱茏。开放发展的眉山向远方的朋友有一个恒久而走心的邀约——从苏祠出发，从全世界回来。

（一）合作理念深入人心

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发布《眉山宣言》，确立了“合作发展，和谐共进”的主题。宣示：围绕主题我们将继承好、保护好、弘扬好东坡文化，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弘扬中继承，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永葆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要定期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东坡文化学术研讨活动，不断增强东坡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将加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俟后，眉山学者在“全国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上发表《苏轼遗址缔结文化旅游联盟的战略构想》，科学论证了缔结文化旅游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阐释了文化旅游联盟的发展路径选择；成立专门职能机构，精心编制详规；探索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对联盟内市民实行同等居民待遇，免费开放各自苏轼文化景园、景区；在文化旅游产品和产业中，更多地注入

东坡文化元素。在此基础上，立足苏轼研究为苏轼遗址地的文化发展、文化繁荣、资源整合、品牌提升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实际，深入开展“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诠释了合作应当遵循“平等-首席”、“合作-博弈”的原则，提出了“采取倡议、协议、主导的合作关系，采用研究、传播、应用的合作方式，选择多边、双边、区域的合作途径，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主体”五大理念，使开放合作有了更加明晰的思路。

秉承这些理念，今年 9 月，在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强力推进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的重要节点，眉山成功举办了以“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为主题的 2018 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

苏轼研究开放合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主导合作有声有色

眉山是东坡故里，是苏轼文化的发源地、发祥地。学会地处眉山自当主动扛起苏轼研究的大旗，发挥纽带桥梁作用。依托高校、整合地方，切实落实市委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学术活动“请进来”、“走出去”要求，充分发挥学会组织、协调、主导作用，形成了强大活力，一批重大学术活动有声有色开展。

“请进来”，开放的眉山喜迎嘉宾。眉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联合主办了两次学术会议，即 2017 年 11 月 22-26 日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和 2018 年 9 月 28-30 日 2018 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均出版了主题突出、观念新颖、价值丰厚的《论文集》。

“走出去”，合作的眉山广交朋友。学会还参与苏轼相关的考察、纪念、学术交流等活动，今年相继参加了上海诗歌节并作主旨发言《苏轼文艺创作的时代价值》；四川大学“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暨版权捐赠仪式；眉山市与四川大学“东坡书院”筹备组赴贵阳、湖南、山东考察学习。

特别加强了与苏轼遗址地的合作交流。与平顶山学院共同主办纪念苏轼葬郾 915 周年暨全国第 21 届苏轼学术会议；与海南大学共同主

办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会暨全国第22届苏轼学术会议。参加广东省苏轼研究会成立一周年学术报告会议暨东坡文化学术论坛；参加石家庄市栾城区纪念苏味道诞辰1370周年活动暨栾城三苏祖籍文化研讨会；参加海南省话剧《苏东坡》海口巡演活动；参加海南省儋州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东坡文化研讨会。

在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会建设推进工作中，完成了四川省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人学术读本《苏轼》的撰写；撰写了传记读本《苏轼》，并资助了川大在读博士研究生陆雪卉出版《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心路依归研究》（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资助学会理事、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副教授胡先酉出版《龙川略志译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三）部门协作多姿多彩

2017年至今，学会相继与眉山市纪委合作研究东坡清廉思想；与眉山市教体局、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研究东坡教育思想；与眉山市地方志办合作研究地方名人文化；与四川工商学院合作研究东坡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联性研究；与税务部门合作研究苏轼税收思想；与市委党校开展筹办东坡干部学院等。

校地合作成绩斐然。我们联手乐山师范学院立足眉山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千湖之城”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苏轼理水遗迹、思想始基、意象谱系深入研究，最终完成了材料丰富、题旨鲜明、文辞雅致、论证充分的《东坡西湖研究》（专著）。由于其融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一体，在东坡文化的普及和生态文明中国的建设中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四）沙龙活动渐入佳境

学会注重开放性研究。研究工作不限于眉山，聚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力量，包括发挥市民的作用，组织文化沙龙。每年端午、中秋，我们都会举办群众性文化沙龙，“苏轼与美好女性”、“苏轼与经典诵读”等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研究活动，令人回味无穷。今年我们又成功举办了端午“品荔枝”、中秋“赏秋月”苏轼文化沙龙活动。由于受众广、反响好，被市委确定为重要会节活动。

二、创新发展锻造活力之魂

创新是民族进步、国家强盛的不竭动力，也是苏轼研究的活水源头、活力之魂。

（一）组织机构的创新

经四川大学、省社科联同意，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回迁眉山，市委随之成立三苏文化研究

院作为学会的办事机构（秘书处），用党政的力量推动苏轼研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我省乃至全国的首创，被学界称为“眉山模式”。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下，苏轼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眉山模式”：研究院既是市委的一个职能部门，又是学会的办事机构；周裕锴先生既是学会会长又是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主任，可以有效地对接川大、整合资源。在四川历史名人工程和眉山“七个一”工程实施中，我们完全可以率先建成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会和中心。

我们又在学会下设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把全国近百所东坡学校联系起来，共同开展东坡文化校园普及活动。并于2017年11月成功召开了全国第四届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交流活动暨“传承东坡文化，提升教育品质”眉山论坛，发布了全国东坡学校《眉山宣言》，定期进行校际交流与学习，营造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让东坡文化根植于中华大地，让“乐学、创新、仁爱、清正”的东坡精神，滋润学生心田。

（二）普及方法的创新

我们与《眉山日报》合作，专门开辟“文化传承”专栏，定期推出“探秘苏东坡”、“苏东坡粉丝”系列报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在竭力办好《苏轼研究》会刊的同时，及时推出苏轼研究公众号、苏轼研究微信群，以苏轼+的模式共建传播平台。同时，我们加强了与其他名人研究会的互动，参加了四川省李冰、扬雄研究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研讨会；参加了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学术论坛征文专家评审会和学术论坛。

2017年9月，又与东坡区教体局合作，开展“东坡文化讲师团培训班”活动。这个为期2年的活动，旨在通过课堂学习、现场学习、体验学习等方式，使讲师团学员会作指导、会搞活动、会作讲座，使其成为传承东坡文化的骨干力量，进而引导整个系统乃至社会大众大力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愿景。截止目前，刘小川、王晋川、刘川眉、刘清泉等为学员们进行了数十场东坡文化专题讲座，围绕三苏生平、作品和思想进行讲解，毫无保留地将他们自己的三苏文化研究成果分享给他们；已有15位学员作了实习演讲，社会反响非常不错。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将努力把讲师团培育这个“从专家到学员、从学员到大众”立体式弘扬东坡精神的活动，办成传承东坡文

化的品牌，让东坡文化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苏轼文化联通世界，音乐点亮美好生活。市委、市政府去年和今年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与四川音乐周结合起来，用广大青年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弘扬东坡文化，创新了苏轼研究普及的形式，拓展了苏轼研究普及的渠道，昭示着苏轼研究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三）服务功能的拓展

我们牢固树立“两个服务”意识（苏轼研究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于苏轼研究学者和广大爱好者），较好地发挥了智库作用。近一年来，我们在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注入东坡文化元素方面，紧紧抓住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的契机，不断拓展社科研究服务大局的功能。重大文化项目提前介入、主动介入。我们依托高校、特约研究员构成的人才优势，先期进行文化论证，使文化项目不走弯路、少走弯路；项目进行中，全程实施文化策划；竣工后，组织专家团队对文化转换项目进行验收。相继成功开展了东坡城市湿地公园亲水平台和苏母公园的文化策划。眉山三苏镇、徐州利国镇、黄冈黄州区等相关文化工程建设指挥部门主动要求与我们合作，实现了“有为有位”的价值追求。

这些活动的开展，苏轼研究充满活力和生机，不仅在眉山、四川，以及苏轼遗址地形成蓬勃发展之势，而且影响延伸到了“北上广深”这些看似与苏轼没有直接关联的城市和这些城市的高校。

（四）国际视野的确立

眉山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突出强调的就是国际性：精品博物馆，成为全世界“苏迷”的“朝圣地”；研讨会，开成国际性的盛会；高层次人才培养，把眉山打造成全球苏学研究高地……为了加快苏轼研究中心、资料中心、交流中心国际性建设，9月14-16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精心筹备、周密谋划，在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东亚汉文化圈中的苏轼研究学术论坛”，海内外苏轼研究学者积极参与。

眉山更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成功举办两次东坡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苏轼研究学者接踵而至。特别是首次请来了法国《世界报》记者皮埃尔，他《千年英雄苏东坡》的主题发言，带来了“千年英雄”的深情回眸，解密了苏轼入选世界十二位千年英雄的林林总总。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衣若芬作了《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的主题演讲。他们的演讲，深刻地揭示了苏轼的代表性、影响力和国际性。

9月29日，周裕锴先生作了《东坡精神的当代价值》主旨演讲后，第二天即赴莫斯科参加9月30日至10月6日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办的“中俄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发表的《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的报告，引起俄罗斯学者的极大兴趣，展示了苏轼研究的实力，开启了世界了解眉山的又一扇窗口。而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君恒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唐凯琳因缘际会，更是传为学界佳话。孙先生在美国探亲期间，写下了苏轼在美国研究和传播综述，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唐凯琳。不久，唐女士即应邀飞赴眉山参加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作了《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里的“苏轼”》的主题演讲。她特别指出，眉山创办的《苏轼研究》是该数据库中最重要中文专题学报。

这些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扩大了眉山苏轼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眉山苏轼研究的整体水平，发挥了引领国内外苏轼研究的示范效应。

开放合作、创新发展，苏轼研究走向国际化。

党的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苏轼研究也不例外。她之所以能开创今天的繁荣兴盛局面，我们有如下启示：

各级党政精心呵护、主管部门倾心支持、友好协会无私帮扶。市委、市政府人、财、物充分保障，为秘书处广泛开展“请进来”、“走出去”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能在把苏东坡“拍出来”、把眉山“拍出去”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为三苏研究（创作）成果的不断涌现、有效转化搭建了平台，为在三苏文化重大项目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机遇。

老一辈学人率先垂范。耄耋之年的刘尚荣、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诸先生，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只要身体允许，苏轼研究的每一项活动，总是不辞辛苦，千里万里奔赴而来。21人的特约研究员队伍，既是苏轼研究的探路人、先锋队、引领者，又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智囊团”、“人才库”，更是苏轼研究出人才出成果的传道者、授业师、解惑人。他们的标杆作用，使苏研群体具备了超强的辐射功能。

中青年学者勇于担当。年富力强的学者不是学校、单位的领导，就是业务骨干，教学、科研任务十分繁重，但凡眉山有邀约，总是积极主动参加，并且对年轻学子悉心指导、热情提携，倾注了大量心血。

（下转第 16 页）

见证苏学“千树万树梨花开”

——专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方永江

蒋萍 熊莉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出于对三苏父子由衷的景仰和喜爱，因缘巧合，当市委常会议定成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的时候，我便积极投身到筹建、挂牌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由四川大学回迁眉山挂靠该院的系列工作中，充分感受到了该院得到各级党政部门倾心支持、业务主管单位精心呵护、各兄弟协会无私帮助的全过程，十分幸运地见证了全国苏轼研究组织由“一枝独秀”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繁华景象。不知不觉间十年过去了，回想创业之初，老领导的叮咛历历在目，他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好好干，不要挂牌之日就是死亡之时。”许是类似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他才有这样的忧虑与感慨。而我肩头的压力陡增：组织、同仁、群众都在看，怎么干？干成什么样？

我涉足“苏海”，首先感受到了同仁创业的艰辛，也分享了他们丰收的喜悦。中国苏轼研究学会1980年在当时的眉山县成立，如算上前期的酝酿、筹备，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它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壮大。40年来，会员从最初的81人发展到今天的350余人；会刊《苏轼研究》从无到有，已出版55期，免费赠送苏学专家、各大专院校、社科研究机构；召开年会、专题论坛、研讨会50余次。数字是枯燥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从中看到，几代人步履维艰的跋涉，薪尽火传的接力，汗牛充栋的累积。当我接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时，也才深刻地感到，“我们都是替苏轼（三苏）跑腿的”，这份披肝沥胆的托付和义无反顾的许诺，是多么的沉甸甸。

老一辈学人的率先垂范，是苏研征程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抱定“两个服务”意识，即“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苏学专家学者和广大爱好者”，甘于清贫，艰苦创业，在前辈时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基础上，潜心耕耘，期待花开。眉山是东坡故里，是东坡

文化的发源地、发祥地，我们义不容辞扛起传承发展东坡文化的大旗。

“从苏祠出发，从全世界回来”，我们把“合作发展，和谐共进”的种子撒播开去，在东坡遗址地、在景苏仰苏的人们心头散枝开叶。自2008年3月起，指导徐州、黄冈、儋州、定州、石家庄、诸城、海南省、广东省、河北省等全国东坡遗址地成立县、市、省级苏轼学会，使苏轼研究的专门机构由过去的6个发展到现在的15个。我们又分别在2009年、2010年成功举办首届全国苏洵、苏辙学术研讨会，受到苏学专家学者、海内外苏氏宗亲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市委强力推进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成功举办了以“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2017）首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和以“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为主题的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更是将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的东坡文化繁荣兴盛之路演绎得美仑美奂，苏轼研究走向国际化。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文化与产业创意》等学术专著相继荣获省政府三等奖和市政府特等奖；学会连年被主管部门表彰为先进学会，会刊多次获评优秀期刊，我也被授予四川省先进社科工作者称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替苏轼（三苏）跑腿”，这是身份定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这是行为准则；把眉山打造成全球东坡文化研究高地，这是毕生追求。在迎来改革开放40年伟大时刻，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努力扮演好苏轼研究服务生的角色，推动苏轼研究满山梨花开遍。

蒋萍、熊莉，东坡文化网记者。

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

周裕锴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来参会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朋友们，对眉山市领导和人民的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们，共同汇聚苏东坡的家乡眉山，一起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发掘、理解和诠释东坡留下的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东坡的文化精神，这是眉山文化界的一件盛事。能参加此盛会并作大会发言，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早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诗文集就被刊刻印行，不仅在宋王朝辖境里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通过契丹、高丽的使者商人购买盗版，流入邻邦的书肆。九百多年来，他的影响不仅跨越宋元明清各朝各代，而且流传到海外汉文化圈，朝鲜、日本、越南，甚至欧美各国。我的老朋友唐凯琳女士，就是东坡的超级粉丝。三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四川大学求学时，她的博士论文就以东坡为题，名为《贬谪与回归》。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是东坡的粉丝。那么作为东坡的粉丝，我们究竟能从东坡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以成就我们当今的生活与工作呢？换句话说，东坡的文化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今，对于我们的社会政治、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呢？以下我简单谈谈自己阅读研究东坡的一些心得，以与大家一道分享。

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讲过“苏东坡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大概讲了六点：

第一点是温和的改革。东坡的政治哲学是“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主张政策的连续性。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三大治国原则。“结人心”就是要使朝廷政府所作所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厚风俗”就是要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安定的社会；“存纪纲”主张朝廷应保持台谏（御史台、谏院）机制，台谏遵从天下公议，对宰相权力起制衡作用，可遏制官员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

第二点是思想的包容。他反对儒家和佛家

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东坡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东西其中都含有合理的成分，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东坡认为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好使人同己，王氏的新法以“三经新义”取士，使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形成文化上荒凉贫瘠的盐碱地。

第三点是人性的尊严。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东坡的影响非常大。东坡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什么叫做道义？要看君王的行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益处。如果君王明明做了错事，还支持君王，这就和一个士大夫的道义责任截然相反。东坡认为士大夫如果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就会变得非常卑贱，这是他所鄙弃的。

第四点是超然的审美。东坡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

第五点是潇洒的人生。林语堂把东坡称为“快乐天才”，其实，东坡一生不仅经过很多波折，而且也充满痛苦，但是他展现出来的人格却是乐观旷达。在海南，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东坡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东坡敢于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

第六点是智慧的观照。东坡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东坡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东坡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又比如《赤壁赋》里的思想来自《楞严经》以及僧肇的《物不迁论》。

今天我还想补充几点东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是实干的精神。东坡长期担任地方官，做过很多有益民生的功绩，在杭州、密州，他都曾率领官员亲自参加捕捉蝗虫的工作。在徐州，面临黄河泛滥造成的洪灾，他率领军民奋战城头，战胜洪灾，得到神宗皇帝的奖励。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苏堤。在颍州，他赈济灾民，捕杀盗贼，保一方平安。关于东坡的政绩，大家耳熟能详。我认为特别对我们当今地方官员有启示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他在知颍州期间，详细考察地形，搜集数据，体恤民情，反复论证，作《申省论开八丈沟利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上书哲宗，最终阻止了开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巨大工程。这是东坡对我们的启示之一。也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员，不仅要勤政，而且要有实际调查和科学依据，切不可脑门一拍定下工程，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造福于民。

二是亲和的人性。东坡虽然是大才子、大文豪，又是守土一方的地方大员，但是却没有官架子。在徐州时，他到石潭去谢雨，途中写下五首《浣溪沙》，记录所见所想。词中最能表现他的亲民情怀，“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向当地百姓讨一碗茶喝。“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百姓中的一员，农村就是自己的家乡。最能体现东坡受欢迎的是这几句词：“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萼罗裙。”一

群淳朴羞涩的农村姑娘，都是东坡的粉丝，知道东坡经过村落，立马打扮一番，挤来推去，都想一睹使君风采。这个画面的确非常动人。

由此我们想到第三个方面，对女性的尊重。东坡一生中遇到三个生命的伴侣，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对此三个女性他都充满尊重的情感，他为王弗写下感人的悼亡词《江城子》，为王闰之作《释迦文佛颂》《阿弥陀佛赞》，为王朝云作诗词若干首，又亲自为王弗和朝云作墓志铭，真是有情有义的大丈夫。东坡还为自己的乳母任氏作墓志铭。之所以说这是对女性的尊重，是因为东坡一生最不愿意为他人作墓志铭，有达官贵人来请求，他都会拒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东坡却能遵从自己的人性，为女性人物在他的诗文词作品里保留一席之地。所以，在东坡的粉丝里，历代都有不少女性粉丝，比如今天发言的学者代表中，就有唐凯琳和衣若芬两位女士，她们对东坡的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令人钦佩。现代社会应是男女平等的社会，时至今日，仍有歧视妇女的现象存在，社会呼唤东坡这样的千年男神，保持对女性应有的尊重。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关于评东坡为“千年英雄”这一事件的理解。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前后的世界伟人），全球共有12位，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该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在2017年11月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苏东坡能入选千年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颗自由的灵魂。（He has a free spirit.）”在这里，我想引用同样是来自法国的作家罗曼·罗兰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要说，东坡就是这样的英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何等的自信！我们今天来纪念苏东坡，就是要学习他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谢谢大家！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里的“苏轼”

唐凯琳

中国学者把苏轼看作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希望不仅中国，而且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能认知苏轼，欣赏他的作品，了解他在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除了少数汉学家和诗歌爱好者以外，大都还不能详细了解苏轼如何的伟大，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还缺乏应有的了解。如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目的之一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苏轼的为人，知道他生活的意义、作品的价值、思想的影响，及其在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就需要在海外寻找介绍苏轼推广东坡文化的平台，欢迎与海外学者合作，共同探讨怎样更好地让世人知道苏轼是中外文化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多产全能的奇人，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所幸的是有一个网址可能会满足这种愿望，至少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给全世界的读者作参考。这个网址就是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 OXFORD Digital Bibliographies。英国牛津是一个范围广泛、题目众多的网页，它包括了古代、近代史、哲学、宗教、文艺、思想史、地理、科学、医学、传统、近代社会问题、世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介绍等题目。所有的题目都有书目和提要。

在这个网站里最近出现了“Su Shi”书目题目。这个题目总共有十二个专栏和 170 条提要，专门介绍有关苏轼的生平与作品。这些提要都是我和一位同事 Benjamin Ridgeway 撰写的，介绍了有关苏轼编撰的书籍和论文。虽然主体部分、介绍和提要都是用英文写的，但搜集了有关苏轼的各种语言的图书、论文和资料。英文的书籍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中文书籍也比较多。此举对于推动苏轼研究、推广东坡文化、让苏轼得到更多人的认知和肯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英国牛津管理人找我撰写苏轼题目时，我和同事都乐意承担这个责任。作为美国汉学家苏轼爱好者，都觉得很荣幸。我们先定下大题，选择专著，然后确定小题的内容，介绍评析入选的作品，一直跟编辑密切合作，遵循他

的种种限制，终于在 2017 年英国牛津网页上出现了“Su Shi”这个独特的栏目。

英国牛津网页都有一定的结构。先有概括介绍，然后有大题目。大题下面有介绍入选书目的题目。最后有专书和论文的提要。“Su Shi”这个题目有十二个题目。目录管理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十二个题目里，只能在下面写八个提要。管理人希望读者都能点一下，数字化的功能可以让读者马上看所找的题目了。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网址的特点。网站内容总共十二个专栏，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每个专栏的介绍是英文的。概括得比较有说服力，引起读者兴趣，希望他们通读全部内容。但是知道读者很快地就会点一下，看一小部分。

关于苏轼的十二个题目。这十二个栏目里的书有一些是西方学者的专著，也显示了美国学者对苏轼的兴趣和研究。但最明显是，中国学者的专著、文章和作品赏析很多，这是中国学者对全世界研究者的贡献。

第一、第二部分是传统的年谱与现代人写的苏轼传记。不少苏轼研究会的学者在这个题目上贡献显著。虽然还是有人喜欢读林语堂写的很流行的英文本《乐天知命的天才：苏东坡》，但必须要承认中国学者撰写的传记可能更为可靠。美国教授艾朗若（Ronald Egan）写的英文书也都用了可信的资料。

第三部分是苏轼的原作，包括诗、词、文。首先有一个栏目解释苏轼著作的版本。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课题，而且对研究者要求很高，却是一个必然的部分。学者必须了解作品的来源才能解释研究苏轼的文、诗、词的专著和文章的可靠性。这部分一共有 26 位中国学者的大作以及提要。

西方各种语言的翻译是第四部分，但这些书不多。常选的作品是中国学者已经介绍分析过的。到目前还没有人或组织试图翻译苏轼的三千多首诗词，因此西方学者要在文章里引用苏轼的文与诗词必须自己翻译。

第五部分的题目要介绍参考书和网页上的

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数据库有西方学者的《宋代人传记》和宋代书目。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CHGIS)数据库比较好用,还有中国历史人物(CBDB)人名库。读者都能查到所要找的人或地方。另外有中国学者的《唐宋文诗资料库》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源。除了《苏轼研究史》一本中文书以外,还有韩国、日本和美国学者介绍和分析作品的目录。

第六部分的提要包括学报、杂志和会议论文集。眉山的《苏轼研究》就是最重要的中文专题学报。学术讨论会后编的书有很多值得参考,学者发表的文章有不少新的观点或引起读者讨论的论题。西方学报偶尔才涉及到苏轼的传记和作品,但是所发表的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哈佛大学东亚学学报》有一篇分析朱熹对宋代诗词的评价就涉及到苏轼的文艺理论和诗歌的风格。

遗憾的是介绍学术会后编的论文被限制在八项。因此中国开过的苏轼研讨会,只能介绍一小部分。要是有人查英国牛津苏轼目录,就会知道苏轼研讨会经常开,他们可能会有兴趣来参加。

最有学术价值的是第七部分: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苏轼作品的分析与评论,一共有20多个提要。还有八个提要专门谈苏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影响。这些都值得看,但是提要都很短。如果了解介绍分析论文的目的和目录提要目标的不同,就可以进行比较。提要都很简略,有一定的限制,分析欣赏反而比较自由。要是仔细读我2001年写的《“散为百东坡”——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的论文,这种差异就很明显。比如,西方研究苏轼学者,像艾朗若、包弼德(Peter Bol)、管佩达(Beata Grant)、傅君励(Michael Fuller)和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等都写过影响比较大的图书。虽然两种解释提到的书和文章差不多,我的论文的解释长而仔细,没受任何限制,而书目提要都很简单,没有像论文里的描绘和分析那样丰富。把艾朗若的书作为例子。他的《苏轼生活中的言语、行为意象》有几页长的解释。包弼德的大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也一样,需要长些的解释。好在他的书早就有中文翻译本。关于这些人的书,提要可能应该把英文原作和中文翻译都解释。

第八部分包括苏轼的书法、绘画和画上的诗词,提要部分罗列了十五个人的解释与分析。刚好英国牛津网站另一个目录里有一个专题——中国书法。题目是美国学者 Amy

McNair 编的,有不少有关苏轼的作品和理论。Ben Ridgeway 对苏轼书法和绘画特别感兴趣,这部分是他来写的。值得一提的是,姜斐德女士最近在纽约美术馆给听众讲了些有关苏轼的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问题。

第九部分是有关苏轼对儒释道的思想和观点。有中国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和争论。可惜这个部分也被限制在八个人的大作,要不然会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书评可谈。西方学者管佩达认为佛教对苏轼一生影响最大,作品里所反映的思想很明显。包弼德与很多中国学者还是认为儒家是他最基本的思想。虽然没有英文专著强调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大,但有美国学者从苏轼的大自然观来分析苏轼的思想和作品。

第十部分是中国学者贡献最大的部分,题目是“三苏”。所选的书和文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谈苏洵、苏轼和苏辙的作品、思想和经验所不同的原因,他们彼此影响的方式,以及苏轼在三苏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作用。关于三苏的题目都由我来写。三苏之间的关系是个重要话题。这点因为早就受了四川大学和眉山博物馆老师的影响,我就愿意负责这部分的提要。在美国汉学会上我曾经介绍过三苏,尤其想让听众了解苏辙在宋代历史上和对苏家的特殊贡献。

第十一部分主要是说明苏轼的作品在后人所看的资料中有什么值得注意。另一方面是把他和其他人做比较,目前只选了陶渊明和白居易两个有名的诗人。西方学者已发表过几篇谈苏轼和陶渊明的关系,也把全部有关的诗词翻译成英文了。

最后部分提到了苏轼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什么人,人们是怎么认识他的。中国最近几年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对苏轼有新的阐释,这些新的方式有助于当代人对苏轼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他不但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也是一个有很多现代元素的人。他的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在当代产生共鸣。

今后我们该用哪种方式来确保英国牛津网页“苏轼”每年都有专著、论文更新?怎样选择在中国出版五六本新书或发表的几篇论文要求又有分量又有学术价值呢?这就需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和各位专家学者的推荐、举荐,再通过我和同事转达英国牛津“苏轼”网页,这必将有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有助于苏轼研究走向世界,有助于海内外更多学者认识苏轼、了解他的重要性。

(下转第16页)

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

衣若芬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是衣若芬，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同时也是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的特邀专栏作家。很荣幸受邀来到眉山参与今天的盛会，和大家分享我写作、研究和教学东坡艺文的心得。

这是我第五次到眉山。我不但是仰慕、热爱东坡的粉丝，简称“东粉”，还是依靠东坡的作品“谋生”的受惠者。我的博士论文《苏轼题画文学研究》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1997年，我第一次参加海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就在眉山。那时，我认识了许多研究东坡的专家，其中，鼓励和启发我最深的是曾枣庄教授。后来，曾教授给我机会，参与撰写史上第一部全面考察世界东坡研究情形的书《苏轼研究史》，在座的唐凯琳教授负责美国的部分；我负责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坡书法、绘画的研究史。《苏轼研究史》荣获2003年四川省政府优秀学术著作奖，我也沾光，收到了生平第一张大陆颁发的学术研究奖状。

出版《苏轼研究史》同年，我出版了继《苏轼题画文学研究》之后的第二本东坡研究专著，书名是《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我获得奖助，经曾枣庄教授推荐，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这是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大陆的学术前辈和读者朋友认识我，大部分是由于《苏轼研究史》和《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这些都拜曾枣庄教授之赐，在此我要献上最深的谢意！

明年春天，我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研究东坡书法的著作，书名是《书艺东坡》。《书艺东坡》收录了我研究东坡《黄州寒食帖》在内的十篇文章，其中一篇《苏轼书画研究史略》，就是补充修订了我合作撰写《苏轼研究史》的内容。

2006年我从原来工作的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转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且在来年开始成为《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我笔下的苏东坡，开始面向更广大的普通读者，他们记忆里的苏东坡，说起了不同的中国方言。

有一位新加坡朋友，听闻我研究苏东坡，很激动地告诉我：“我和苏东坡有一段不解的缘分！”

我以为她要说她和苏东坡绵长而遥远的亲戚关系。南洋此地，卧虎藏龙，未必不可能有名人后代。

她睁着一双几乎要流出泪水的眼睛，问我：“那篇文章你熟吗？说‘羽化登仙’的那篇。”

我说：“是《赤壁赋》。”

她马上点点头，说：“对！对！就是讲赤壁的！”

我看着她，她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

她说：“我的父亲，临终前，就是听着苏东坡的《赤壁赋》去世的。”她的父亲青少年时从广东下南洋，在南洋经商谋生，好几位姑姑也相继来到南洋，都在南洋受洗，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说：“我父亲不像姑姑们那么信教，他去世之前，心情很混乱。”一位姑姑来看父亲，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拉着父亲的手，安慰他，说着生死的话题。父亲还是充满疲惫和恐惧。

姑姑说：“我念《圣经》给你听，你闭眼听吧！”

父亲摇头，不想听《圣经》。

父亲就要离去，周围的人都有心理准备了。

大家看着父亲，他像在做无力挣扎。

姑姑说：“我背苏东坡的文章好不好？”

父亲闭上了眼睛。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姑姑用潮州话念诵着，一手牵着父亲，一手轻拍他的手背。

抑扬顿挫，行云流水，父亲在苏东坡的文章里长眠了。潮州话的《赤壁赋》，陪着她的父亲走到另一个世界。

我在大学开授苏东坡诗词的课。刚上课时，说到苏东坡，学生们有的会吃吃地笑，我觉得很奇怪，我说错了什么吗？原来，Sotong在马来语是墨鱼的意思，市场里卖的墨鱼丸子就叫“Sotong ball”啊！我请学生们票选“推荐给现代读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两首东坡诗或词”，参与的60位同学，选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25票），以及同为16票的《和子由澠池怀旧》、《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学生还选出心目

中演东坡和朝云的理想演员，分别是胡歌和刘诗诗。

配合诗词作品，我从东坡的出生地眉山，讲到他去世的常州，放映我在眉山、黄冈、海南儋州、常州等地走访拍摄的相片，和他们一同神游东坡足迹所到的神州大地和海角天涯。我对学生们说：“我要让东坡在我们的教室里活回来，也会让东坡再死一次！”往往到学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学生们会舍不得课程结束，他们问我：“可以不要让东坡死吗？”我回答：“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还有苏东坡，他就永远不会死！”

苏东坡不但活在华人心里，他还被翻译成多国外语，韩语、日语、英语、法语等等，活在世界读者的心里。

今年上半年，我有幸受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授“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课。“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文”，指的是“文本”(text)，文本是人们自我表达(情绪、欲望、讯息、思想)、彼此沟通、记录和连结的行动单元，形态多样，开放给所有读者/观者诠释，延伸内容，赋予意义。

“文本”包括：

第一，肢体：文本身体(textual body)

姿态、眼神、表情、手势、动作、服装、仪容、舞蹈等等。

第二，声音：声音/语言文本(sound/voice/language text)

无意或刻意发出的声音，比如兴奋时欢呼呐喊；跌倒时惊慌唉叫；婴儿的啼哭；战士的怒吼……乃至音乐歌唱和语言。

第三，图绘：文字/文学文本(word/literary text)和“图像文本”(image text)

文字尚未被发明之前，人类便懂得绘画和创造符号。结绳记事、甲骨占卜，都是带有符号和图像的性质。文字被有意识地排列组合为句子，联缀句子为篇章，即近乎文学。

图像是文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包括：

第一，图(picture)：所有具可视性(visible)的视觉形式，例如符号(symbol)、图标(icon)、商标(logo)、绘画(painting)、图画(picture)、图案(pattern)、图形(graphics)、标志、照相、摄影、影像、线条、地图、色彩、印刷物等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

第二，形象(image)：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整体观察、归纳、总结、凝炼而成的认知和观念、评价。

第三，想象(imagination)、意象：抽象的心灵图景。

经由探讨文本和图像的内涵与外缘，文图学研究的范围从古代美术、漫画、绘本、电影、商业广告、广告牌号志，到时尚服饰、互联网、社交媒体、弹幕视频、绘文字(emoji)……，包括其生产机制、使用情形、衍绎流变、传播渠道、社会网络、政治诉求、消费文化、视觉思维、价值判断、审美意识、艺术境界等等。

文图学立基于历史、文学、艺术史、文献学、图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跨界融合，试图解读和诠释过去由于学科分野和立场相异所忽略、所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手机，透过互联网和真实与虚拟的世界连结，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文本”和“图像”的集成。也可以说，人类创造的文学艺术，乃至人工智能产生的品项，都可以在“文图学”的概念框架里思考，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值得我们继文化上的“图像转向”升级到“文图学转向”的趋势。

经由文图学的研究观点，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东坡。例如东坡一生行迹的古今对照，我借着古代地方志和现代的地图，在湖北黄冈寻找“东坡”的位置。在镇江金山寺，我从东坡的诗文尝试体会他多次来到这里的心情转变。在东坡一生足迹最北端的河北定州，那东坡知定州期间日日与府衙相对的开元寺塔仍昂然矗立，品尝今人制造的“中山松醪”酒，东坡的人生文本和我的人生文本，在地球的同一角落有了重迭。至于东坡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创作，在我的新书《书艺东坡》里，运用文图学研究方法，梳理作品的流传历史，探索收藏、题跋、钤印交织出的作品生命故事，读者不但能从视觉上欣赏东坡书法之美，还能从文字里进入东坡笔墨的意趣。

文图学课对美国学生既新鲜又有趣，我们一同探讨了描绘前后《赤壁赋》的绘画，包括南宋乔仲常《后赤壁图卷》、金代武元直《赤壁图》、明代文征明《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卷》等等作品，比较东坡的原文，分析文学文本怎样被可视化、画家怎样呈现赤壁的景致。学生对画家画的东坡长相、赤壁图有没有“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很感兴趣。还告诉我：“不晓得三国周郎赤壁，不可不晓得东坡赤壁！”我给学生看我在“东坡赤壁”拍的照片，他们都很惊讶，原来和东坡时描写的风景相差那么大！

我也注意到东坡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的现象，从早期的林语堂，到当代的汉学家，让东坡说外语不简单，我衷心期盼有一天，能像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翻译杜甫诗一样。

(下转第16页)

把东坡文化文旅项目 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

冷成金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把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成都以及周边的旅游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文旅方面也所知甚少，所以下面所讲的内容很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许没有多少可行性，但本着对东坡的热爱，对眉山的感情，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

2005年，因电视剧《苏东坡》的拍摄需要两次来眉山，其中有一次应邀为眉山广电文教系统讲苏东坡，被问及眉山应该如何发展文化旅游，我强烈感受到了眉山人民对文化旅游发展的渴望之情，但我当时十分茫然，不知何以作答。从那以后，我就不断思考这一问题。此后，我又多次到四川，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四川——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后花园

今年6月下旬，到成都郫都区讲唐诗宋词，当时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将“四川——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后花园”作为四川文化旅游的口号和定位。

秦岭，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四川在秦岭以西，涵盖了中国南北地理和南北文化的大部分特点。四川文化发祥极早，有山川之隔，有平原盆地之聚，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士女殷盈，人民聪慧良善，治乱不随中原，宽严自有制度，自秦汉以来就被视为民族的福地，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视为民族的后花园。

唐代李白著名的《蜀道难》是对民族文化心理中桃花源情结的充分展示。那艰难的蜀道，仿佛是通向心灵光明之地的修炼之途，剑

阁则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那个“仿佛若有光”的“小口”，过了剑阁，就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宋代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为诗而存在的，走过剑门道，就进入了诗意的世界。

今天，这块“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福地青山绿水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最富有诗意和最宜居的地方之一。四川，尤其是平原、盆地一带，应该发展成中国最具魅力的休闲、养生、养老、居住的最重要的核心区。以文化、医疗、养老服务带动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成为四川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

要做到这些，与深刻认识“四川——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后花园”的文旅定位密切相关。

二、太湖旅游目的地——灵山小镇·拈花湾的启示

我于今年5月下旬到太湖谷神山庄讲课，专门参观了位于太湖西侧的灵山小镇·拈花湾，深受启发。

灵山小镇·拈花湾位于太湖西北侧，依太湖山水而建，是一个大型佛教文化主题公园，适合晚上游览。从公园的总体布局看，有三条主要交通道路和水系的组织，其中“五谷”、“一街”、“一堂”是主体。“五谷”分别为云门谷、竹溪谷、银杏谷、禅心谷、鹿鸣谷，其布局如五瓣花瓣，涵盖了会议、酒店、度假、房产等功能，其平面结构以“五瓣佛莲”为原

型;“一街”即香月花街,位于花心,是拈花湾的主干道,也是核心商业街区;“一堂”即胥山大禅堂,是大型禅修体验场所,也是拈花湾的标志性建筑。

晚上进出公园正门,灯光开启,沿街而行,历览各个景点、建筑以及商业活动。公园的景点主要有半山衔日(依太湖水而建的激光照射喷水演示佛教故事景点)、香月花街(景区主要按照唐代风格设计,是公园休闲度假生活的核心区域,可欣赏和体验拈花湾禅意生活,可在此餐饮休息)、拈花塔(四方五层,由须弥座台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木结构楼阁式五重塔,各层有灯光照射和禅意表演,是香月花街的最高点)、妙音台(拈花湾的戏台,有楹联“慧眼见一切,妙音满十方。”将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的传统戏剧文化与禅文化融合在一起)、拈花堂、梵天花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梵天花海。梵天花海依小山坡而建,就是在开满鲜花的山坡点缀各种颜色的彩灯,并间以喷洒水雾,道路蜿蜒其间,人行路上,如入幻境。梵天花海道路总长不过一公里,造价并不高,维护费用也有限,但给人的印象却极其深刻。

当晚我计点估算了一下游客人数,应该不下万人。出园门,又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据说自2015年底开放以来,年均游客300万人。(当时的门票是每人100元,不含园区内的餐饮费,园内的餐饮并不贵,而且有特色,卫生、雅洁)据说靠门票和园内餐饮商业出租,开业两年项目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这在全国主题文化公园的经营中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

我想,在策划上,这个项目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建成了环太湖旅游的目的地。太湖天下驰名,周边可供游览的景点不少,其中也包括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水战拍摄外景地,但这些景点都不足以成为太湖之游的目的地,即景点过散过小,太湖之游没有归宿感。灵山小镇·拈花湾的建立使太湖之游上升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旅程——情感体系,从而带动了太湖之游,也为太湖之游提供了归宿。其二,佛教文化主题的选择。太

湖地区佛教文化较为流行,再加上有灵山小镇的意识传承,故选择了佛教文化主题。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具有十分引人的神秘力量,且易于呈现。尤其在当代社会,人们心灵较为浮躁,需要某些文化因素来帮助自己回归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这几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灵山小镇·拈花湾的客源大增。其三,在地点选择上也较恰当。环太湖经济圈初步形成,当地经济发展较好,人们生活相对富裕,有经济能力进行此类消费。太湖地区毗邻沪、杭,这是增加客源的重要因素。我在游览时留心客源构成,大致的情况是环太湖及沪、杭地区的游客占三分之二,其他地区的游客占三分之一,外国游客很少。

三、把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

成都及周边有着十分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但似乎尚未形成旅游目的地。眉山作为新晋的三线城市,是蓉南的重要市区,这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眉山对发展东坡文化的投入力度之大更是有目共睹。不过,具体到文旅产品上,眉山以三苏祠为主的文化旅游景点虽然不少,影响也很大,意义更是不容忽视,但还不能说形成了蓉南旅游的目的地。根据灵山小镇·拈花湾的启示,以“三苏”文化,特别是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应该成为蓉南乃至川南旅游的目的地。

苏轼创造了不唯古、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民、唯实、唯善、唯美的东坡精神。他不仅融合了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还将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是传统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为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鲜活的样板。因此,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眉山建立东坡文化为核心的文旅项目也就成为历史的选择。

作为“四川——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后花园”这一四川文旅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应该充分展示文化上的家园感。

苏轼以其生命实践充分证明了他“思我无所思”和“吾生本无待”的审美的人格境界：“思我无所思”是情，“吾生本无待”是理，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深刻的情理结构，并由此构成了最富合理性的心理本体和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的建立，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合理因素充分融合生发的产物，因此，东坡文化文旅项目也应该以表现儒、释、道文化为主。

必须明确的是，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可以根据眉山的选址地形，能动地、充分地借鉴已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包括借鉴台湾等地和国外的文旅项目经验），但与其他儒、释、道文化主题公园相比，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应该有机地融合东坡的思想、生平和诗文，使之成为表现儒、释、道文化的更独特、更鲜明、更有力的形式，既能更好地显现出儒、释、道文化的吸引力，又能充分表现东坡精神。

表现儒、释、道文化要主题鲜明，分界明确，而不能搞成“大杂烩”。一旦搞成“大杂烩”，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要坚决避免。

与其他儒、释、道主题文化公园相比，东坡文化文旅项目还应该成为全国培训研修基地，也应该常年开设真人讲授传统文化和东坡诗文的免费课堂，成为旅游一景。

应该注意的是，东坡文化文旅项目的具体设计不能仅仅依靠几个“天才”的专家或某个所谓顶尖的团队，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仓促实施。因为这一项目的创意极其丰富复杂，需要许多社会层面的认同和一定时间进行体会。

东坡文化文旅项目是一个迄今为止综合性、创意性最强的文旅项目，应该解放思想，发挥想象力和执行力，将文旅开发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面所言多有不妥，仅表对东坡和眉山的热爱而已。敬请各位指正。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上接第 11 页）

英国牛津网站的管理人每周让我们知道有

多少人看过这个网址的题目，有多少人下载“苏轼”全部的资料，世界上所有的学者都可以下载，点击一下就直接上到图书或学报的网址。无论谁来参考这个网址，都会承认中国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认识苏轼在人类伟大人物中的地位，也承认他是谁都可佩服的人才。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上接第 13 页）

结合现有的 Herbert Allen Giles, Arthur Waley, Burton Watson, Beata Grant, Ronald Egan、许渊冲、林顺夫、孙康宜等诸位汉学家的翻译成就，编译出一本适合英语读者认识东坡的作品集，让更多人感受东坡精神，“散为百东坡”。我知道这不是一人一力可能完成，或许我们可以组织世界苏轼学会，共同努力。

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介绍苏东坡，让我乐此不疲。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代，你最想到哪个朝代？”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宋代！我想和苏东坡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虽然我始终也只能是个恋慕者，我愿用文字和语言，陪大家一起去看苏东坡。

中秋佳节刚刚过，我们在东坡的老家仍然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月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东坡先生让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有了希望和理想的声音。

谢谢大家！

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接第 6 页）

青年学子茁壮成长。根据秘书处统计，在去年和今年的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上，在读本、硕、博同学就达 28 人，受到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和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嘉许的台湾东吴大学硕士研究生卓夕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苏轼研究代不乏人，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苏轼涉鼠作品对越南的影响（节选）

张思齐

内容提要 苏轼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多产作家，他写过许多涉鼠作品，其中有诗 26 篇，文 8 篇，后者含赋 2 篇。苏轼笔下的鼠种类繁多，但主要的还是老鼠。苏轼还是一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巨人。北宋与越南两次交战，均与宋廷欲将已经独立的越南重新纳入郡县制有关，与王安石好大喜功有关。对此，苏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十七世纪，越南出现了一部文学经典《贞鼠传》，它具有世界影响。《贞鼠传》与苏轼《黠鼠赋》有三重契合性。由此可知苏轼的文学创作对越南文学发生过触媒作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越南积极响应。分析苏轼对越南文学的触媒作用，有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关键词 苏轼研究 涉鼠诗文 越南文学 创作触媒

四、触媒越南的经典

越南的辞赋家大都从苏轼的作品中吸收过养分。

越南的古代文学，有一部分用汉字创作，这些作品与中国人的作品相似，它们是越南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大为越南的文学史家们看重。另一部分越南古代文学作品，它们用喃字创作，极为越南文学史家们看重。越南的喃字文学诞生于十三世纪末期。喃字是运用形声、会意和假借等方式创制出来的越南民族文字，它看起来像方块字，但是笔画繁多。喃字第一次成功地将文人学士的书面语与人民大众的口头语结合起来。在越南的文字史上，喃字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喃字是在完全拼音化的“国语字”出现之前的一种在越南土生土长的文字。由于形声法的大量使用，喃字具有较强

的表音功能，能够较好地记录越南人的音节，同时也能暗示字义。

越南的诗歌具有多种体裁，六八体（luc bat）是其中的一种。六八体是一种文学体裁，它能够充分地体现越南文学的被称为“喃声”的民族特色。陈重金（Tran Trong Kim, 1882～1953）《越南文范》对六八体论之甚详。他写道：

第 364 条：六八体是一种有韵而无对仗的文体。现在的这种文体，发源于歌谣、方言和谚语，斯三类文体属于古代。在初始期，每句或四、五言，或六、七、八、九言，没有一定。渐渐地筛选使之悦耳而顺口，于是成为一种音调，逢上句则六言，接续的下句则八言，因此叫六八体。^{[1]163}

本条论述六八体的起源。在这里，方言不指标准语的变体，而指一种古老的民间文艺形式，它采用当地的口语来说唱，具有浓郁的原生态的气息。产生于越南本土的各种格律诗多为杂言，这样可以避免呆板，便于歌唱。六八体定型于六言句和八言句交错而行，这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骈体文对越南影响很大。骈体文锦心绣口，精雕细刻，非常合符越南人精细的审美习惯。上句为六言，这为接纳中国的骈体文学留下了空间。下句为八言，这便于表达越南人柔曼纾徐的情愫，细语呢喃的叙事口吻，因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同时，八言句可以拦腰切分为两个四言句，这同样为接纳中国的骈体文学留下了空间。八言句还可以切分为前二后六，前二可起类似于“领词”的作用。八言句还可以切分为前六后二，后二可以起到“煞尾”的作用，使得结句有力。

第 365 条：六八体中的押韵方式。句尾之第六字，与八言句的第六字，遵循同一个韵；八言句之第八字，与六言句的第

六字，继韵；接下来的八言句之第六字，与上句的六言句之第六字，继韵。^{[1]163}

本条讲六八体的押韵方式。六八体诗歌不仅押尾韵，而且还押中韵。中韵出现在八言句之中，它上继六言句的尾韵。六言句和八言句都有尾韵。六言句的尾韵，预告八言句的中韵。八言句的尾韵，预告下一个六言句的尾韵。六八体的押韵，勾连交错，比单纯的尾韵来得复杂。这体现了越南人精细的审美风格。顺便指出，英语的十四行诗，其上乘之作，也有中韵。不过，这须要非常的精审才看得出来。在英国伦敦有一家诗歌修改中心，收费高昂。一首十四行诗，收费四十英镑。其修改，主要是让普通的诗行押上中韵。笔者留英时，很想发表英文诗歌。见到广告后，去过一封信，拟请修改。很快有了回信，附有收费标准。看见那收费标准，笔者噤若寒蝉。算啦，自己打拼！努力，努力，再努力，终于发表了三首英文诗歌，计百余行。

第 366 条：在六八体中安排平声字仄声字的方法。以单音节词的音调之缘故，文章家须注意字之平仄。在六言句中，第四字在任何时候均须用仄声；第二字多半是用平声。但是，这也并非一定之律，因为（第二字）有时用仄声也行。^{[1]164}

本条是对六八体诗歌较高的要求，属于修辞要求，不是格律要求。因为六言句的第二和第四个字为节奏点，读得较为响亮，所以宜于讲究平仄。第二个字的平仄之所以可以通融，乃是因为前两个字有时为“领词”，意义甚虚。至于第六个字，因为已经规定了用韵，所以没有再说的必要了。

第 367 条：在八言句中，第二、四、六、八字分别为平、仄、平、平。八言句之第六、第八字虽然都是平声，但不属于同一个声调，当须一为短平（无声调符号），一为长平（有玄声符号）。^{[1]164}

本条是基于越南语声调而做出的考虑。越南语的平声比汉语复杂，它分为两种，即横声和玄声。如果第六字为横声，则第八字必须为玄声。如果第六字为玄声，那么第八字必须为横声。越南语的仄声，包含四种声调，它们是

问声、迭声、锐声、重声。以此之故，在汉语诗歌中奉为理想而实际上难于做到的“四声递用”，在越南语诗歌中则非常容易做到。八言句的第六和第八字，既是节奏点，又是押韵处，故而有这样的讲究。顺便指出，汉语的诗韵，之所以分为上平声和下平声，仅仅是因为汉语里平声字多，而不是因为它们的音调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

第 368 条：六八体虽然没有对仗的格律要求，但是人们有时也使用小对法。^{[1]164}

本条讲小对法。小对，相当于汉语诗歌的句中对。这是修辞要求，不是格律要求。高明的六八体诗人，大都讲究小对法，以展示诗人的才华。

将第 365、366 和 367 条综合起来，可以得到六八体诗歌的诗谱，如下：

○○●●○①
○○●●●①●②
○○●●○②
○○●●●②●③
○○●●○③
○○●●●③●④
○○●●○④
○○●●●④●⑤
.....

在以上诗谱中，○表示平声，●表示仄声，○内的数字表示押韵。如果一行中有两处韵，那么当前平后玄，或前玄后平。六八体诗歌的格律，有如下三条通则。第一条，所有的诗行，都是平起平收。第二条，第二、六、八字共平；第四字共仄。此外，还有第三条，即第一、三、五、七字，可不受平仄限制。这是对汉语诗律“一三五不论”的拓展。

六八体诗歌，只须六言句和八言句交错而行即可，而没有长度上的任何限制，这就有利于创作长篇的叙事诗。因此，我们看到越南文学史上有许多长达一两千行、两三千行的长诗。受风土的影响，越南人善于长篇的叙事，并不时杂以抒情、断想、评点、发挥，或作哲理思考的引申，或作处世经验的总结，或作引人发笑的打趣。在这一点上，越南的叙事文学与印度有些相似。天气炎热，无法劳作，于是人们

找个阴凉处坐下来，听人吟诵故事。在吟诵的过程中，诗人不断添枝加叶，情节日益复杂，细节日益丰衍，篇幅也就越来越长了。

喃字文学兴起之后，越南文学的发展明显地加快了速度，越南文学的民族特色也日益鲜明。十五至十七世纪是越南喃字文学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在越南出现了一些无名氏的用六八体写成的喃字长篇叙事诗，其中有一部叫做《贞鼠》，也叫做《贞鼠传》。越南学者文新、阮红枫著《越南文学史简编》第二编《十五至十七世纪末》第三章《作家与作品》第七节《贞鼠》：

《贞鼠》是一部类似于《鲇鱼与蛤蟆》那样的寓言小说，它也是用六八体写的，这一点也与《鲇鱼与蛤蟆》相同。小说的原委如下。在陈朝隆庆年间，禄峒一带有一位隐居的名士，名叫胡玄规，他有一对耳朵能听懂动物之语。胡玄规住在胡季犛家的附近。在胡玄规的家里有一只白色的老鼠守寡，她还有五个孩子。在胡季犛的家里有一对老鼠夫妇。有一天，白母鼠外出谋生，被狗追赶，她只好跑进一个洞里。这个洞是一只公老鼠的窝，而且他的妻子还在世。白母鼠赶忙转身，以排除勾引。白母鼠还反抗责骂。胡玄规见证了那只公老鼠与白母鼠之间的争吵。故事的内容就在于这场争吵之中。为了勾引白母鼠，那只公老鼠推出了充分的理由。公老鼠认为，贞节是无意义的。在引证的时候，那只公老鼠还举出了好些人为例。他还说道：

……做丈夫的还在呀，还呆呆地做什么呢？已经与别人在一起了，还要等待专一的爱情吗？识时务者，丈夫刚一不在场就赶紧做嘛，你那根旗杆早已不再是绿色的啦，还不赶紧的，改容变义！

再看回答。白母鼠认为，有些人如此，那些人不值一提。白母鼠歌颂处境穷苦而忠贞守节者，并揭穿了富贵的权势集团的真面目，比如胡季犛之流。她还认为，那些人是一群“蠹国害民”的家伙。那只公老鼠仍然不肯让步。他一边引诱，一边威

吓，他告诉白母鼠说，既然进了他的屋，那么无论如何已“带上坏名声”了。然后，公老鼠又告诉她说，他的妻子会牵就丈夫的，她不会嫉妒，并且可以和白母鼠“做姐妹”。公老鼠又说，是他让白母鼠来避难的。既然如此，那么白母鼠就应该“报恩”。公老鼠再次被白母鼠揭穿了面目，说他是披着豺狼皮的所谓“君子”。眼看无法引诱白母鼠，那只公老鼠就改换一副腔调说，他只是“试探情况”罢了，目的是看看白母鼠心意如何罢了。然后，公老鼠做诗，为白母鼠送行。白母鼠也“即席”赋诗一首作答。正在这当儿，母老鼠回来了。母老鼠见公老鼠正与白母鼠说说笑笑，她责备起丈夫来，说他“饱饭而竖鸿毛”，从不曾顾及那个“一早一晚寻找打火绳的人”。

果然事情已经发生，怎样说，对谁说，都令人断肠！算了，算了，何必说那么多，嘴巴痛！大象的脚印不留在稻田的草上，有啥办法！

母老鼠责备丈夫薄情，她说：

妻子老了，丈夫变得吝啬，挨得近也撒手不管，唉，俺奶子斜吊，腰背肥硕，身体沉重，唉，熟茄子，老葫芦，他根本就不喜欢。

受到公老鼠的一顿喝斥后，母老鼠便前往白母鼠的家屋，为的是辱骂白母鼠一顿“以消气”。白母鼠与母老鼠刚刚争吵完，这时一只猫从某处跑了过来。白母鼠，母老鼠，惊慌失措，转身逃跑。母老鼠跌倒了，掉进塘坳里。胡玄规正巧下塘游泳，他将母老鼠打捞起来，然后递给她一篇劝诫文。胡玄规为白母鼠鸣冤，并向母老鼠指出，希望她知道，既是妇人，就该规劝丈夫，须知“一句忍，十句善”，切勿有“争力使气”。争力使气，自己吃亏，又不符合道德。不是有道德信条说“温柔便是妇人法”么！最后，胡玄规谴责了公老鼠和母老鼠，并歌颂了白母鼠的坚贞，“黄金的心肝，文丝不动摇。”

《贞鼠》中的人物，除了胡玄规之外，还有三个，即白母鼠，公老鼠和母老鼠。

每一个人物都得到了作者十分清晰的描写。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社会中的一个阶层。白母鼠与大家一起表现出了劳动妇女的各种性格特征。

人已疲倦，笔管毫不腿色，终日忙碌，哪分白天黑夜！

丈夫死后，白母鼠寡居，为的是操劳哺养一群孩子。白母鼠很有担当。胡玄规正是认识到了这样一点。

合步举爪胸前，突然一阵头晕。

如此方有可能，图得一家温饱。

这就是白母鼠，她不仅非常勤劳努力哺养子女，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坚贞的妇女。从她坠入公老鼠洞穴的那一刻起，到她出来回家的那一刻止，在任何时刻白母鼠都能稳稳地持守立场，每一句哄骗的话，她统统都推掉。公老鼠的寻狎勾引，她统统都辞却。白母鼠是一位劳动妇女，但她又是一位受到诸多封建礼教影响的劳动妇女。白母鼠是一位忠实的知道自重的妇女。她并不认为贫穷是什么丑陋的事情。她自豪于能够在贫穷中守得住忠实。她轻鄙那些富贵而“贪婪”的家伙，因为他们“蠹国害民”。白母鼠有越南妇女的许多德性，诸如疼爱丈夫，疼爱子女，勤劬，“斜操”（精干），忍耐。

公老鼠所生活于其中的胡季犛家，乃是富贵之家。公老鼠洋洋自得于自己那充裕的生活。他夸耀那些他们夫妇二人得以享用的昂贵的滋补药品，诸如“鹿茸”啦，“人参、莲肉、蜂蜜”啦，“虎骨、斑龙发膏、炼丸”啦。公老鼠如此讲述，为的是“亮掠而引诱”白母鼠。事实上，公老鼠也只是劳动人民而已。虽然公老鼠不属于社会的上位阶层，但是在思想和生活上，他已经沾染了许多剥削阶级的丑恶习惯。他虚伪、自私，喜欢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喜欢享乐。对公老鼠而言，只有一条哲理才是有价值的，那就是顺时而行。公老鼠之所以采取顺时的哲理，乃是因为顺时是一条达致享乐的道路。公老鼠，总而言之，是破落儒士的典型。他们理想破灭了，于

是他们投机，他们逐利，他们不讲任何廉耻。

公老鼠与白母鼠之间的争论，是邪淫与贞节之间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斗争仅仅局限于贞与不贞的问题，但事实上斗争的中心是人生的意义问题。人们在生活中，究竟应该像白母鼠那样生活呢，还是像公老鼠那样生活呢？那只公老鼠，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反对贞节，他奚落清贫而有道德的生活。生活的意义，对于那只公老鼠来说，就是尽享生活的快乐。白母鼠则捍卫贞节，看轻富贵，看轻名望，因那些富贵的有名望的家伙“蠹国害民”。白母鼠经常想到的事情，就是侍奉丈夫，从一而终，哺养子女，望之成人。如果办不到这一点，那么她就会随时准备好，随夫而死去。在公老鼠和白母鼠的这场斗争面前，《贞鼠》的作者，其态度倾向白母鼠一边。换言之，作者所欲高扬的是那始终如一的心，是那忠实的心，其对立面则是随波逐流的生活哲理，即投机、为己、享乐。这是那些破落儒士的人生态度，他们生活在十七世纪，那时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崩溃了，危机已经沉重了。

儒士的忠君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它发源于一些物质的权利。君王给仆从以爵位、田地、衣食，仆从就忠于君王。在分权的封建制度下，权柄尚未集中于君王，因而忠君的理想尚未真正地支配仆从的行动。待到封建集权制度形成的时候，忠于一位国王这一理想就得到了人们的歌颂。既然如此，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忠于国王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儒士仅仅在国王能够保证给予他们权力的时候才忠于国王。当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封建阶级的内部分化了，没有哪一个宗族包揽得了全部的权柄，于是儒士的理想就从忠于国王转移到随顺时势了。儒士忠于某一个宗族，但是如果这一个宗族倒了，那么儒士就可以忠于另一个已经揽得政权的宗族。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期，越南的封建制度在崩溃，分化出了若干封建集团，它们是

莫氏集团、黎氏集团、郑氏集团、阮氏集团，而这些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是儒士中流行随波逐流的人生哲理之原因。既然各个儒士已经可以随波逐流于政治了，那么宗族也就可以随波逐流于道德与生活。一个个宗族，也就可以从儒家的“忠君”哲理，而转移到那只公老鼠所提倡的随波逐流的哲理了。他什么都随便，什么都玩玩。当然，即使在封建制度崩溃的时期中，即使在封建阶级分化的过程中，也还是有一些儒士慷慨悲歌，他们仍然坚守节操。但是，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儒士毕竟少之又少。正因为有节操的儒士少，而无廉耻的儒士又那么多，所以那只公老鼠才明目张胆地到了奚落贞节的地步，到了公然指责节义的地步。

同样是与《鲇鱼与蛤蟆》相似的寓言小说，但就艺术方面而论之，《贞鼠》和《鲇鱼与蛤蟆》却有许多不同。在《鲇鱼与蛤蟆》中，无论是鲇鱼，抑或是蛤蟆，都既有动物的特性，又有人类的特性。在《贞鼠》中，白母鼠和公老鼠都没有任何东西属于鼠类，而他们都是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经由作者设置出来的人物。如此设置，旨在宣示作者的主观想法罢了。《贞鼠》的作者在塑造具有“鼠性”的各位人物方面并不成功，但是该作者在塑造具有“人性”的各位人物方面却又是成功的。白母鼠果真是一位贫苦的劳动妇女，她“秦式操劳”（在极艰难的环境中操劳），她有担当，她惯于默默无闻地生活，以便侍奉丈夫，哺育子女。公老鼠显然是一介儒士，他习惯于吃玩逐乐，甘心钻营权贵之处，以便谋取名利。母老鼠有足够的性格特征，她是质朴的世代劳动之家的一位妇女。当她与丈夫争吵的时候，她颇为朝气蓬勃，厉害泼辣。母老鼠没有标举道德和礼教，她只知道维护家庭的那些切实的利益。

在描写人物的过程中，《贞鼠》的作者已经运用了许多成语、歌谣和俗语。为了刻画出穷苦的环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许

多俗语，如“山蚂蝗挤出水”、“煎瓦出油”、“绞狗套猫”、“碎鱼头，补虾头”。这说明，作者所过的生活贴近人民。因为只有生活贴近人民，才能够把握人民的如此生动的语言。而且，也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够描写出如下穷苦的境况。

房子是个空壳壳，怎样假装都为难。

市上稻谷多如水，柴禾贵如买铜板。

说是没有肉，其实鱼也无。

没有地方睡，蚊帐遮身体。

猫儿跑巷外，想去那谋生。

狗卧廊下啃，啃块红薯皮。

猪坐地上刨，憋成瘪肚皮。^{[2] 76-82}

以上文字由笔者根据越南文材料译出，并尽可能采用直译。

按照世界各国文学史的书写惯例，只有经典的作品才使用专门的章节来加以论述。越南文学史亦然。在文新、阮红枫著《越南文学史简编》一书中，从起始到十八世纪末以前为越南文学的古代部分。其中，共有20部作品在19个专节中予以讨论。它们是《粤甸幽灵录》（汉）、《岭南摭怪》（汉）、《檄将士文》（汉）、《白藤江赋》（汉）、《林泉奇遇》、《鲇鱼与蛤蟆》、《贞鼠》、《天南语录》、《征妇吟曲》、《宫怨吟曲》、《琼状元》和《猪状元》、《石生传》、《李公》、《皇储》、《范载玉花》、《宋珍菊花》、《金云翘传》、《六畜争功》、《碧沟奇遇》。在数百部越南古典文学作品中，只有20部得以列为专节讨论。其中，前四部为汉字文学作品。喃字是用汉字构件来组装的表音文字。它更接近越南人民的口语，更能摹状越南人民的声情，更多地推动了越南文学的进步。《贞鼠》正是喃字文学中的杰作。由此可知，《贞鼠》在越南文学史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属于经典。

越南佚名的《贞鼠》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寓言小说。这部作品的文学体裁是小说，说理方式是寓言，运载语言是诗歌，而诗歌是韵文中的一种。

中国苏轼的《黠鼠赋》是用赋体写成的寓言小说。这部作品的文学体裁是赋体，说理方式是寓言，运载语言是辞赋，而辞赋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顾易生《十大散文

家·前言》：“辞赋骈文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产品，视其韵散、骈散结合的不同程度，有的可置于散文的大范围中，有的则与散文相对立。”^[3]那么，苏轼《黠鼠赋》属于哪一种情况呢？苏轼《黠鼠赋》，其用韵的情况如下。按照句末各字出现的先后排列，括号内为《佩文韵府》的分韵。

坐作（去声二十一个）；

空中（平声一东）；

死（上声四纸）鬼（上声五尾），四纸和五尾通押；

有走（上声二十五有）；

黠（入声八黠）穴说啮（入声九穴），八黠和九穴通押；

人麟（平声十一真）；

鼠女汝（上声六语）釜虎（上声七麌），六语和七麌通押；

觉（入声三觉）怍（入声十药），三觉和十药通押。

由此可知，苏轼《黠鼠赋》，虽然散文的倾向较为突出，不过仍然大致押韵，它与诗歌仍然接近。这就印证了《文章辨体序说·古赋》中的一个命题：“赋者，古诗之流。”^[4]¹⁹换言之，苏轼《黠鼠赋》，其运载语言接近于诗歌。

将越南佚名的《贞鼠传》与中国苏轼的《黠鼠赋》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契合点。第一，从文学体裁上看，越南佚名的《贞鼠传》与中国苏轼的《黠鼠赋》都是小说。第二，从说理方式看，越南佚名的《贞鼠传》与中国苏轼的《黠鼠赋》都是寓言。第三，从运载语言上看，越南佚名的《贞鼠传》与中国苏轼的《黠鼠赋》都是诗歌体。简言之，越南佚名的《贞鼠传》与中国苏轼的《黠鼠赋》是两篇高度契合而又各具特色的艺术完璧。

让我们进一步往上溯。越南佚名的《贞鼠传》，其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名为写鼠而实为写人”。那么，这种特色是从哪里来的呢？事物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贞鼠传》的作者显然有所承袭。那么，他从哪里承袭而来呢？笔者以为，《贞鼠传》的作者不是从别人那里，而正是从苏轼那里，承袭了“名为写鼠而实为写人”这一创作手法。这是因为，苏轼在越南是家喻户

晓的人物。上过学堂的越南学童，都知道中国有个大作家苏轼。越南人喜欢苏轼的作品，因为他们喜欢苏轼这个人，而苏轼也喜欢他们。苏轼对越南人有亲和力，而王安石则没有。王安石的文学作品质量固然好，然而越南人不喜欢他这个人。原因很简单，王安石主张打他们，姑且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故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之外，一般的越南人也就不怎么读王安石的作品了。苏轼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多产作家，在其诗文创作中有大量的作品涉及到鼠类动物，其中有的为野鼠，有的为飞鼠，还有的为竹鼠，但是主要的还是屋宇家宅中的普通老鼠。这些都是越南人十分熟悉的生灵，理应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在苏轼的那些涉及老鼠的作品中，老鼠形象的多数为正面的形象。苏轼作品中的老鼠们，其才智远远超过许多在生物进化链上高于鼠类的其他动物种群。他们有才气，有运气，有福气，他们通人性，有灵性，有悟性。在多数情况下，苏轼对老鼠给予同情，乃至加以礼赞。

苏轼今存赋二十七篇。《黠鼠赋》并不是苏轼最有名的赋作。苏轼最有名的赋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贞鼠传》产生于十七世纪的越南，其作者虽然佚名，但总还是有的。《贞鼠传》的作者当为一名贫穷的儒士，他不求留下姓名，只求留下作品。只要有作品在，其作者就会被人们记住，从而在事实上放射出光辉。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有一位儒士创作了《贞鼠传》，而后来的某个或某些儒士对它做了补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归于一种事实，即《贞鼠传》的作者是一位儒士，或曰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

越南是一个独特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深契，大而言之，越中两国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同为龙的传人；细而言之，越中两国人民又各具民族特色。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越南很早就与世界各国交往，既与东方国家交往，又与西方国家交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暖，谷物多，昆虫多，越南的老鼠也就特别地多。在越南的主流文学中，老鼠是极其重要的叙写对象，并且在此方面涌现出了具有世界文学名著品格的作

品《贞鼠传》。笔者认为,越南文学之所以在老鼠之形象上大放异彩,乃是受到苏轼涉及鼠类的作品影响之结果,而其间还有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在越南的历史上明代的文学观念对越南文学的直接楔入。

明朝曾一度将越南纳入中国直接统治。此即越南历史上的“明属时期”。“1407~1427年,明朝统治我国。”^{[5]495}在明代直接统治越南期间,推行中国文学的经典势在必行。中国文学经典数量众多,其中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这是因为,唐宋八大家的诗文有助于越南的儒士们在科举考试中胜出,走上直接报效国家的坦途。即使唐宋八大家的著作,其数量也很庞大,所以有人出来编辑选本。明朝初年,朱右(1314~1376)选编《八先生文集》,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的文章。这就是唐宋八大家这一提法之来源。中国士人在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时候,侧重学习他们的散文。越南儒士在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时候,大都一并学习他们的诗文。这是因为,从越南文学创作的传统看,越南人使用汉字做诗,起始甚早,造诣亦高。越南的许多汉文诗,其水准与中国一流诗人的作品不相上下。越南人使用汉字作文,其成就略逊于做诗。至于越南人使用汉字来创作小说,则其兴盛期来得更晚一些。因为越南历代重视科举,而且兼诗文,所以越南的儒士们大都熟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骈文和诗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的文学体类最为丰富,数量也最多,同时也更吸引人一些。《苏东坡全集》卷首宋孝宗赵昚《东坡全集序》:

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细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6]4}

以上是宋孝宗阅读苏轼诗文的体验。大凡热爱文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的时候,很难对八大家中每一位的文章都产生喜爱。比如,韩愈的文章,不免怪怪奇奇。柳宗元的文章,难于模仿。欧阳修的文章,其门其实径开在苏轼那里。苏洵的文章,难免驳杂。苏辙的文章,模仿甚难。王安石的文章,有些尖刻。曾巩的文章,过于平淡。然而,对于苏轼,大家都喜爱,他的有些诗歌好像说话一般,他的有些文章好像家书似的。大家都觉得苏轼的文章活泼一些,通泰一些,说真话,不矫情,因而容易吸收其营养。越南儒士,自然也有类似的感受。况且,苏轼是四川人,而越南人的祖先蜀王泮也自四川迁徙而来!《大越史记外记全书》卷之一:

安阳王在位十五年。姓蜀,讳泮。巴蜀人也,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需酒食以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堕井薨。王于是筑城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唐人呼为昆仑城,谓其城最高也)。其城筑毕崩,王患之,乃斋戒祷于天地山川神祇,再兴功筑之。^{[7]43}

周赧王五十八年,即公元前257年。蜀王泮本是古蜀国之王,在秦国的重压之下,他率十万兵且战且退,经过云贵高原和广西的沟壑,来到今越南北部。这时,十万兵只剩下六万了。当时的越南,为各部落联盟所统治。他们的兵力加起来不过十万,且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蜀王泮以六万精兵,很快就统一了今越南北部,建立了瓯貉国。古蜀国的蚕丝业、稻作业、手工业、水利事业,均高度发达。蜀王泮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今越南北部生产力的发展。蜀王泮的基因存在于越南人的身上,蜀王泮的精神至今仍在越南人的脑海里闪耀着光芒。在今天的某些四川方言中,还保留着三、四十个单词,它们无法用汉字写出来。但是,在越南语中,这些词依旧活跃地使用着,含义也相同。这一

点使得研习越南语的笔者倍感亲切。在《贞鼠传》中，有两个表达方式特别有中国的韵味。其一，“斜操”，（尤其指越南妇女的）精干。初看这个单词，特别令人费解。后来一想，不难理解。清瘦的越南妇女背着婴儿，在锅台前做饭，她们把谷糠、菜头、断虾、鱼头丢给身旁的鸡、猫或狗，给它们喂食。这时她们就必须斜着身子操劳，以便一举两得。其二，“秦式操劳”，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操劳。秦式，以秦人的方式。统一中国的不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楚国，也不是尽有鱼盐之利的齐国、越国、吴国，而是位于西北方的秦国。然而，秦国一带是相对苦寒的地区，那里的人民习惯于操劳，特别善于艰苦奋斗，特别有远谋。因为有共同的族源，所以越南人喜爱苏轼是由衷的。他们与苏轼，有心心相印，灵魂相通的感觉。越南的儒士们喜读苏轼的诗文。在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不喜欢苏轼的赋。他们首先阅读苏轼《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时，他们的灵魂受到震撼。继而，他们阅读苏轼的其他赋作。这时他们发现，原来苏轼竟然将老鼠描写得如此绝妙！在这样的阅读心理之下，一些越南的儒士就开始尝试揣摩苏文，尝试描写涉及老鼠的赋了。在这种大背景下，《贞鼠传》终于在十七世纪出现在越南文坛之上。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文化传播情形而回溯出来的《贞鼠传》的前创作阶段。说得是否合理，还望方家批评。总之，中国苏轼的《黠鼠赋》对越南佚名的《贞鼠传》在创作上的触媒作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南已实行“以华为师、开放改新”的国策，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下，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博士欣然决定，要在越南建设“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中国元素的欣然接纳。这是越南人民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研究苏轼对越南的影响，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体现，又有利于提升越南文学在世界文学宏大格局中的地位和品级。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越南积极响应。分析苏轼对越南文学的触媒作用，有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注释

[1] Tran Trong Kim, cung lam voi Bui Ky va Pham Duy Khiem, VEIT-NAM VAN-PHAM, in lan thu bay, sua-chua can-chinh (Saigon: NXB Tan Viet, 1940) 163. (陈重金, 与裴屹、范惟谦共著《越南文范》第七次印刷, 谨慎修订版, 西贡: 新越出版社 1940 年版。)

[2] Van Tan, Nguyen-Hong-Ohuong, Lich Su Van Hoc Viet-Nam So Gian (Ha-Noi: NXB Khoa Hoc, 1963) 76~82. (文新、阮红枫著《越南文学史简编》, 河内: 科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3] 顾易生主编《十大散文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4] (明)吴纳著、于北山点校《文章辨体序说》,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点校《文体明辨序说》,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5]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 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6] 苏轼著《苏东坡全集》(上册), 中国书店 1986 年版。

[7]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英语世界中苏东坡研究再探

何勤华 汪 单

内容提要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政治、思想、文学、书法和艺术理论上杰出的代表，其影响力不仅及于宋以后各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也越出国界，波及欧洲与北美。本文仅就英语世界关于苏东坡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通过阐述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起步、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以及未来的展望等，说明苏东坡所代表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不仅激励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认可，体现了若干对人和人性的最终关怀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 英语世界 苏东坡研究 士大夫精神 人性关怀 普世价值

引言

中国的宋朝是一个在各个文化领域及历史传奇中成就非凡的时期，不仅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甚至文人雅趣的日常生活。宋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朝代，一方面是朝廷内部党锢之争，另一方面军事上孱弱无力，备受外族入侵、蹂躏，甚至到亡国。这样一个富裕的朝代、软弱的国度，孕育了一批后人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对宋代幸存的物质文化与文物，像雕版印刷、绘画、书法、陶瓷，鉴于其稀有而高品质，也自然成为国内外学者炙手可热、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1]1~2}

一、苏东坡的精神世界

苏东坡是北宋文学、政治、思想和文艺理论上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少有能与同时代和后人建立紧密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例如北宋元祐时期，以苏轼为中心，米芾、王诜、黄庭坚、李公麟等人形成的文人圈。我们可在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中看到十六位名士聚集在王诜西园，画中人物抚琴、吟诗、赋词，或是挥笔作画。元祐文人圈促进文人画在北宋末年得以最终确立，并得以继续发扬光大。^[2]苏东坡生前留下诗词、书法和生活资料比较完全，我们可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地博物院看到后

世与苏东坡相关的书画、札记和文献，又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仇英《东坡寒夜赋诗图》卷、李公麟的《醉僧图卷》，画中苏轼作有题跋、吴镇的仿《东坡风竹图》；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

苏东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情况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汉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进展。国内众多学者认为英语世界苏东坡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成果多出英国汉学界翻译中国的诗词为主，比如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中国诗歌集》中翻译了苏轼的诗歌。韦利使西方人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也是早期西方了解苏东坡的重要文献之一，但翻译较为平直、缺乏语言的韵律、研究性也不高。^[3]中国近代海关洋员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于1868年至1870年在《中国评论》发表了《广东史》，其中《苏东坡》为其中一章。虽然包腊的学术研究性不强，但是较早涉及苏轼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清末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期刊，该期刊关注于中国、日本、蒙古、西藏和其他远东地区的科技、人文、历史、宗教等方面。19世纪是西方殖民势力逐步进入并控制远东的时代，同时也是汉学研究起步和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殖民扩张催生了作为新形态的“侨居地汉学”，而“侨居地汉学”也随着殖民地扩张而不断地发展。另一方面，侨居地汉学因其独特的形态对西方汉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汉学的深层发展。^[4]因此，英国汉学界苏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

二、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起步

1936年，林语堂携全家赴美，在远离祖国，担忧国难之际，写下了这部旷世杰作《苏东坡传》。整本书用英文写作，不仅体现林语堂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同时在字里行间看到作者精妙、创作性的翻译、转译能力。书中包含较多的函札、诗、散文，为西方学者日后研究苏东坡提供了可贵的文献。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文化中心也逐渐从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与此同时，汉学研究在美国得到快速发展。1955年美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成立，1956年，亚洲学会从美国东亚学会中分离出来。回顾50至70年代，美国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各个学院和机构赞助汉学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纷纷成立研究中国的机构。^[5]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国历代的人物和他们的著作不断地进入美国学界的视野，研究专著、译介和人物传记大量涌出，苏东坡在美国汉学界也受到关注。

表1. 1950至70年代初在美国研究苏东坡的代表作品

作者	著作名称	年份	出版社
Hans Frankel	Poetry and Pain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s of Their Convertibility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58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Burton Watson	Su Tung-p'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196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gus Charles Graham	Red Cliff Poem from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965	Grove Press. New York
Andre March	Landscape in the thought of Su Shi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6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Susan Bush	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 Su Shih (1037--1101) to Tung Chi-Chang (1555--1636)	1971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Yu Shih Chen	Change and Continuation in Su Shih's Theory of literature: A Note on His Ch' ih-pi-fu	1974-75	Monumenta Serica

7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中西之间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英语系国家学者逐渐将历史研究、中文典籍的阅读能力综合

起来，苏轼的研究内容也相对丰富起来，不仅停留于诗词翻译、人物传记、主题性研究，或是艺术史的大量涌现。统而观之，英语世界的苏东坡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1928年初期，20世纪30到50年代为发展期，1950年末至今的成熟期。^[6]本文试图跳脱以往线性论述、文献分类、归纳的方法，以20世纪30年代、90年代至今为时间轴，评述以上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者，他们的著作及在学界相关的批评。而进入21世纪，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是什么？本文就上述概要就此展开分析。

三、英语世界苏东坡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一）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

苏东坡在思想、文学和艺术上多才多艺，一生的经历也是跌宕起伏。林语堂更是将苏轼塑造成一个热情、真挚、幽默和豁达的中国文人形象。作者在开篇用“元气淋漓富有生机”来形容这位历史人物，这也难怪原书名为“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意为生机勃勃、幽默豁达的天才。《苏东坡传》最早于1947年Hesperides Press出版，随后陆续在1971至2013年再版。书一问世，就受到两本《远东季刊》^[7]和《远东观察》关注。Shau Wing Chan^[8]在1948年《远东季刊》评论道：“林语堂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天才苏东坡，还介绍了苏轼的家人、朋友和政坛上的敌人。本书清晰地梳理了苏东坡一生的诗词、绘画和书法，其内容囊括个人札记、信件及曾在朝廷任职时的回忆录。书中三个附录也值得读者关注，包括附录一《年谱》、附录二《参考书目》，及附录三《本书资料来源》，可供西方学者对苏东坡做进一步研究。Chan认为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描述过于主观，例如书中说王安石妄想、怪异，一意孤行地实施变法，导致不可挽回的结果。不过，作者借‘王安石变法’这一章让读者更完整地了解苏东坡和那个时代。”^{[9]330~332}同一年，《远东观察》^[10]也发表了评论：“林语堂用准确的英语，又不失幽默地描写了苏东坡那令人倾倒的魅力和活力。林先生细心整理、翻译了相关的信件、年谱、地图和参考书目，令人赞叹不已。”^{[11]111~112}

可见，20世纪40年代末，英语系国家已熟悉苏东坡和他的作品，这得益于林语堂《苏东坡传》的问世。当时，林语堂因1934年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西方已名声大噪。苏东坡在林语堂

的转译下,个性和才华更加突出。书中的文献资料成为日后西方学者研究的线索。这本书也成为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苏东坡传记。

(二) 傅励君的《苏东坡之路》

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学界起步比较晚。相对其他的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宋代文学研究者则相对少。虽然很多学者对中国宋代不乏兴趣,但最终并未能专注于此。20世纪末在北美汉学界,大部分学者对宋代文学的研究着重于诗词的翻译,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65年出版了《宋代诗人苏东坡诗选》,刘若愚(James Liu)于1974年所著《北宋主要的诗家》以及约翰·特纳(John Turner)于1976年在香港出版了《中诗金库》。随着北美汉学界的发展,中国与美国频繁的学术交流,北宋研究人员也相继壮大。而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北宋研究学者非傅励君(Michael A. Fuller)^[12]和艾朗诺^[13](Ronald Egan)莫属。《剑桥中国文学史》曾邀请这两位学者撰写宋代文学部分。这体现两位在北美宋代文学研究领域泰斗般地位,但也侧面反映了宋代研究在北美学界略显单薄。

傅励君于1990年写的《苏东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分析了苏轼作品中错综复杂的人格特质,并追溯他的诗歌创作风格从青年时期至黄州流放时期的转变。“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任团练副使一职。苏东坡一家在黄州的日子过得贫寒。苏轼在东郊开辟了一块荒地,自耕自足以此解决温饱,“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东坡”,英文直译“East Slope”成为傅励君所著这本书的题目。

本书探讨苏东坡从青年时期初入仕途到中年不得志,被流放黄州这些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作者细致地分析苏轼前半生的经历及其对他个人作品的影响,并分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讨论苏轼父辈那代的文学现状及问题,而这些历史所遗留的问题和自我主观意识的觉醒影响了苏轼的诗词;第二章探讨1059~1060年苏轼进京赶考的诗作及1062~1065初次为官时期作品,而第三章紧接着对第二章所列举的诗做分析;第四章集中研究苏轼在黄州时期诗,反映个人主观意识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体现。“乌台诗案”后苏轼所经历的磨砺,日后成为他的精神和心灵的养分,最终促成他在黄州时期创作了最为重要的一些作品。第五章探究苏轼在黄州时期个体主观意识的思考和转变;最后一章回顾黄州时期的诗词,总结

在艰辛乡野生活下苏轼的内心独白。

《苏东坡之路》一改传统的叙事方式,以苏东坡青年至流放黄州为时间轴,通过人物年谱的研究,进一步分析苏轼的作品。这本书一出版便受到北美学界的关注。明尼苏达州亚洲文学部教授 Paul F. Rouzerpi 认为《苏东坡之路》一书的成果在于^[14]205~216:其一是通过苏轼早年的仕途辩证分析他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时间可从追溯至苏洵、苏轼和苏辙离开家乡眉山,赴京赶考,到苏轼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再到还朝任殿中丞判登闻鼓院,随后又受党派之争,谪居黄州。次年,筑东坡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二是苏轼同时代的儒学复兴对他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作者认为在理学成立之前,苏轼不仅是对儒学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更是对人生有着透彻、深入的体悟。

艾朗诺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5]313~323发表了一长篇的评论,中肯地批评了傅励君的学术价值及问题。艾朗诺认为该书是一部基于清代王文诰整理、编著《苏轼诗集》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是一部苏东坡前半生的编年史著作。通过苏轼的早年大事记整理、分析他的作品和思想演变。但是艾朗诺对线性年谱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而作者并没有提及隐藏于其中的问题意识,例如主题、诗的形式、诗歌偶发性等议题未在书中展开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傅励君的重点篇章,是对苏轼作品中理学思想的探讨。作者将“理”(Li)翻译为“内在模式”(Immanent pattern),而不是“原理”(Principle)。在第三章中作者详细地分析理学为苏轼诗歌创作的核心。傅励君认为理学是解读苏轼作品的关键词。的确,理学在苏轼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作者忽略了自我与世界关系这一层面在苏轼的创作中作用。理学并不是苏轼作品的全部元素,也没有阐述苏轼所体现的个人意向与他所欣赏的唐代诗的不同之处。苏轼的作品还蕴含了其他的关键概念,包括学识、自我培养和美学。这些关键词像“应物”(Responding to things)、“自然”(Spontaneity)、“不留”(Non-attachment)、“无心”(No-mind)比“理”更频繁地出现在作品中。

艾朗诺还提到如何将苏轼的诗集分类归册的问题。傅励君将苏轼的作品以他任官时期的创作地来分类,分别是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这样的分类方法也被学界反复争论。而 Kathleen M. Tomlonovic^[16]在她的博士论文《放逐与回归的诗歌:苏轼研究》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年谱叙事方式,探究黄州、惠州和儋

州三个时期的流放和苏轼的诗歌创作。人到晚年的苏轼，回顾自己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曾这样评述自己的仕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过，《苏东坡之路》依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海外汉学译著中，本书对古典诗词、专业名词的翻译极为准确，即保留了西方学者的很多习惯性表达，但同时也有中国学者著述论文时的雅驯用词。Tomlonovic 教授赞许了傅励君所做的材料和文献整理工作，包括中文诗句的准确翻译以及详细的参考书目，诗歌中英文目录和人名翻译等研究工作。^[17]

（三）艾朗诺《苏轼生活中的言语、意象和事迹》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艾朗诺教授是国际研究北宋文学最为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早年向白先勇先生学习中文。近年，他多次访华，围绕“艺术与人文”系列议题与各大专院校进行学术交流。他的著作《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和《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相继于 2013 年、2016 年被翻译、出版。《苏轼生活中的言语、意象和事迹》是艾朗诺另一本重要的研究苏轼、北宋文化著作。本书以佛教和儒家思想盛行的 11 世纪为时代背景，在王安石变法兴起与争论下，分析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作者阐述了苏东坡对治理、佛教和经典文化的观点，尤其是关注到苏轼的词、绘画和书法中探寻主体性的问题。在最后一章中，艾朗诺重新思考苏东坡作为“文人”开宗这一角色，并对北宋文人的传统理解提出新的挑战。作者在书中曾这样评价这位历史伟人：“苏东坡经常努力（在诗中）表现关于世界较为客观的立场和观点，一种超越了主观性的立场，但他又保持着一个生动鲜明、富有人情味、令人难忘的抒情诗人形象，苏诗既承认诗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同时又质疑自我的地位。”^{[18]9}

汉学家管佩达^[19]认为，作为一位学术严谨、刻苦钻研的文学史学家，艾朗诺能从大量的史料和研究专著中，巧妙地避开众人云云的研究课题，独辟蹊径地聚焦于一些苏轼在思想和生活上被人忽略的点，例如与苏轼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苏东坡对宗教的思考，甚至是个人情感上激昂和悲情。书的开篇是以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当时的苏轼刚刚步入政治仕途，怀揣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心，坦言治理之道，反对变法之流弊，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反而招来诸多的非议，最终成为党派之争下牺牲品，开始了他一生的颠沛流离。书的最后一章转向苏东坡在文人画上的造诣。宋代被视为文人画兴起的时代，而苏东

坡正是文人画的奠基人，他的绘画和书法理论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莫过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20]147~152}

《苏轼生活中的言语、意象和事迹》被誉为了解苏东坡、中国宋代必读的专著，但书中也有多处值得商榷。管佩达认为艾朗诺过于主观化地评述苏东坡的生活和社交圈，比如苏轼的朋友一直与他相隔千里，聚少离多，但我们在《西园雅集》却看到以苏东坡为核心，志同道合文人所促成的元祐雅集。^{[20]152} Stuart H. Sargent 则在另一篇书评中提及，书中“结论”一章过高地评价了苏东坡，与中国的学术论文、专著的观点多有雷同之处，这可惜与前文精心布局，细致研究不相匹配。^{[21] 191~197}

四、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主要特点

苏东坡是一位罕见的全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政治才能兼备，而他的绘画和书法也是独树一帜。他生前遗留的作品和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因此，研究苏东坡的涉及面广且多维度。从上文所介绍的译介、传记和专著来看，英语系国家以研究苏东坡的诗词为主线，同时涉及苏东坡的思想、政治立场、艺术成就等方面，以此反观北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语世界的苏轼研究并不局限于苏东坡的作品，有些学者借苏东坡同时代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分析，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苏东坡。比如，包弼德（Peter K. Bol）近期的论文《文同的墨竹》，文同是苏轼的从表兄，擅长画竹子。苏轼曾向文同学画墨竹，俩人是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在画论和技法上颇有共识。苏轼所创“枯木竹石图”与文同的绘画息息相关。^{[22]395~441}又如，刘和平在《挽周人色：徐铉、郭忠恕、王禹偁、苏轼流放视角下的“江行初雪”与“雪霄江行”》，论述王诜受苏轼流放的经历所感，创作《烟江叠嶂图》^[23]，这张水墨山水画背后有苏轼行书诗并跋，以及王诜唱和诗二章并跋，可谓是集诗、书、画一身的旷世杰作。

其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汉学能融汇贯通到艺术史学研究，与中国的学术交流甚是密切，中文典籍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不断地提高，例如在北美学界有像艾朗诺、高居翰^[24]和石慢^[25]在汉学或是中国艺术史领域的重要学者。这些学者基于对中国艺术史和诗词的理解，他们将苏轼作品放在中国诗与画关系下去考察、研究。例如，卜寿珊（Susan Bush）对北宋文人画中诗画关系讨论的精彩研究；Stephen Wilkinson 和孟久丽（Julia Muray）

分别对前后《赤壁赋》的叙事诗篇的图绘；^{[26]7} 韩文彬（Robert Harrist）关于《西园雅集》郊游考及李公麟应邀苏东坡及其友人之请作画的研究；^{[27]170} 巫鸿在《废墟的故事》分析苏轼前后《赤壁赋》所衍生出两种叙事性的绘画，一种是连续的叙事及单幅绘画，描绘苏轼一行泛舟观赤壁一幕。^{[28]89~90} 虽然，苏东坡的墨宝被流传下来的不多，他的“诗画一律说”理论为文人画确立了方向，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宋以后的绘画创作，还牵涉到文学思想、儒家等多方面的议题，为后世研究提供多样的研究客体。

表2. 1970年后在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代表作品

作者	著作名称	年份	出版社
Susan Bush	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 Su Shih to Tung Chi-chang	1971	Harvard University
A. R. Davis	On such a Night: A Consider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of the Moon in Su Shin's Writing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1977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George C. Hatch	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 A Sung Bibliography by Michael A. Fuller	1978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Ronald C. Egan	Poems on Paintings: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1983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heng-Lian Sim	Su Shih and His Disciples	1984	University of Sydney
Xu Long	Su Shih: Major Creative Critical Insight and Theories	1985	University of Nebraska
W. L. Idema	Poet versus Minister and Monk: Su Shi on Stage in the Period	1987	Toung Pao
Beata Grant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Poetry of Su Shih	1987	Stanford University

Egan. Ronald C	Ou-yang Hsiu and Su Shih on Calligraphy	1989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Kathleen M. Tomlison	Poetry of Exile and Return: A Study of Su Shih	1989	Washington University
Yang, Vincent, Series	Nature and Self: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Su Dongpo, With Comparisons to the Poetry of William Wordsworth	1989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ies
Egan. Ronald C	Su Shih's Notes as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ource	199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Michael A. Fuller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1990	Stanford University
James M. Hargett	The Travel Records [Yu-chi] of Su Shih: Chinese Studies	1990	Springer Open
Charles Hartman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	1990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Kathleen Tomlison	Nature and Self: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Su Dongpo with Comparisons to the Poetry of William Wordsworth	1991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Jonathan Pease	Contour Plowing on East Slope: A New Reading of Su Shi	199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Kathleen M. Tomlison	Review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by Michael A. Fuller	199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Charles Hartman	The Inquisition against Su Shih: His Sentence as an Example of Sung Legal Practice	199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Hatch George	Su Hsun's Pragmatic Statecraft in Ordering the World :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199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ul F. Rouzer	Reviewed Work: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h's Poetic Voice	1993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Beata Grant	Mount Lu Revisited: Buddhism an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Su Shih	1994	Hawaii University
Watson, Burton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	1994	Copper Canyon Press
Egan. Ronald C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	1994	Harvard-Yenching Monograph Series
Stephen Wilkinson	Painting of Red Cliff Prose Poems in Song Times	1995	Oriental Art Vol. 27
David R. McCraw	Reviewed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	1995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Benjamin A. Elman	Reviewed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	1995	Harvard of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Stuart H. Sargent	Reviewed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	1997	Toung Pao
Peter K. Bol	Reading Su Shi in Southern Song Wuzhou	1998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Robert E. Hergel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Red Cliffs: On Reading Su Sh	1998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James M. Hargett	Clearing the Apertures and Getting in Tune: The Hainan Exile of Su Shi	2000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Murck Alfred a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200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Ronald Egan	The Progra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Su Shih, Wang Shen, Mi Fu's Collections and their problems	2006	Harvard University
Yugen Wang	The Limits of Poetry as Means of Social Criticism: The 1079 Literary Inquisition Against Su Shi Revisited	2011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Yang Zhiyi	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1037 - 1101 in Poetry (Review)	201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Yang Zhiyi	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1037 - 1101 in Poetry (Review)	201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Peter C. Sturman	The Subject in Wen Tong's Ink Bamboo	2017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ng Painting

结语

综上所述，苏东坡的研究在英语世界并不算是主流的汉学研究课题，但从上世纪中叶至今，相关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苏东坡的研究在本体研究和诠释方法上有突破前贤之处，而这些成果转换为海外学者的著作，国际汉学研究的课题，高校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课程及国内出版社引进宋代研究专家的最新著作。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梳理，并对若干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做些初步的评析，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共同来推动苏东坡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注释

[1] 石慢 (Peter C. Sturman) 《宋画的挑战》，载《宋代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 胡建君《元祐文人圈与文人画的发展》，载《中国美术学院》2010 年版。

[3] (英) 阿瑟·韦利《中国诗歌集》(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伦敦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18 年版。

[4] 王国强《〈中国评论〉在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载《文史选粹》。网站：www.counselor.gov.cn/wsxc/2009-10-24/10292.shtml。

[5] 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 1949-1972》，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6] 万籁《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综述》，载《国际汉学》第 26 辑 2015 年版。

[7] 《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成立于 1941 年。1956 年 9 月，改名为现今的名称《亚洲研究期刊》，关注亚洲的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及书评。网站：www.zh.wikipedia.org/zh-hans/%E4%BA%9E%E6%B4%B2%E7%A0%94%E7%A9%B6%E6%9C%9F%E5%88%8A。

[8] Shau Wing Chan (1907~1986)，出生于中国广州，中国教育家。1937 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门洛市公园图书馆董事会主席，美国东方社会成员。网站：<https://prabook.com/web/shau-wing.chan/624975>。

[9] Shau Wing Chan《〈苏东坡传〉书评》，载《远东季刊》1948 年第 7 卷第 3 期。

[10] 《远东观察》(1935~1961) 是《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 的分会刊，研究重心在远东问题，同时兼顾整个亚洲研究。

[11] (美) Woodbridge Bingham《〈苏东坡传〉书评》，载《远东观察》1948 年 17 卷第 9 期。

[12] 傅励君 (Michael A. Fuller)，加州大学东亚语言和人类语言学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他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理论与语言技巧。他近期的著作包括：《人文：中唐时期诗歌和审美经验转变》收录于 2018 年《合川先生荣休纪念文集》；《倦夜：对中国古典传统中肉身诗学的反思》，中国学术出版社 2017 年版；《中国诗歌经验解释：对宋诗史的反思绪言》，《新宋研究》2001 年版；《苏东坡之路》，斯坦福出版社 1990 年版。网站：www.faculty.uci.edu/profile.cfm?faculty_id=2794。

[13] 艾朗诺 (Ronald Egan)，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研究系教，美国东方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博士后。他研究中国唐宋两代的文学、美学和文化史，著作有《欧阳修的文学作品》(1994)、《苏轼的文字、意象、和功业》(1994)、《钱钟书〈管锥篇〉选译》(1994)、《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200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出了中文版)、《才女的累赘：李清照的作品与接受史》(2013)。网站：www.ihss.pku.edu.cn/article/index.aspx?nodeid=107&page=contentpage&contentid=1016。

[14] Paul F. Rouzer《〈苏东坡之路〉书评》，《宋元研究》1993 年第 23 期。

[15] 艾朗诺《〈苏东坡之路〉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报》1992 年第 52 卷第 1 期。

[16] Kathleen M. Tomlonovic，西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17] (美) Kathleen M. Tomlonovic，《〈苏东坡之路〉书评》，载《中国文学》1991 年第 13 卷。

[18] (美) 艾朗诺《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刘小获和元美编辑，载《知中：幸会！苏东坡》2017 年。

[19] 管佩达 (Beata Grant)，华盛顿大学中国和宗教研究教授，1987 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她致力于佛教，中国宗教和文学研究，尤其是关注前现代下中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她近期的著作包括：《再看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生活及作品的影响》，夏威夷出版社 1994 年版。网站：<https://ealc.wustl.edu/people/grant-beata>。

[20] 管佩达《〈苏轼生活中的言语、意象和事迹〉书评》，载《中国文学》1995 年，第 17 卷。

[21] Stuart H. Sargent，《书评》，载《通报》1997 年，第 83 卷，Brill 出版社。

[22] (美) Peter K. Bol，《文同的墨竹》，载《宋代国际学术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23] 刘和平《挽周人色：徐铉、郭忠恕、王禹偁、苏轼流放视角下的“江行初雪”与“雪霄江行”》，载于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主办的“雪、雪景和 10 世纪以来流放的风光”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24] 高居翰 (James Cahill, 1926~2014) 汉学家、艺术史学家。他曾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山外山：晚明绘画》、《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及《图说中国艺术史》。网站：www.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85%E7%BF%B0。

[25] 石慢 (Peter C. Sturman)，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艺术史副主任，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他曾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员。他的著作包括：《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网站：<http://ccs30.ncl.edu.tw/page3-09.html>。

[26] (美) 高居翰《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27] 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28] (美) 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汪单，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和坡词：无咎酷肖东坡词的初度研判

李 静

内容提要 在苏门弟子中，晁补之是“苏派传薪的首选人物”，其于苏词之相似，始于其和坡词。和坡词中，从其櫟括词到对苏轼的有意效仿，到其《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等，体现了晁补之对于苏轼的追随。

关键词 苏轼 晁补之 和坡词

在苏门弟子中，晁补之与黄庭坚可谓苏轼词风的直接继承者，王灼《碧鸡漫志》谓：“黄、晁二家词，皆学坡公，得其七八。”^{〔1〕}元好问亦谓晁补之为学坡者：“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2〕}425况周颐云：“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唯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张文潜赠李德载诗有云：‘秦文倩丽舒桃李。’彼所谓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鸡漫志》云，黄、晁二家词，皆学坡公，得其七八。而于少游独称其俊逸精妙，与张子野并论，不言其学坡公，可谓知少游者矣。”

^{〔3〕}四库馆臣更谓其“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陈振孙于淮海词下记补之之言曰，少游词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观所品题，知补之于此事特深，不但诗文之擅长矣”^{〔4〕}1810。先师刘扬忠先生总结说：“是苏门文人中受苏轼词风影响最深且学苏最为用功的一位。自北宋以来，论者对别的词人评论颇多分歧，唯独对晁补之则一致认定其为苏词嫡派，王灼《碧鸡漫志》列举由北宋晚期到南渡时期诸多学苏词人，独许黄庭坚、晁补之两家学苏‘韵制得七八’；金人元好问论苏词流派，将黄、晁两家并列为上继苏轼、下启辛弃疾的两家（见其《新轩乐府引》）；清人更一致推崇晁氏为苏派传薪的首选人物。”

^{〔5〕} 59

然则晁补之词之学坡，所得者何？如元好问所言，“吟咏性情”或可为东坡词派之一大特征，而“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6〕}恰如四库馆臣所谓“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4〕}，此亦可谓知无咎者。

作为“苏派传薪的首选人物”，晁补之在20岁的时候即拜入苏门，成为苏门中的一员，其对苏轼的服膺，首先便是从诗词文的学习开始，这种学习有时可能首先是形式上的模仿：

“补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集中如《洞仙歌》第二首填卢同诗之类，未免效苏轼櫟括《归去来词》之颦。”^{〔4〕}为方便比较，兹将晁补之所櫟括之卢同原诗《有所思》及所效苏轼之《哨遍》引述如下：

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
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
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
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不见心断绝。
心断绝，几千里。
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
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
含愁更奏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美人

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卢同《有所思》

当时我醉，美人颜色，如花堪悦。今日美人去，恨天涯离别。青楼朱箔，婵娟蟾桂，三五初圆，伤二八、还又缺。空伫立，一望一见心绝。心绝。顿成凄凉，千里音尘，一梦欢娱，推枕惊巫山远，洒泪对湘江阔。美人不见，愁人看花，心乱念愁，奏绿绮、弦清切。何处有知音，此恨难说。怨歌未阕。恐暮雨收、行云歇。窗梅发。乍似睹、芳容冰洁。

——晁补之《洞仙歌·填卢全诗》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櫟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余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苏轼《哨遍》

作为宋词改革的先锋，苏轼在词体上的革新，表现是多方面的，櫟括更是其中的一个有益尝试，“学术界都认为苏轼开创了櫟括词体，就自觉的文体而言，确是如此。”^{〔7〕}从櫟括一体的尝试看，苏轼的《哨遍》无疑是成功的，宋末张炎在其《词源》中说：“《哨遍》一曲，櫟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8〕}而苏轼于词之櫟括体的成功尝试，引得了晁补之的浓厚兴趣，并仿照其体例而櫟

括出《洞仙歌》一曲。于此而言，四库馆臣的“效颦”之论或有失之偏颇之处，在宋词词体发展尚不完善的时代，晁补之的仿效苏轼在櫟括体上的尝试亦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因为，“‘以诗为词’是宋人尤其是苏轼时代极为通用的将诗改编为长短句歌曲的方式，反映了诗改变体式入乐歌唱的过程。”^{〔9〕}

如果说晁补之《洞仙歌·填卢全诗》更多的是从创作模式上对于苏轼《哨遍》一词的仿效，体现出了词人创新词体的努力，那么《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则更为显见地体现了晁补之对于苏轼的追随：

谓东坡、未老赋归来，天未遣公归。向西湖两处，秋波一种，飞霭澄辉。又拥竹西歌吹，僧老木兰非。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应倚平山栏槛，是醉翁饮处，江雨霏霏。送孤鸿相接，今古眼中稀。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登临事，更何须惜，吹帽淋衣。

晁补之此词所和者乃苏轼之名篇《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时在巽亭》：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有关苏轼此词之本事，苕溪渔隐曰：“东坡别参寥长短句云：‘有情风……’《晋书》：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颜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海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还都，寻薨。羊昙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大醉，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恸哭而去。东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论，必以为讖矣。然其词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先生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自后复守颖，徙扬，入长礼曹，出帅定武。至绍圣元年，方南迁岭表，

建中靖国元年北归，至常，乃薨。凡十一载。则世俗成讖之论，安可信邪。”^{〔10〕}苏轼与参寥子之间的友情确令后人敬仰：“钱塘道潜禅师，以诗见知于苏文忠公，公号师为参寥子，凡诗词迭唱更和形于翰墨，必曰参寥，及交吕丞相公著，与简牍则称曰妙总老师。浙江石刻存者甚多，后公离钱塘，以长短句别之曰：‘有情风……’仲温莹禅师赞曰：‘噫！今世之小生，于有道宗师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于一诗僧尚尔敬重，况道德崇重者乎？’”^{〔11〕}至若此词之成功，晚清著名词家郑文焯谓：“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桀。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贴之工。”^{〔12〕}可谓得之矣。

晁补之此篇追和之作，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苏轼于元祐七年三月，由颍州改任扬州知州，九月即奉诏回京，补之和篇必作于苏轼知扬州任时。”^{〔13〕}⁵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晁补之此篇《八声甘州》虽云和作，但绝无亦步亦趋之痕迹，如果撇去所和苏轼之原作，谓其为原唱，亦无可。若与原作对照来读，我们又可发现，不但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在词的章法、句法上与苏词原作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是形似，而且在情感上、精神上与乃师苏轼有着高度的契合，是神似。

以篇章的安排而论，晁补之和作与苏轼的原唱即保持着一种一致性，上片说人，下片言己；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言志抒情。即连起句，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东坡原唱云：“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晁补之则曰：“谓东坡、未老赋归来，天未遣公归。”一云无情、有情，一云归、未归，虽然一说物，一说人，其实一也。无情与有情，归与不归，一由自然而然定，一由人事所成，皆非词人自己所能左右者，故在矛盾之中，都能见出词人的无奈，这是深层的情感储藏，未明见于字面，但是却是诗人真实的情怀之所在。其下数句：“向西湖两处、秋波一种，飞霭澄辉。又拥竹西歌吹，僧老木兰非。”与苏词“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一样

的美景，让人神往；而“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与“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二句，亦均以议论结束上片，一种旷达，几多感喟，何其似也！晁词过片：“应倚平山栏槛，是醉翁饮处，江雨霏霏。送孤鸿相接，今古眼中稀。”说的是当下，苏轼现任扬州知州，而其恩师欧阳修亦曾这里留下了一处“平山栏槛倚晴空”的盛景——平山堂。而词中櫟括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句：“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化用入神，了无痕迹。此数句与苏轼原唱：“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时间虽有差别，一说现在，一说过去，但一样的高情远志，千古之下仍能让人想见其形容。而晁词收束之数句：“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登临事，更何须惜，吹帽淋衣。”直言其终身追随之志，直叙其情，亦与苏词结尾数句“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深情厚谊与高情雅趣的抒发，直接而深情，手法上实无二致。

综而言之，晁补之和作与苏轼的原唱，直可谓形神兼得：相似的胜景，师友之情的真挚告白，归欤之志的高调表达，说晁补之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4〕}，诚不虚也。

如果说，晁补之的《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已颇得东坡之风神，那么这一首《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直有出蓝之姿：

归去来兮，名山何处，梦中庐阜嵯峨。
二林深处，幽士往来多。自画远公莲社，
教儿诵、李白长歌。如重到，丹崖翠户，
琼草秀金坡。生绡，双幅上，诸贤中履，
文彩天梭。社中客，禅心古井无波。
我似渊明逃社，怡颜盼、百尺庭柯。牛闲放，
溪童任懒，吾已废鞭蓑。

晁补之此词所和苏轼《满庭芳》有两首，一首为：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
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
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
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此首题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公自黄移汝，盖甲子正月二十五日有命，三月皋下，四月离黄，此词为别黄之作。”^{〔14〕} 425

其二为次年所作，其词序云：“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羨，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和五年的黄州谪居生活之后，在离别黄州之时，苏轼写下了一首《满庭芳》，寄寓自己的惜别之情和归欤之志，而在一年之后从泗州到商丘之时，蒙恩放归阳羨，词人又写下了一首《满庭芳》，则是道出了人生太多的无奈，“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入仕之初的雄心壮志，历数十载的人事变迁，换来的却是壮志难酬，故而词人欲归隐而去。

晁补之“此词亦作于退居金乡东皋时。闲居岁月，忆及南迁道上庐山旧游，追慕莲社高贤及陶潜的高蹈风流，于是晁补之因《莲社图》而寄托幽思……图成意犹未足，所以再就词咏之，直抒胸臆，层层铺写，融己于中，使古今一体，生动体现了自我的襟怀志趣。”^{〔15〕} 153 同苏轼的两首词相比，晁补之的次韵之作在归隐之趣的书写上有着相似的表达，一样的豁达，一样的萧散，而晁词无疑要走得更远，其归隐思想的表达更为彻底，更为直接。尤其是词的最后数句：“我似渊明逃社，怡颜盼、百尺庭柯。牛闲放，溪童任懒，吾已废鞭蓑。”比之于苏轼的“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和“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一种闲趣，跃然纸上。故清人张

德瀛谓：“晁无咎慕陶靖节为人，致仕后，葺归来园，号归来子。观《琴趣外篇》，题自画《莲社图》词，及《呈祖禹十六叔词》，淡然无营，俯仰自足，可以挹其高致。”^{〔16〕} 如果把南宋词人李流谦所作的同样是次韵之作的《满庭芳·过黄州游雪堂次东坡韵》作一对比：“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旧山闲却岷峨。雪堂重到，但觉客愁多。来往真成底事，人应笑、我亦狂歌。凭阑久，云车不至，举盞酌东坡。少年，浑妄意，斗冲剑气，雷化龙梭。到如今，翻羡白鸟沧波。松柏毕吾手种，依然口、烟蕊霜柯。君知否，人间尘事，元不到渔蓑。”同苏轼的原作和晁补之的和作相比，刘词多了些豪放，少了些旷达，与苏词原作“归去”之主旨不甚相侔。

注释

- [1]王灼《碧鸡漫志》卷2。
- [2]元好问《新轩乐府引》，《遗山集》卷36，第1191册。
- [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2。
-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8。
- [5]刘扬忠《宋词十讲》，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 [6]刘熙载《词概》。
- [7]吴承学《论宋代隳括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原注：饶宗颐先生说：“论者多谓此体始于东坡隳括《归去来辞》，为《哨遍》，按敦煌出土有隳括《孝经》之《皇帝感》，存十二首，乃七言四句体。”见《词集考》209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今检敦煌出土的文献3901《新合考经皇帝感辞》十一首，然诗中提及张赛与织女等事，似非隳括《孝经》之作。
- [8]张炎《词源》卷下。
- [9]杨晓霭《“以诗为词”亦“隳括”创作词调歌曲》，《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 [10]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 [11]（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10。
- [12]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
- [13]刘乃昌、杨庆存校注《晁氏琴趣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14]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 [15]（宋）晁补之著、乔力校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 [16]张德瀛《词徵》卷5。

李静，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东北苏轼研究会副会长。

从学文到学人的转变：晁补之对苏轼的服膺

孙赫男

内容提要 在苏门弟子中，晁补之与苏轼交谊甚深。其于苏轼之服膺有一个从对苏轼文风的崇敬，向其人品仰慕的转变过程。从学文到学人的转变，表明晁补之与苏轼交谊的深入，由此也赢得了苏轼对于晁补之的认可和激赏，并奠定了二人一生亦师亦友的友情。

关键词 苏轼 晁补之 服膺

晁补之为一代名士，其早年即才气过人，深得同时人的赞许，与晁补之交谊颇深、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他为晁补之所撰之墓志铭当中，这样评价晁补之：

公讳补之，字无咎，幼豪迈英爽不群，七岁能属文，日诵千言。年十三，从王安国于常州学官，安国名重天下，于后进少许可，一见公，大奇之。公从祖考杭之新城，公览观钱塘人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苏公轼通判杭州，苏公蜀人，悦杭之美而思有赋焉。公谒见苏公，出《七述》，公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公以文章名一时，士争归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誉公如不及，至屈辈行与公交，由此公名籍甚于士大夫间。举进士，礼部别试第一，而考官谓其文词近世未有，遂以进御，神宗见之曰：是深于经，可革浮靡。于是名重一时，遂中第。^{〔1〕}

晁补之聪明早慧，深受王安国、苏轼的赞赏，并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为当朝皇帝所认可。而其与苏轼交谊之深，在“苏门四学士”中甚为特出，苏轼与晁补之二人何以能够相互激赏，个中缘由颇为值得探究。

晁补之始谒苏轼的时间与地点，已经有方家作了考证，具体“是在熙宁五年的上半年，

即他20岁时在杭州拜于苏轼门下的。”^{〔2〕}这在晁补之及第后给苏轼的书信中也有清楚的记录：“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先人方强仕，家固自如。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及第谢苏公书》）^{〔3〕}卷52而早在五年之前，晁补之已然开始阅读苏轼之书：

不佞生十五年，知读阁下书。阁下盖尝自谓学出于孟子矣。孟子之学以详说者为说约，而执中者为近之，远以知天事一，大以观海之澜，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于食槁之蚓，兼陈杂举而会归于理，则其所统者可知。始补之不能识阁下之心，而窃观其为文，豪重敢决，旁肆横发，呼吸阴阳，出入鬼神，愕然莫穷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尝闻而未晤，每睹而不识者，而皆会于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泽，以观风云之相遭，奔腾交会，窈冥昼晦，摇川震谷，蹶木发屋，忘其岐道之所从，城郭之所向，而顷之雷止雨息，光景复开，则四海一色，物象皆还矣。以是察阁下胸中千变万态，不可殚极，而要萦纡曲折，卒贯于理，然后知阁下所之为自许者不诬也。天下之事方且争雄斗妍，自立门户，则虽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阁下之实者，又乌能一一而识阁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约者哉？——《再见苏公书》

〔3〕卷51

这篇订交前的投谒书信，充分表达了晁补之对于苏轼的崇敬之意，而崇敬的着眼点则在于苏轼的文风，晁补之为苏轼的“千变万态”“萦纡曲折，卒贯于理”的文字所深深折服，故而在文中给予了深深的肯定和敬仰。

除了纵横开阖的文风外，晁补之最初对于

苏轼的崇拜，首先源于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

阁下布衣单车，崎岖出蜀，一日而声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来降，向风而交驰，可谓有盖天下之名矣。横身当职，不肯碌碌，出辞吐气，无所阿避，可谓有服天下之实矣。然则天下之所为望而化者，非阁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虽县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闽，而闽之人感厉读书颖脱而出者，相望于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阁下亦既知之矣。阁下之入吴也，吴人固已有随舳舻于末流，望冠盖于后尘者，使阁下少借之以貌薄诱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变哉？故补之将首为吴人庆，而次为天下有望于阁下而化者庆也。某，济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学术不足以自致于阁下之前，独幸阁下官于吴，而某亦侍亲从宦于吴也。故愿随吴人拜堂庑而望精光焉。盖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贤且善也，而方其盘辟俯俚从众人之后，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嫌，补之虽不能，亦阁下所宜容而矜之。传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辄敢进其说，以累执事者，伏惟幸恕而少进之。——《上苏公书》⁽³⁾ 卷 51

这篇最初的投赠文书清楚地表达了少年时的晁补之对于苏轼的崇敬，“布衣单车，崎岖出蜀，一日而声振四方”，这或许也是晁补之所向往的“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人生际遇，而对于苏轼的期许，于此文中亦可睹见。在最初的日子里，晁补之对于苏轼的崇拜，多源于其文的汪洋恣肆。与晁补之“少同学而齿差长”的李昭玘云：

某记为童时，先生父子兄弟，一旦出岷峨，四方士大夫称诵其文曰：有宋已来，未尝见此文也。至采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书，人人以为长编大轴，手自操札，较其所得多少，以相轻重。某是时尝得其本于亲家，虽未能深达义趣，读之反复，不知所以不能废。后数年，偶友人晁补之自新城侍亲归，云：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

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晁君气豪迈辨博俊敏，下笔辄千言，纡余卓犖，驰骋擎斂，各尽其妙。尝曰：此文苏公谓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苏公以为然者也。又数年，先生罢东武，还朝，晁君见先生于京师。既归，昏夜扣门，开轩置烛，出先生新文十余篇，促席吟诵。晁君健辞气，每道先生言语，至险绝处，口吃如不快意，须臾风雨暴落，窗撼烛灭，倏忽之间，疑有神物。二人者独把卷啜嚅，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⁴⁾

如果说文字的风格和苏轼本人传奇的人生，尚且属于直观的、浅表性的一种吸引的话，那么随着交往的深入，晁补之对于苏轼道德人品的敬重逐渐成为其服膺苏轼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由此实现了从文到人的转变。晁补之在其《祭苏公端明文》⁽³⁾ 卷 61 中云：

笃生苏公，干櫓圣门，跼韩躅马，匪以其文。知孔子圣，文莫犹人，若大且难，以藏厥身。世无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

而在《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中，晁补之对于苏轼也作了这样的评价：

补之于苏公为门下士，无所复赞，然刚洁寡欲，奉己至俭菲，而以身任官责，嫉邪爱物，知无不为，尤是不忽细务，其有所不得尽，视去官职如土芥……来书犹怪其尚气好辩，此非补之所能知。⁽³⁾ 卷 52

从学文到学人的转变，表明晁补之与苏轼交谊的深入，由此也赢得了苏轼对于晁补之的认可和激赏，并奠定了二人一生亦师亦友的友情。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⁵⁾ 1868 中，苏轼这样说：

少年独识晁新城，闭门却扫卷旆旌。
胸中自有谈天口，坐却秦军发墨守。
有子不为谋置锥，虹霓吞吐忘寒饥。
端如太史牛马走，严、徐不敢连尻脰。
徘徊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
避人聊复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
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幘。
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
老来饮酒无人佐，独看红药倾白堕。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尤可值得注意的是“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数句。平山堂为欧阳修知扬州时所建，欧阳修在送刘敞出守扬州的时候曾经深情地写道：“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苏轼亦曾化用欧阳修词中词句，作《西江月》词一首，怀念其先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6) 237}此数句以自己与欧阳修之见的师生之谊，来期许晁补之与自己的关系，从中亦能见出苏轼对于晁补之的厚爱。

在晁补之与苏轼之间交往日深之后，晁补之对于苏轼的崇敬益增，其于苏轼之人格的崇拜可见于其及第后给苏轼的书信：

祇荷宠光，出于己分，既愧且惧，不敢为荣。昔齐主父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相与排摈，不容于齐。西入关，资用乏，诸公宾客颇或厌之。乃上书阙下，一岁四迁，主父因言削诸侯、徙豪杰，或意其太横。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厄日久矣。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补之读《史记》至此，以谓士穷不见遇，发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则为非计。私自记刻，虽穷不为。盖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先人方强仕，家固自如。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自吴归鲁，先人谢世，家四壁立。偏亲需养，婚嫁日逼，少业慵惰，不能作业。念无以奉朝夕，束书薄游，为苟且之图，分外得之，粗饱为幸。夫画虎类狗，既非本心，而转衣为裳，则所不能。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关者，夫岂得已。补之敢不益自检束，期终教育之赐。拳拳之心，言不能数，惟阁下裁择。——《及第谢苏公书》^{(3) 卷 52}

尽管自己生活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顿之处，但是依然保持着高洁的品格，并以苏轼作为自己的学习楷模。

晁补之的这种自我期许，也得到了其师苏轼的赞同与认同，苏轼在其《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三借文与可画竹之事以赞赏其品格之高洁：“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朝来又绝例，谀墓得霜竹。可怜先生盘，朝日照苜蓿。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竹作为岁寒三友，其高洁之品性历代为文人所歌唱，苏轼有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5) 448}在这里，苏轼自引了曾经的诗句，说“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言下之意是在赞扬晁补之的“不俗”。在《戏用晁补之韵》^{(5) 1523}中，苏轼亦云：“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在这首诗中，苏轼亦是对晁补之贫苦的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同时亦赞扬了晁补之颜回式的不以贫贱为怀的高洁品格。

苏轼对于晁补之的赞赏，并不是因为其生活的困顿而心生怜悯之意，更在于其相似的品性和人生志向。苏轼一生崇仰陶渊明，对陶氏所作诗歌首首必和，其《和陶饮酒二十首》^{(5) 1881}有序云：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以明志，并且在诗歌写成之后给弟弟子由和晁补之看，这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于晁补之的信任和垂青。而在二十首《饮酒》诗中，第十九首是专门为晁补之而作，其诗云：

晁子天麒麟，结交及未仕。
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己。
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
歌呼时就君，指我醉乡里。
吴公门下客，贾谊独见纪。
请作《鵬鸟赋》，我亦得坎止。
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5) 1881}
诗歌中对于晁补之过人的天赋给予了肯

定，并且以吴公与贾谊来比附自己和晁补之的关系，“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⁷⁾苏轼之所以以贾谊比晁补之，一方面在其才能，另一方面则注重的是其怀才不遇的人生困境，在这一点上，苏轼对于晁补之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

在看了苏轼的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晁补之也写了《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组诗中的第二首即将苏轼和陶渊明引为同类：

陶公群于人，而无人之情。
诗岂世外语，世语不可名。
东坡怜此翁，同调但隔生。
形光来户屦，真处人不惊。
得酒自醒醉，放意无亏成。⁽³⁾

诗中认为宿舍和陶渊明是“同调但隔生”，是隔世的同调，而在第十首中，晁补之在认为苏轼是郭泰式的人物：

苏公士冠冕，复似郭有道。
知士未达间，趣操保耆老。
精钢试九火，劳倦容不槁。
为州第饮酒，况此年岁好。
藏锋避世故，轻敌丧吾宝。
时来用毫末，勋业自世表。⁽³⁾

晁补之说“苏公士冠冕，复似郭有道。”郭有道何许人也？东汉名士郭泰也。蔡邕为郭泰作碑传云：“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纓綬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

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

⁽⁸⁾晁补之此诗谓其师苏轼“苏公士冠冕，复似郭有道”，一则是说苏轼在当时为士林之冠，其影响力与郭泰有相似之处，二则是苏轼的“藏锋避世”与郭泰的高蹈避世之志亦有着一致性。故而在第十二首中，晁补之决心追寻苏轼，薪火相传：

斋居忽若遗，不识身与境。
颇疑酣中似，奈尔辄复醒。
东坡自云然，挈世一裘领。
是事吾有师，安敢囊出颖。
指穷火已传，岂待得薪炳。⁽³⁾

正是在苏轼文风 and 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晁补之一生追随苏轼，不但在诗词上与其师苏轼多有唱和，而且在人格上也自觉以苏轼为楷模，终生服膺。

注释

[1]张耒《晁太史补之墓志铭》，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34。

[2]刘焕阳《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晁补之《鸡肋集》。

[4]李昭玘《乐静集》卷10。

[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6]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8]蔡邕《郭有道碑文并序》，《文选》卷第58。

孙赫男，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探析

卓夕又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一诗之创作背景，以见诗作所表达之真实情感，并借由诗作所描述对象之状况，探讨其由他人之况反观诸己后之心情。全文分为三个部分，首言诗作之“创作背景”，从苏轼作此诗前所经历之时事，以及由此可看出之心理状态着手；次言“诗题考辨”，对谢仲适和王敏仲北使这一史实作一补充；“诗作内容”，除探讨该作之内容外，更进一步由苏轼前后之诗文，探讨其赴知定州途中之心境，以及潜藏在此首赠别题材诗作下之情感；“结语”则综合以上分析之史料和诗文来证实苏轼此刻虽心系朝廷、以天下为己任，但却早已厌烦官场，甚至心灰意冷之复杂心情。

关键词 苏轼 《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元祐八年

元祐八年（1093），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事任。十月，赴定州途中，于时任相州知州谢仲适之府上，送别以起居郎出使辽国之王敏仲，并作《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1]1992}，诗云：

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
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
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
喜有贤主人，共惜残烛光。
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
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幸子遇明主，陈经入西厢。
归期不可缓，倚相宜在旁。

一、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元祐八年十月，苏轼赴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军州事途中，过相州，为他人送行之作。其写作背景为元祐七年末，苏轼自扬州再度还京，待南郊祀典毕便奏乞越州（今浙江绍兴）；八年三月，受御史黄庆基、董敦逸“围攻”，于六月再度乞越，诏不允，并于二十六日除知定州；期月后三度上书乞改知越

州，仍不允，无奈于九月别京，十月抵达定州。今以三乞越州和尘埃落“定”分论之。

（一）三乞越州

1. 元祐七年十一月主动请外

早在自元祐二年（1087）后，苏轼已频繁乞外。元祐四年（1089）三月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于四月简家定国云：

轼连岁乞补外，请越得杭，恩出望外。

可知于七年（1092）末三乞越州前，苏轼早有乞越之心并付诸行动。至于为何乞越州，可于知杭州时与王庆源之尺牋及元祐八年七月第三次上札乞越时略观一二，《与王庆源十三首》十三^{[2]1816}云：

某为郡粗遣，衰病怀归，日欲致仕。……自数年日夜营此，近已乞越，虽未可知，而经营不已，会当得之。……

另有《乞越州札子》^{[2]1043}云：

臣自去岁蒙恩召还，即时奏乞越州。盖为臣从仕以来，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于为政。又以老病日加，切于归休，旧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为归计。越虽僻陋，在臣安便。

可知乞越州乃作归计。而请越得杭，虽求小郡未果，然得守旧郡，故地重游，亦算得其所望，可见东南一郡乃苏轼心之所向。再者，从《与王庆源》中可知，苏轼至杭后应尝再度乞越，乃其欲致仕之举。

后自元祐六年（1091）二月除翰林学士承旨以来，苏轼更是连上四状辞免乞郡；五月承旨告命后，又两度上章乞郡，终于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七年二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

好景不长，哲宗大婚毕，须行郊祀之礼，八月苏轼除兵部尚书，并差充南郊卤簿使，虽沿途数辞，无奈大礼日迫、不得迁延。故十一月待南郊礼毕，苏轼便急忙上章乞越，此乃其于元祐年间二度还朝后之首次主动请放，《任兵部尚书乞外郡札子》^{[2]1041}云：

臣于本州及缘路附递入文字辞免，准圣旨札子指挥，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臣以此不敢坚辞，寻于南

京附递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来已过郊礼。伏乞检会累次奏状，除臣知越州一次。取进止。

此次还朝乞越，不仅不允，还除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除之后，苏轼便急忙再上《辞两职并乞郡札子》^{[2]1041}和《第二札子》^{[2]1042}，云：

臣近奏乞辞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恩命，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诏不允。……但本缘请外，更蒙升擢，兼带两职，近岁所无，有何劳能，被此光宠。……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职名，即乞除臣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

可知越州或东南它郡之于苏轼乃最好不过，实在不可，宁外放重难边郡。离京之心迫然。

2. 元祐八年六月因川党之议请外放

元祐八年三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番上书论苏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若辙与轼，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此而不治，命令轻矣。……^{[3]11477}

五月，三省同进呈黄庆基三状言苏轼，抨击更甚，云：

按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羽，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轼在先朝，咨为歌诗，谤讪朝政，有司推治，实迹具存。……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盖既敢讪谤，则是怀无上之心矣，自古奸臣，未见此比。惟其权势熏灼内外，故士大夫各怀顾望，不敢尽言。^{[3]11495}

黄庆基已从董敦逸的“就事论事”上升到了人格攻击，从“天资凶险”到“小人之雄”、“君子之贼”，最后乃至“奸臣”，闻之莫不惊心，如此之词妄加于苏轼之身，虽亦非初次，然已年近六十之老人，在近两月的交相抨击之下，早已心力疲累，促使他于六月再度上章乞越。虽不允，但以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除知“重难边郡”——定州。^{[3]11515}

3. 元祐八年七月请改定知越

七月，苏轼再奏请改知越州。《乞越州札子》^{[2]1044}云：

及近者蒙恩知定州，虽宠眷隆异，而自早衰多难，心力疲耗，实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辞免，是有拣择，所以施强拜命。今复念，定虽重镇，了无边警，事权雄重，禄赐优厚。若辞定乞越，于义无嫌。伏望圣慈察臣至情，特赐改差臣越州一次。则公私皆便，臣不胜幸甚。取进止。

然终未允，尘埃落“定”。观其于元祐初年请外，至两度还朝，期间请辞不断，合计不下十次；若独计元祐年间之请越次数，应不下五次；特别最后一乞，祈愿之动人，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卑屈，大有抵死以求感动圣心之意，令人不禁感怀。前文提到，苏轼在返朝后除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曾上札乞外，且碍于之前乞越不成反除两学士，故此次乞外便“降低要求”，求一重难边陲。可此次，虽最终得一重难边陲，却仍顶着头皮再次求改越州，可见其心意之恳切、愿望之强烈。观之屡与友人、乃至朝廷剖述衷肠，致仕之心可见一斑，此亦乃其为何数次乞知越州之根本原因。

最后，虽不获东南，亦得以外放，不至于继续身处这不由己力之繁杂漩涡中。然所知定武乃边陲重镇，与东南之期相距甚远，致仕之途变得崎岖而漫长起来。关于此时心境，苏轼于《与杨济甫十首》其八^{[2]1810}中如是说道：

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会合何时，临书凄断。……

身处朝廷之漩涡深处，饱受攻击，连番乞越不允，辞定不获，一句“勉强北行”，心酸备至，身亦受疾，实在不是一名垂垂老者所能承受。诗人末了凄然喟叹道，不知何时才能再度相聚，可知这一道政令使得他与自己一直以来规划的致仕之途背道而驰，遥遥之不可期。

（二）尘埃落“定”

1. 太皇太后仙逝

除知定州事已定，八月苏轼之妻王闰之卒，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卒。

其时，部分别有用心者借哲宗积怨已深的不忿之气，开始蠢蠢欲动，一时颇有墙倒人推、排山倒海之感。

而此时之苏轼，已有预感，然其秉持一贯作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除了抓紧时间向皇帝进言尽忠外，别无他法。不过心中恐怕已有定数。对未来之不定，甚至可称之为绝望，

更加重了苏轼此番北上之茫然无期感，从他给其弟苏辙之临别诗中可以感受得到：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苏轼《东府雨中别子由》^{[1]1991}

2. 不得面辞

若太皇太后之仙逝预示著苏轼未来之不定，那么其朝辞北上却被拒之殿外一事，就更加昭昭然了。

元祐八年九月末，苏轼出帅定武时，按例应入朝面辞，未知哲宗却直批书令起发赴任，不得入见。于不悦与忧心之际，苏轼只得上书《朝辞赴定州论事状》^{[2]1018} 劝诫：

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

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

以上论述，纵引先例，劝诫陛下应广纳言路，不该以迎接人众之理拒之不见。且自己日侍帷幄五年——可谓亲近，犹不得见；更何况定州乃延边重地，竟毁祖宗之法，此般必将难以自通！由“此何意也”和“有何不可”这两句简短、坚决，且激烈之言辞，可见苏轼对于此事之不悦、不满、不甘和不忿。而如果说前半段是以不满与无奈为主，那么第二段之忧国忧民便尽露其表。从太皇太后去世，到朝辞不获，苏轼已经感受到了圣意，其于忿怨之余，以“下情之通塞”劝诫哲宗，便是想于临行之前，再尽自身最大之努力，使哲宗感念旧恩，千万不可以偏信新党一派，置社稷于不顾。其虽深感无力回天，仍谆谆不厌；虽早已计划致仕，仍在职不忘忠恳。然则此令宋孝宗屡读流涕之篇，于此时之哲宗却无动于衷，不得不令人希嘘。其中“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可谓一语中的，实乃其早已深谙未来之政势，故临行不免怅惘黯然。

3. 离京赴定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赴定，与众友留别，“人客如织”，过京城，至陈桥、相州、真定，

一路或会晤友人，或投赠诗简，于十月下旬到定州任，进谢上表。其中，途径相州时，作《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二、诗题考辨

诗题《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中之“谢运使仲适”，冯应榴注云：“续通鉴长编载：元祐八年二月，淮南等路发运副使谢卿材知相州。……王昶金石粹编载谢卿材饶益寺题名石刻：朝散大夫临淄谢运使仲适……”，可知谢仲适即谢卿材。笔者亦在《范太史集》卷五十五中查阅到明确记载^{[4]页2上}，可知谢卿材字仲适，确凿无疑。

“王敏仲”冯本记载详尽，此不略述，仅就“北使”作一考析。施注云：“进右司口郎、太常少卿，奉使契丹，迁户部侍郎……”，榴案：“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即北使也……”。此处先纠一误，即施注云为“太常少卿”应为误记，因《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皆为“太府少卿”。查阅宋史本传，正如施注所云，王古（即王敏仲）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后便迁户部侍郎。然据《长编》载，王古乃元祐五年迁太府少卿，而《长编》元祐八年六月云“甲寅，……秘书少监王古为起居郎”^{[3]11509}，即元祐八年十月苏轼赴定州过相州时王古应以起居郎使辽。观《宋史翼》云“迁太府少卿奉使契丹……七年为秘书少监……”^{[5]223}，此处记载之奉使契丹于太府少卿时，若可信，则王古必尝于起居郎时再度使辽；若不可信，则《宋史》载之“奉使契丹”应于任起居郎之后。又观《辽史》云：“元祐八年……又东坡有送王敏仲北使诗……以太常少卿使北亦应当在此年”，显然误甚。然是否二使，或清《宋史翼》误记，已无可考，不过确凿的是元祐八年十月王古确以起居郎使辽，并于相州会苏轼。

三、诗作内容

（一）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

全诗通过描写河北之苍莽风光起发。

阮籍《咏怀·步出上东门》有“寒风振山冈”一句，借描写此肃杀秋气以抒发自己内心之凄怆。而苏轼此处“冲风振河朔”在形式上对阮籍诗有所继承，在环境之描写与情感之表达上则有所差别。冲风乃猛烈之风，河朔即河北，尤言河北地区风势之剧，振彻一方。“飞

雾失太行”点化自“雾失交河城”。施注云此句出自鲍照，实则出自南朝范云所作之《效古诗》^{[6]页9下}，诗云：“风断阴山树，雾失交河城。”尤言大雾弥漫，使行人不辨东西。苏轼由都城出发，过陈桥至相州，太行山在怀州，是故“飞雾失太行”更像是运用了夸张之手法，“飞”字承上言之“冲风”，“失”则凸显雾之大且浓，而结合下文之“须眉黄”和“洗眼”，笔者更倾向于将此飞雾理解为尘土风沙。纪昀评此句“起的精神”^{[1]1993}，虽如此，然面对此情此景，不免生发苍茫之感。

后两句由景转入，先写果，再写因，且因果互证。“下马须眉黄”言河朔风沙太大，行路之人顶风前进，至下马时才发觉毛发全被黄土风尘所沾染，是故即便是旧友亦“相逢不相识”，此句也反过来印证了风沙之大，令人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纪昀评此句“非经行这，不知黄字之妙”，此处“黄”乃形容词活用作动词，言唯有亲历此处，方能体会到须眉变黄并非夸张之语。施注引李白《和卢侍御通塘曲》云“相逢不相识，出没绕通塘”，苏轼于熙宁八年亦所作《卢山五咏》之《卢敖洞》云“还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识”，然此两句之意与本诗中此句之意实则相去甚远。

（二）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喜有贤主人，共惜残烛光。

“洗眼”尤言飞雾之大，必须拭目以细看方才可见。而一“忽”一“惊”更是搭配巧妙，有“海内存知己”之妙。翻译成白话颇有“定睛一看，原来是你”之动感，活灵活现，如历目前。这突如其来的重逢之喜，让行路于滚滚黄尘中的诗人倍感亲切。“玉节”乃玉制之符节，帝王之使持之以为凭，故“玉节郎”代指使者，此处指王敏仲。

“贤主人”指谢仲适，观此句，与前句对比，可明显感受到诗人与二者关系之亲疏。查阅苏轼诗文集，除此外，只有题为《谢卿材可直秘阁福建转运使制》、《谢卿材陕西转运使制》制勒两篇，可知其与苏轼少有交游。实则与苏轼“共此残烛光”者，着重在于令之“洗眼忽惊笑”之“玉节郎”王敏仲，谢仲适是以“贤主人”之角色出现，这与诗题侧重于“送王敏仲北使”一样。基于此，我们来解“共惜残烛光”句。

该句是从杜甫《赠卫八处士》点化而来，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言乱离时代，亲友之间一旦离别，便如同参商二宿，此起彼没，难以相见，而今日老友重逢，共此烛光之下畅叙前缘，可

谁知此一去，后会何年？杜甫在此诗末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道出了重逢之日亦是再别之时的中心情愫。而苏轼在此化用该句，虽言喜相逢，实则早已带入了伤离别之感。不过，诗人用一“惜”字，表明离别固然悲伤，则当下之人更应共同珍惜此难得之相聚时光。

然查阅苏轼诗文，发现在此之前王古与苏轼并无往来，当然亦不排除只是未留下诗文记载。因无可考，故若真于此前无往来，并非似杜甫和卫八之老友重逢，那么从本诗可看出王古与苏轼之一见如故。从此诗之后，特别是苏轼于惠州、王古于广州时，二人便颇多书简往来。但据“洗眼忽惊笑”句，笔者更倾向于他二人之前应有交游，只是未留下记载。

（三）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欧阳修《送贾推官赴绛州》云“白云汾水上，人北雁南飞”。人生有聚有散，如在梦中，离人往北，归雁飞南，都是世间常事。虽然多有惆怅，但亦要认清这一永恒大势。

无论“吾生如寄耳”或“送老天一方”，都是苏轼之常叹了。其中“吾生如寄耳”从熙宁十年至建中靖国元年原封不动地于苏轼诗中出现了九次。第一次是于熙宁十年知徐州所创作的《过云龙山人张天骥》^{[1]749}云：“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徐州工程学院陈晓认为，“苏轼把生命的本质理解为‘寄寓’的同时，也把‘寄寓’当作人生态度。”他进一步阐释，“‘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便处处可超然，处处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7]第二次是元丰二年的《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1]935}：“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苏轼以不改其旷达本性，令官吏百姓莫挽留，亦莫哀愁，朗言道“宁独为此别”，可谓豪放备至。元丰三年《过淮》^{[1]1023}：“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和元祐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1]1699}：“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以一种恬淡闲适、安居一隅、珍惜当下、轻视名利之态度一表心怀。元祐五年《和王晋卿》^{[1]1422}：“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元祐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1]1899}：“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建中靖国元年《郁孤台》^{[1]2429}：“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则可看作是对过往的一切灾祸，包括贬谪海南等等的一笔勾销。一句“吾生如寄耳”，便可消去蒙受的一切诋毁和苦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看淡和洒脱。

因此，这七次所作之“吾生如寄耳”句，其精神都可大致归为侧重于转悲为喜之超然。而于绍圣四年所作的《和陶拟古九首》之三^{[1]2261}：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则与前七首之情感皆不同，它在于叩问生命，最后以“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结尾，“透出诗人丝丝缕缕的生命的荒凉”^[8]。而本诗之“吾生如寄耳”固然亦有转悲为喜之超然，但除此之外，却比前七首更多了一份苍茫和哀怨，这要结合下一句来理解，故具体阐述详见第四小节。

另，虽无与“送老天一方”一字不差之句，但与其有相同含义之诗文，亦出现了不下四次。^[9]

（四）幸子遇明主，陈经入西厢。归期不可缓，倚相宜在旁。

诗人于感叹自身“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后，立刻笔锋一转，由“幸”字发文，替友人王敏仲欣慰，感叹其幸能得到君王知遇，仕途平顺，得以入西厢为皇帝讲经。因此，如果说在上一节所列之“吾生如寄耳”是转悲为喜之超然的话，那么经过“幸”字转折后呈现在这里的“吾生如寄耳”显然就比它们平添了更多的惆怅和自怜了。如河北科技大学吴增辉言，“心态的审美化是有限的，且并不彻底消解人生痛苦”“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这一本身就极具审美化价值的诗句，放置于与“如寄”的人生观同一风格的诗句中间，就更能凸显其超然的格调。但放置于如本诗一样，语境有所转折的诗句中，不仅难以凸显超然之风，还被反衬出了更多的积郁感、自怜感和惆怅感。当然，也并非完全否认超然意味的呈现，并非完全否认心态审美化的力量，只是在于它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纵然如何旷达自适、如何超然洒脱，也并不能彻底割舍掉痛苦本身的存在。

末句之“倚相”乃春秋楚国左使，常以史劝谏楚君，使其不忘先王之业，故深受敬爱，被誉为“良史”。时王敏仲任起居郎，与倚相同属记录君王言行之职，故以此赞美之，并劝勉其早日完成北使，归还帝旁以行劝谏之功。

另，冯应榴案云此处之“明主”同《史记》之《苏秦列传》中所云之明主：“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然结合全诗之意，如明主真有所指，则不免令人臆想非非。再观苏轼之其他诗文中所用之明主，如“不愿君为孟浩然，却遭明主放还山”和“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笔者更倾向于此处之明主应仅指代君王，侧重“主”这一具体之对象，而非侧重“明”这一抽象概念。

四、结语

从元祐二年到元祐八年，期间有过两次还朝。每一次还朝，诗人都一再乞求外放，且心仪越州久矣，但直到最后出知定州，也都没有实现这一愿望。诗人在应酬唱和之作中也多次提到数次乞求外放之事，如“乞郡三章字半斜”（《七年九月，自广陵召还……》）^{[1]1974}、“我顷三章乞越州”（《雪浪石》）^{[1]1999}。平白而观，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一个早已过知命之年的老人，早已厌倦官场，尤其是充斥着是非纷争之京城，只希望得一小郡悠然安度仕途末年，最后致仕还乡。然而，诗人最终受命不得不出帅定武，虽能远离风暴中心，但心情是忧郁且无奈的，“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再加上太皇太后仙逝，又朝辞不获，忿怨之后，更多的也是对未来国事和自身命运之担忧。致仕之路眼见着曲折起来。此时，在相州相会好友王敏仲，作诗送其使辽，除了相聚之喜外，更多的是结合自身与好友现状进行对比，再次发出“吾生如寄耳”的感叹；同时亦祝愿好友、勉励好友，应酬之余，也可从中读出一点自怜、心酸，还有归休无期的怅惘。

注释

[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4]范祖禹《范太史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卷5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陆心源《宋史翼》，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6]萧统编、李善等注《宋本六臣注文选》，卷31，广文书局1964年版。

[7]陈晓《“吾生如寄耳”：苏轼在徐州的文学创作思想浅论》，《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7月15日。

[8]吴增辉《“吾生如寄”与“此生安归”——苏轼晚年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6月15日。

[9]《扬州谢到任表》：“盖以鱼鸟之质，老于江湖之间。”《和桃花源诗》：“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与王文甫》：“本意终老江湖，与公扁舟往来，而事与心违，何胜慨歎。”《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一首》：“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得俄顷。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卓夕又，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宋元时代的木假山诗文

张 洵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苏洵一族围绕特殊藏品木质假山的诗文以及当时与后世人的唱和与仿作，论述宋人是如何消解了“玩”的执念，转而交流的诉求和心灵的对话。

关键词 木假山 诗文 喻象转化 美感想象

山水及其替身假山水对于文人来说，既是陶冶性情的方式，又是激发灵感的来源。中晚唐时期，喜好庭园和盆景之类的诗人为数甚多（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假山水是诗人们选择了一种更为便捷的方式，将作为精神寄托的“壶中天地”携带在身边，尽管如此，这种欣赏与爱好却因为“嗜物”而受到批评，如石癖被看成是一种物恋（fetishism）和痴癖（obsession），北宋诗歌不断地对石癖进行更高层面的道德、哲学和历史的批判（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那么，仅是枯燥的道德批判是否能解释宋人究竟是如何在诗文中从“玩物”的困扰中突围出来的呢？后世的人在接触这一类题材时又是如何接受先行文本的？本文通过苏洵一族围绕特殊藏品木质假山的诗文以及当时与后世人的唱和与仿作，论述宋人是如何消解了“玩”的执念，转而交流的诉求和心灵的对话。

宋人与唐人对于山水的爱好有明显差异，这点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唐代文人爱好庭园是表达对于山林的向往。白居易堪称唐代喜好庭园盆景方面的代表，其《庐山草堂记》中自云有喜山水病癖，但这篇记文却通篇只是沉醉在对山水的欣赏当中。即便是杜甫，其《假山》诗序中云：“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

至，而作是诗”，小小的土山使诗人不禁有尘外之想，山水对于诗人仿佛是世外桃源，其诗云：“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只是描绘假山的景致，并没有过多的延伸。对唐人来说，假山石只是真山水的化身，齐己《假山诗序》云：“假山者，盖怀匡庐有作也。往岁尝居东郭，因梦觉，遂图于壁。迄于十秋而攒青叠碧于寤寐间，宛若扪萝挽树而升彼绝顶。”而对于理性的宋人来说，真、假之辨是很分明的，他们深知“假的”终究不能替代“真的”，为了化解这一尴尬，选择用各种方式赋予假山水以新的意义。

一、苏洵《木假山记》：仁人君子的象征

苏氏家族至少收藏过三座木山，除了一座小型的可随身携带以外，另外两座皆远在千里之外的眉山。诗人们不得不通过想象，进行虚化的描述。这使“木山”成为了多面形的、具有特殊性的歌唱对象。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遥远使得诗歌的喻象不固定化，随着时境与心情的变化，产生出种种不同的投影，而最终这些创作活动本身亦成就了诗人的形象。收藏木山是唐代以来文人爱玩假山、嗜石、蓄石趣味的衍生，但又具有特殊性，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奇特的爱好，也为后人加深记忆发挥了作用，通过它可追寻到苏氏这条线索，木山成为了三苏精神的象征。

苏洵收藏的第一座木质假山是他在眉山时偶然在江中拾得，此木未经任何人工雕琢，天然成形，因其有三峰并峙，状似三人鼎立，故收藏于家中。但在当时却并没有留下文字。到

了嘉祐二年（1057），他携二子在京师赴省试之时，才为作《木假山记》：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觉汨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蘖而殤，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文章开篇便从木的生长写起。文中巧妙地避开了过多描绘木山如何精致，而是一开始就提到了树木这一种物体可能遭受的种种命运，其中蕴含了普遍的人生哲理。当时苏洵的文章因有欧梅等人的大力宣扬，已经声名远播，朝廷正在考虑对他破格录用。作者选择在这一时期创作这样一篇文章，无疑是自我心境的表露。树木成长时期便有种种“幸”与“不幸”，成为栋梁之材有斧斤之患，不可谓全幸。不成材亦并非彻底的不幸，他标举的“最幸”者乃是这不幸之中的万幸，即沉湮于泥沙之间，为人赏识（录用），所谓最“不幸”者乃是已天然雕琢成的“器”没有欣赏之人（好事者）。这让人不禁联想起苏洵在青年时期游学四方，中年时期闭户读书，不事科举的经历。最后总结

出这一座木山的得来乃“有数存其间”（文中也称之为“理”），所以自己是否能被朝廷录用亦在于“数”而已。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关乎我心。第三段话锋又转，提到自己喜好的不仅是它形态似山，更让他感慨的是三峰各自凛然不可犯的形态极似儒家所提倡的精神。“爱”与“敬”本就是儒家提倡的态度，从“爱”到“敬”的升华是本文的关键。苏洵提到了很多形容君子人物品格的词语，如“魁岸踞肆”“意气端重”“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岌然无阿附意”等，而对于木山本身的细节鉴赏（如究竟是何种木头、大小体积、色泽等）言之甚少。这与后世纯粹的收藏家是迥然不同的态度。既可使他免于“玩物丧志”的讥评，也表达自我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点通过与上引杜诗对比亦可知晓，也许苏洵的设计是从杜诗“三峰意出群”一句衍化而来，不过已无法证实且无关紧要了。元末明初唐桂芳《白云集》卷六《三峰精舍记》中有“眉山苏氏抱特立之资，蕴超卓之学，假木山以文字自娱，岂真泥于物哉”。顺便提及，“三峰”是唐桂芳的号，其文章学老苏，四库馆臣称“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尝慕苏老泉闭户探颐，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辄谓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此苏老泉传法也。盖其平生宗旨如此”。

苏洵那篇与记文同时而作的诗可能因为不够出色没能流传下来，但记文几乎成了苏洵及其文章的代名词。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跋子瞻木山诗》中云：“往尝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请问作文关纽。”“庄周”之评当是源于记文中“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句，“韩非”当是指称最后的议论部分。两种不同风格的行文包含在一篇之中，形成了奇异的风格。黄庭坚熟读经子典籍，故而一眼看出苏洵此文中与先秦诸子散文的相通之处。楼昉《崇文古诀》评价“首尾不过四百以下字，而起伏开阖，有无限曲折。此老可谓妙于文字者矣”。“无限曲折”则是

指文章包含的多重哲理而言。

不仅如此，后世在谈到老苏或三苏时，也有列举此篇记文作为代表者，既是不慕荣华，随缘适性的象征，又是勾起三苏回忆的线索。如南宋姚勉《雪坡集》卷十四《送王新恩赴省》“老泉坡颖成名了，曾应君家木假山”，这是用木假山代指三苏赴京城参加省试的经历。明代王世贞《张即之书杜诗》中云“张温甫，书如苏家木假山，秃节挺秀，槎牙四书”，这是用木假山代称书法。木山因此成为寓有三苏形象的物品。

二、梅苏木山诗：喻象的转化

嘉祐二年正是苏洵在京师受到欧、梅等人推荐之时。当时梅尧臣为作《苏明允木山》（《宛陵集》卷五十三）。诗云：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雳夜落鱼鳧洲。
鱼鳧水射几千秋，蠹肌烂随沙荡流。
惟存坚骨蛟龙馐，形侔三山中雄酋。
左右两峰相挟翼，尊奉君长无慢尤。
苏夫子见之惊且喜，买于溪叟凭貂裘。
因嗟大不为梁栋，又叹残不为薪樵。
雨侵藓涩得石瘦，宜与夫子归隐丘。

这首诗作不单单是对苏洵记文的隐括，还提及了几项记文没有说明的信息：（1）木材为很珍贵的楠木；（2）体积非常巨大；（3）得自溪叟。这些信息有可能来自苏洵那首已佚的木假山诗，不过真实情况不得而知。至少木山在老家，梅尧臣是有可能亲眼见到它的，所以诗中加入了诗人大量的想象。“隐丘”代指的应该是眉山，说明作者认为此木山与苏洵的隐居愿望有关。当然不排除苏洵佚诗中很可能提到了归隐之事。“左右两峰相挟翼，尊奉君长无慢尤”一句似在指称苏轼兄弟对苏洵的孝顺。其实从苏洵的诗对二峰表达“敬”意可知，原文本不是指称二子的，但是梅尧臣却在这里偷偷地将喻象改换为苏轼兄弟，以三峰象征三苏。《诗林广记》后集卷七云：“圣俞此诗为老泉赋，盖形容三苏也”，然而又分析其原因是：

“愚按老泉《木假山记》以中峰自比，而以二峰比二子，读之使人如见三苏。圣俞木山诗正本此记之意，以形容三苏也。”楼昉《崇文古诀》中亦称“其终盖以三峰比父子三人”，可见这在当时已成为定论。

今存苏洵与梅尧臣交往的史料只有一篇书信，题为《与梅圣俞书》（《嘉祐集》卷十二），其中提到了自己本不愿出仕的志向：“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岛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致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

苏轼《书圣俞赠欧阳阍诗后》：

先君与圣俞游时，余与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圣俞作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若有鱼，与子同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傍。”

“年甚少”不知指何时，梅尧臣在嘉祐二年（1057）的省试中担任点检试卷官，而兄弟二人皆在此次考试中及第，应当在嘉祐二年以前所作。又因老翁泉其实也是二苏母亲程氏所在墓地之侧（葬地据《嘉祐集》卷十四《葬亡妻文》《老翁井铭》），此时程氏尚未去世（嘉祐二年四月卒）。这首诗中可能包含着许多隐喻，如泉中鱼可能象征着能否得到官职。雏凤凰用来比喻苏轼兄弟。百鸟比喻当时一般的普通文人。从梅尧臣的诗来看，他在给苏洵的对话中总是会提及苏轼兄弟，表明对苏洵来说，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抱有极大期望的。梅尧臣一面鼓励苏洵出仕，一面也对苏洵隐居愿望加以肯定，这种矛盾心态是因为他想要尊重苏洵的意愿。提到“隐丘”不仅是为了服从作者诗意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向世人宣扬苏洵的志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梅尧臣这首诗歌的艺术

手段，是他“高古”风格的代表之作。首句模仿杜甫《秦州杂诗》中的句子“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大蔽牛”的夸张手法出自《庄子》。这与苏洵记文在用典方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诗中从理到情，剥离了文中说理喻意的部分，而转化为歌唱亲情与乡关之情，于是从一篇议论文变成了一篇极富形象性的抒情诗作。

此外，嘉祐四年（1059），苏洵江行赴京师途中，杨纬（生平不详）又赠送了一座木山给苏洵，《类编老苏集》卷一有《寄杨纬》诗，其中提到自己对留在家乡的木山恋恋不忘，并表达了自己隐居京师的愿望：

家居对山木，谓是忘言伴。
去乡不能致，回顾颇自短。
谁知有杨子，磊落收百段。
拣赠最奇峰，慰我苦长叹。
连城尽如削，邃洞幽可歎。
回合抱空虚，天地耸其半。
舟行因乐载，陆挈敢辞懒？
飘飘乎千里，有客来就看。
自言此地无，爱惜苦欲换。
低头笑不答，解缆风帆满。
京洛有幽居，吾将隐而玩。

诗中提及了自己从真隐到吏隐，从大隐到中隐的转变。而体积庞大的三峰木石成为自己家乡的象征，这块随身携带的最奇峰则成为它的替代品。苏洵作此诗时是否受到梅诗的影响不得而之，不过他此时离开家乡前往京师，家关之思也在情理之中。诗的后八句提到有客人想要换走这块替代品，被他拒绝，说明即便是这块替代品，在他心目中也是很重要的精神寄托。

三、二苏及苏门的次韵诗：回应往昔与现实交

苏辙曾作过《木山引水二首》，《苏辙年谱》系于治平元年（1064），其时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也是在此时将杨纬所赠木山进行加

工：

引水穿墙接竹梢，谷藏峰底大容瓢。
将流旋滴庐山瀑，已尽还来海上潮。
乱点落池惊睡觉，半山含润沃心焦。
瓦盆一斛何胜满，溢去犹能浸菊苗。
檐下枯槎拂荻梢，山川迤逦费公瓢。
幽泉细细流岩鼻，盆水弥弥涨海潮。
但爱坚如湖上石，谁怜收自灶中焦。
苍崖寒溜须佳荫，尚少冬青石罅苗。

苏辙发明了一种保养的方法，即将木山置于瓦制盆池之中，时时用泉水沃溉，苏辙《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寿宫中怪石》：

仁寿宫中稽谷生，太湖苍石草间横。
兴衰换世身犹在，南北从人事已轻。
累石作台秋藓上，凿汧通水细渠清。
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记姓名。

是苏轼亦曾为怪石引水。用对待太湖石的方法来养护，可见对它的宝惜程度非同一般。在这两首诗作中，他也主要是在写自己的这种方法，并没有提及乡关之思。而苏轼《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中则提到了家乡的那座木山，其一云：

蜀江久不见沧浪，江上枯槎远可将。
去国尚能三犊载，汲泉何爱一夫忙。
崎岖好事人应笑，冷淡为欢意自长。
遥想纳凉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苏轼的诗歌乃是和韵，他无法做到像苏辙诗中那样细腻的描绘。直观感受不足时，便用想象来补足。所以取景一开始便是宏大的：前一首从空间上拉到遥远的家乡（蜀江），每联都是对比句式，将遥不可及的蜀江与可枯槎进行对比；将去乡国的历史事情与如今汲泉灌木的现实活动对比；将旁人的嗤笑与子由的自得其乐对比；将兄弟一同纳凉的美好回忆与凄清寂寞的别离生活对比。苏轼在想象的诗里用细密的构思来弥补和满足读者对阅读收获的要求。其二云：

千年古木卧无梢，浪卷沙翻去似瓢。
几度过秋生藓晕，至今流润应江潮。
泫然疑有蛟龙吐，断处人言霹雳焦。

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

这一首从时间上把古木加深历史感。从结构上来说，是浑然一体的，始终围绕着古木来写，像一篇完整的叙述文，但处处是想象，“几度”“应”“疑有”“人言”等字皆表达诗人的猜测，只有最后的议论抒发是出于古今现实的总结。这首其实也是刻意地采用了与上一首完全不同的路线来写。也可以说是想象决定了苏诗的内容。“材大古来无适用”是在回应苏辙诗中的“但爱坚如湖上石，谁怜收自灶中焦”，是用反讽的手法来对取进无门的现象进行抨击。苏轼曾作《木峰偈》：

元丰七年（1084）腊月朔日，东坡居士过临淮，谒普照王塔，过襄师房，观所藏佛骨舍利，舍山木一峰供养。乃说偈言：枵然无根，生意永断。劫火洞然，为君作炭。

这峰木山是否是杨绛赠给父亲的那块不得而知（苏轼曾有过类似之举，将父亲收藏的喜舍给寺院），不过确实实现了他所说的不必“惜物”的话语，亦可见苏轼对待物品的态度比较超脱（参看艾朗诺论著）。

元祐三年（1088），堂兄不欺长子千乘、三子千能从蜀中来，千乘得木山五峰，苏轼、苏辙分别为作次梅尧臣旧题父洵所藏木山原韵。苏轼的《木山》有小序：“吾先君子尝蓄木山三峰，且为之记与诗。诗人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今三十年矣，而犹子千乘，又得五峰，益奇。因次圣俞韵，使并刻之其侧。”事情的起因是他们的侄子又得到一座五峰的木山，勾起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苏轼诗云：

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
时来幸逢河伯秋，掀然见怪推不流。
蓬婆雪岭巧雕镂，蛰虫行蚁为豪酋。
阿咸大胆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
城中古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
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樵。
会将白发对苍巘，鲁人不厌东家丘。

苏轼此诗中包含着诸多信息。首先，所次之韵并非父亲苏洵的两首作品，而是梅尧臣的

诗歌。次韵梅诗是他们表达对曾经的诗坛老宿的追忆之情。二苏的次韵诗有一个特点，即作诗时往往因某事想起前人之诗作而次其韵。虽然此时已过了三十年，仍然追次其韵，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即刻次韵，但是此时正好借此机会表达追思。由此可以推测，为何不次韵其父苏洵的诗作，而是几乎完全是依据二手材料的梅尧臣之作呢？说明苏轼心中梅尧臣为赋诗一事与父亲的记与诗已融为一体，汇合成了“往昔”这个喻象。其次，诗歌中还需要涉及当时的作诗背景，即侄子千乘（从“阿咸”句可知）所得五峰，在诗的前八句皆费笔墨描述得来此木山的经过，采用的是拟人手法，将木材直呼为“木生”，像一则人物传记，这一写法也延续了苏轼一贯的诙谐戏谑风格（“鲁人不厌东家丘”等句）。河伯等句也延续了苏洵诗中用《庄子》典故的做法。第三，后六句回到作者主体身上。“城中有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水和竹是古人园林中不可或缺两种素材，代表着主人洁雅的品质，就像白居易所说的“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池上竹下作》），“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樵”让人联想起苏轼一生的愿望——买田。桤木何指？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云：“东坡《次王介甫韵诗》：斫竹穿花破苔，小诗端为觅桤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观诗》：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又《木山诗》：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可行樵。‘桤’字人少有识者，遍寻字书，亦皆无之。蜀中多此木，询之蜀人，则相传以为丘宜切。按介甫绝句所谓木有桤者，与移字同押，则知丘宜切为是也。按杜陵有《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诗》：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注：蜀人以桤为薪，三年可烧。又《堂成诗》：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注云：桤木下材，止可充薪可已，惟蜀地最宜种。”因此它是蜀地特有的一种木材。但此四句并不是指作者要回归家园，而是要以异乡为休焉之地。

苏辙诗题为《同子瞻次梅圣俞旧韵题乡舍木山》（《栎城集》卷十六）：

江槎出没浮犀牛，波涛掀天谷为洲。
江寒水落惊霜秋，危根瘦节鸣寒流。
脆朽吹去谁镌鏤，连峰叠嶂立酋酋。
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弃置空自尤。
猿号鹤唳岂无意，委蛇怪我怀羔裘。
西归父老拍手笑，笑忆翁子躬薪樵。
去时三山今有五，不问故园惟一丘。

苏辙的诗作在哥哥的基础之上而作，在这首诗作中，其实包括的因素愈来愈多。苏轼诗中大部分提及的是千乘侄的五峰木石，而苏辙诗题便明确提到他主要是写在“乡舍”的那座木山。苏轼的态度显得更为超脱，他甚至还能用戏谑的口吻来谈及此事，而苏辙则沿续了父亲的归隐梦，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和对家乡的思念当中。也许是兄弟二人在创作之初便商量过写作侧重不同吧，这种差异更可能与他们的性格有关。“西归父老拍手笑，笑忆翁子躬薪樵”是作者想象着西归后的场面，最后一句写故园的荒废，其实饱含着辛酸。

二苏的两首作品全都建立在想象之上，木山成为家园和亲族之情的代表。作为“当事人”的二苏，诗里没有哲理的思考，选择变成了开放式的维度，触角可以伸向往昔也可以是现在。反观苏轼收藏石头的爱好，无一不是将它们作为世外桃源的象征（仇池石、雪浪石），而关于木山却再也没有出现在诗中。黄庭坚《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云：“观东坡二丈诗，想见风骨巉岩而接人仁气粹温也；观黄门诗顾然峻整，独立不回，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尝目之为东都两石（石）笋也。”

苏轼门人李廌（1059～1109）有一首《大木山》（《济南集》卷二）。元丰四年（1081）李廌到黄州拜见苏轼，此是二人第一次见面。

十洲三神山，广厚蟠地轴。
不知高几寻，沧溟及其麓。
游心如太空，视彼何芥粟。
君家三木山，包裹一握足。
铍锐曰奇锋，坳岩云峻谷。
摄心如蚍蜉，观此乃陵陆。
高庠作九地，何啻战蛮触。

老苏记木山，万里在右蜀。
立之置庭除，屹嶭可映屋。
小大虽相悬，真赝此其族。
因形生强名，等是千岁木。
君家襄城野，绕郭山抱绿。
巍然复岭外，自有真六六。

从结尾两句可知此诗作于苏轼被贬海南以后。李廌去世于大观三年（1109），不论怎样，其中所咏木山乃眉山之木山，故前六句皆为想象虚幻之辞，他所依凭和反映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三苏的人格，所以不要求准确性。诗人可以任意发挥想象，中间的具体描写可以从神话的角度，与开首相呼应。李廌《师友谈记》中还记载了他曾经送长沙猫笋与范祖禹，祖禹辄作诗为赋，廌的和诗中既寓以自兴之意，又要述前相知之情。而秦观亦和之。由此可见当时人在寄赠物品时唱和诗的常态，尤其是在回寄诗歌与旁人亦可和诗这点上，体现了唱和诗的交际功能。

上引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中还有“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实闻所未闻。今令其人万里在海外，对此诗，为废卷竟日”。

以上这些关于木山的诗文，基本上都不是建立在直观的形象审美之中，或是回忆，或是想象。这也是北宋诗人在与友人交往唱和过程中形成的创作模式。在没有相机、视频的年代，为友人所造所处的园林山水作寄赠诗，势必通过想象。诗人在这样的黑屋子里本只能依靠自由发挥，“宋诗人则进一步抛开客体世界，从外界返回内心，追求内心世界的自我完善”（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不过宋诗人还要考虑阅读者的感受，于是想象的物景与真实的情理结合，情与理必须是合乎逻辑的，物与景却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最终情理与物景都不是主要的，诗人的高超手段和他为所寄赠之人做过如何的考虑和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北宋人沉浸在诗艺的较量中，已无关乎当下的实际体验。

四、木假山的追忆之作：对经典的致敬

那么苏门以后之后的仿作诗文又如何呢？当然，收藏木山是一项冷门的收藏爱好，不过但凡有涉及木山的时候，老苏、梅苏、甚或是三苏间的诗文必会成为话题和诗中的应有之义。原本与木山无关的三苏人格也加入进来，形成了经典象征。不过这些诗歌大都是建立在实际观感之上，即见到物事，由此引发关于梅苏的联想。联想的固定化是这些诗作的特征。对南宋人来说，前辈诗人建立的意象典范是抛之不去的，他们本身也对此并不嫌弃。于是物景成为了他们自我对于前辈追念的引发物。或许对哲理本身的阐发其实也很有限，如果能使前代诗人成为自己笔下的对象，达到“通灵”境界，他们从中得到欢愉，仿佛得到了与前代诗人同等的灵感，他们所观赏的其实是前代诗人如何诗化灵感。

南宋建炎年间以降，苏文盛行，当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三苏的诗文成为士子耳熟能详的文本。南宋的喻良能（1120~？）对苏轼十分崇信，《读玉局集》诗中云“独嗟生苦晚，不得侍挥毫”，对于未得侍奉笔砚颇为遗憾。集中有颇多追和之作，如《同从兄季弟游香山追和东坡端竿游诸寺韵》《广信试院追和东坡催试官考校韵》《四月二十九日坐直庐读山谷效东坡作薄薄酒二章慨然有感追赋一首》《次韵王待制读东坡诗兼述韩欧之美一首》《怀东嘉先生因诵老坡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作十小诗奉寄》《元日追次东坡和子由省宿致斋韵》。在兴趣爱好上，他喜欢山水盆景，这点从其集名亦可看出，香山位处婺州（浙江义乌）县西，是他平日的爱游之处，建有爱山堂，又仿苏轼仇池石为友人所赠的皂湖石二峰取名“小三洞”，集中也有一些与盆景有关的诗歌。他的《自题木假山》（《香山集》）应该歌咏自己收藏的一块木山：

根干轮囷蔽马牛，何年飘泊寄沧州。
幽岩邃壑渔罾得，百巧千奇云浪搜。
好唤老泉来作记，肯将居士与同游。

毕宏韦偃丹青妙，画得天然意绪不。

诗歌的喻象和结构都在踏袭梅苏诗歌，第五、六句直接唤醒读者对三苏的记忆。只有最后两句算得他自己的构思，不过也称不上出色。即便是自己收藏的木山，因为有关于前代诗人的强烈记忆，所以整首诗都在前人阴影下写作。再如南宋赵蕃《淳熙稿》卷五的《四月十二日以夏潦暴甚，舫舟辰之铁枪崖下，偶得浮木于水中，宛然如山，因其形似名曰卧岭立峰，喜而赋诗，当寄交友之能诗者，求着语焉》一诗：

昔读梅苏木山诗，未信人间有此奇。
虽云尤物不必有，时一玩之何病为。
吾行东南千万里，仙游不已遂臻此。
奇奇怪怪日在眼，浩浩汤汤夜盈耳。
旧评峡江似严陵，此行佳处亦可朋。
又闻八桂好山水，亦应与此相云仍。
画师好手不可遇，诗中有画无其具。
江神好事不我尤，乞与一山酬愿素。
不知何年遭仆落，浪激波冲几飘泊。
岸高壁立自崭岩，浅坳深非斧凿。
老夫得之喜莫极，欲加名字相刻画。
卧之成岭立成峰，天成故尔非人力。
多言讬讬欲何如，要觅新诗为写摹。
余名敢与昔人并，用寄我友梅苏徒。

这首诗本是诗人自桃川至辰州（今湖南怀化市）途中偶得一块浮木，形亦似峰，诗人喜不自胜，称之为“尤物”。不过诗人描述这一喜悦之情时，却用很少的笔墨来写物品本身如何精巧，反而用了大量的笔墨在写与梅苏木石的关联，除首尾四句“昔读梅苏木山诗，未信人间有此奇”“余名敢与昔人并，用寄我友梅苏徒”是直接唤起读者的对于梅苏唱和的记忆以外，“江神好事不我尤”“卧之成岭立成峰”“多言讬讬欲何如”等句子皆是化自苏轼诗歌。可见诗人作诗之时，脑海里全是关于梅苏往事的记忆。又如元代陈栌《定宇集》卷十六《汪静轩木假山》：

嘉祐集中知木山，蛾眉盘屈小烟鬟。
三峰想堕虚无里，一记长流宇宙间。
峦岫游鱼今突兀，豪酋虫蚁久跻攀。

老泉坡颖皆人杰，古意萧萧力挽还。

汪静轩生平不详，集中又有《代达汪静轩》，应是为友人假山所作，而全篇都在重现梅苏木山的记忆。这样的诗歌中很难说有什么主观的意旨，有的只是对经典的致敬。作者并不是介入者，而是作为介绍者引导读者重回几百年前的世界。木山也早已失去作为“玩好”的价值，就像陈列在博物馆内的藏品，身上承载着前世的记忆。靠近它们的人如果不懂历史，便无法理解它的意义。而诗人像一位馆员，尽管各自用不同的语言，但绕不过去的是那段史实。这其实是所有山石庭园类诗歌都存在的情况，比如后人费尽心机收藏前人的藏品，其实在意的也是其上所有的前人痕迹。

但是也有一首例外，那就是陆游《剑南诗稿》卷四《木山》：

枯楠千岁遭风雷，披枝折干吁可哀。
轮囷无用天所赦，秋水初落浮江来。
嵌空宛转若耳鼻，峭瘦拔起何崔嵬。
珠宫贝阙留不得，忽出洲渚知谁推。
书窗正对云洞启，丛菊初傍幽篁栽。
是间着汝颇宜称，摩挲朝莫真千回。
天公解事雨十日，洗尽泥滓滋莓苔。
一丘一壑吾所许，不须更慕明堂材。

这首诗作没有直接点明三苏或梅苏，但是格局仍然跳不出前人窠臼。即想象楠木所经历的种种遭遇，“轮囷无用天所赦”仿佛是在回应苏轼诗中的“材大古来无适用”，将不幸化为幸运，意味更深一层。“不须更慕明堂材”则在句式上学习苏轼的“不须郁郁慕山苗”，所以在传统模式已被占领的情况下，表达倾慕和重走先人之路都不是办法，像苏轼一样在诗艺内部进行革新的手段才是唯一的出路。

五、代结语：乐在山水之外

不管是访真山水，还是玩假山石，但凡涉及到与前人有关的名物，只要其上已经形成了“经典”，曾经的阅读经验已是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象，就像咏梅会想起林逋，咏菊想

起陶渊明，“宋代诗人更热衷于从书本上寻找材料，而抛开直观的形象”（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对“文学史”的重新咀嚼，发掘其中的人文因素，同时起古人于九原之下，唤起与我神交与对话。这本是经典树立以后的诗人们面临的难题之一，但诗人却乐此不疲，宋至元代出现了很多这一类与经典对话的作品。无论是追和之作、效某某体、咏史诗等，大多是或取材或取意于“文学世界”的作品。

就像喻良能《峡桥》一诗中云“眼惊巫峡江山近，身在苏仙诗句中”，与其说他们从山水中收获美感，不如说他们从山水得来的美感部分来自想象中的名人与经典之作。在他们眼中，眼前的景物因有美好的诗句而越发秀丽，“当日春风生笔底，至今山色十分浓”（喻良能《次韵王待制游东坡留题十一绝》其一）；由诗句而想象诗人的形象与激情创作的场景，“细吟出月穿天句，想见挥毫落纸时”（同上，其五）；通过这种祭奠追悼活动，期待能得到灵感之神的垂顾“腐儒诗胆大于身，所恨陈言老未新。何日小舟江上去，一杯聊酹笔端神”（同上，其十一）；通过作同题诗得以与古人并名，“白傅苏仙名不灭，公名今在两贤中”（喻良能《次韵王待制题予庐山记后二绝》其二）。从苏洵直至南宋诗人，咏木假山的诗文，所“乐”皆在山水之外。明代以后则因距梅苏时代遥远且不甚崇尚梅苏等宋代诗人，这种心态便逐渐从木假山诗文中淡化和消褪了影响。

张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论南宋古文选家对苏轼文章的 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杨 曦

内容提要 南宋古文选家开始对苏轼文章进行编选与评点。他们首先选出以历史人物论为代表的一些篇目，以评点的方式揭示立意、遣词的特点。这种方式沟通了程式差异极大的苏文与时文，为士子以苏文学时文提供了诸多方便。这对于扩大苏文在南宋科场中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选家从苏文中归纳出的论体文写作原则至今也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其编选、评点也大大局限了士子理解苏文的可能性，并且使他们在阅读中产生了重法而轻义、重论体而轻其他的不良倾向。

关键词 南宋古文选本 苏文 时文 科举考试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100}所谓“苏文熟，吃羊肉”，是指士子如果能够熟读苏文，就可以比较轻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获取功名利禄、改变生活境遇。^[2]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当时人看来，只要能够熟读苏文，就可以写出像样的时文，而写出像样的时文，就可以获得考官的青睐，在场屋中脱颖而出。由此可见，苏文与南宋科举考试的关系，其关键就是苏文与时文的关系。但是如果继续追问这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这一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进入南宋以后，苏轼文章为时所尚，各地“坊肆争相编刻以谋刀锥之利”^{[3]116}，当时出现了有《东坡先生文粹》、《东莱标注东坡文集》等多种苏文选本。这些选本所选篇目最少也在200篇以上，如此之多的苏文固然可以给人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但是士子想要获得的是“时文速化之术”^{[4]32}，通过阅读苏文来研习时文作法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显然并不经济。而且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大的难题是，南宋时期科举时文已经高度程式化，如“论”就需要有论头、论项、论腹、论腰、论尾等五个部分，而苏文大多“自出机抒，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5]2624}，两者的结构形态相去甚远。因此，士子似乎也很难通过阅读苏文直接掌握写作时文的方法。那么，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这就有必要提及南宋古文选家对于苏文的编选与评点了。

四库馆臣在谈及南宋古文选本时说：“宋人多讲古文……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楼）昉此书（《崇古文诀》）而已。”^{[5]2619}即以吕祖谦、楼昉、谢枋得三人作为南宋古文选家的代表。明人叶盛则云：“宋儒批选文章，前有吕东莱，次则楼迂斋、周应龙，又其次则谢叠山也。”^{[6]103}在上述三人之外，还提及了编选《文髓》的周应龙。虽然在后世周应龙声名不显，但是既然叶盛将他与吕祖谦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在其心目中周应龙也算得上一位有影响的古文选家。所以本文即围绕这四家对苏文的编选、评点展开分析。

一、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及其用意

以往的古文选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选家对文章的评点，而对篇目的去取重视不足。但是选目与评点实为古文选本的两翼，选家选择哪些篇目、偏重哪类文体，以及如何安排次序都各有用意，在研究时不宜偏于一端，离开选目孤立地讨论评点。下文以成书时间为序，介绍这四位选家对苏文的编选情况。

吕祖谦所编之选本，名为《古文关键》（以下简称《关键》）。^[7]其成书时间约在

乾道年间（1165～1173）。^[8]此书收入苏文16篇，包括论10篇，策、序各2篇，碑、赞各1篇。“论”所占比重最高，达到了62.5%，接近三分之二，可见吕祖谦重“论”的倾向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十篇“论”文，除了《王者不治夷狄论》为经籍论之外，其余全为历史人物论。而且这些历史人物论的来源也相当简单，出自以下两部分：一是苏轼在嘉祐五年（1060）编定的《进论》；二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远谪儋州以后所作的《志林》。那么，吕祖谦为什么极少选择苏轼的其他“论”文，而将目光聚焦在《进论》与《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上呢？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

其一，苏轼的“论”文创作本来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时段，即治平三年（1066）之前与绍圣四年之后，其中又以早年的《进论》与晚年的《志林》最具规模。《进论》是苏轼在嘉祐六年（1061）为应制科考试而缴纳的《贤良进卷》的一部分，共25篇，包括《中庸论》等经籍论3篇、《大臣论》等主题论2篇，以及帝王论、名臣论、圣贤论等历史人物论20篇，具有较强的体系性，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至于《志林》，也是其加意之作。其子苏过说：“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9]112}，最终未能完成。检明成化刊本《东坡七集》，《后集》卷十一收有《志林》13篇，篇目数量与苏过所说只相差1篇，当即苏轼已经完成的部分。综合现存内容与百篇之数推测，此书如果撰成，应当是一部规模庞大、近于魏晋子书的著作，似乎苏轼有意借此总结一生读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后世之鉴。引人注目的是，《志林》除《论养士》之外，其余12篇均可视为历史人物论，其以历史人物论为主的倾向与《进论》毫无二致。朱熹说：“若长公之《志林》，则终身不能有以少变于其旧。”^{[10]3500}虽然是批评之语，但也敏锐地观察到《志林》与早期作品一以贯之之处。要之，《进论》与《志林》一早一晚，遥相呼应，共同彰显出苏轼文章学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11]958}的特点。两书中的历史人物论，堪称苏论的代表。

其二，从科举考试情况看，虽然论的命题范围较广，经、史、子、集都可出题，^[12]但是总体而言，仍以出于子、史者为多，故“论”当时又称“子史论”。南宋人魏

天应所编《论学绳尺》一书，收录了南渡以来省选中选的156篇优秀试论。其中论题以出于史书者最多，超过一半。在这些史论题中，又以围绕三代、汉唐君臣展开的人物论题居多，如《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论》、《文帝不及贾生论》、《晁错不能过崔寔论》、《太宗之美几成康论》、《颜真卿何如人论》等等，均属此类。因此，对于士子而言，学习历史人物论写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三，《进论》、《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适宜用来指导初学。苏轼在给二郎侄的信中曾经谈到，文章写作的审美追求应与其所处的阶段相应，“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而不可躐等躁进，一味追求平淡。他告诫二郎侄说：“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且当学此。”^{[13]203}所谓“旧日应举时文字”，自然是指包括《进论》在内的一系列应试之作。换言之，苏轼本人就已经开始将《进论》作为指导初学的范本了。《志林》虽属晚年之作，但文风也非平淡一路，相反，其离合操纵、曲折变化还要远过少作，可以视为《进论》的进阶版，所以也同样可供初学模拟之用。

如此一来，吕祖谦将目光聚焦在《进论》与《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吕祖谦不仅在篇目选择上独具只眼，其排列次序也自有用意。从宋刻本《增注东莱吕成公古文关键》来看，前三篇文章（《晁错论》、《范增论》、《秦始皇扶苏论》）的评语最为详细，此后诸篇的评语数量明显减少，到最后三篇文章（《倡勇敢》、《韩非论》、《孙武论》）则几乎没有评语，前后差距极大。这显然是有意为之。据此推测，吕祖谦应当是将《晁错论》等三论视为重中之重，他想通过仔细剖析这三论来揭示苏文写作的奥秘，将研习苏文之法传授给学者。可能在他看来，士子如果真能熟读这三论及其评语，其实也就能够大致把握住苏论的特点了。所以在此之后，他往往只用三言两语点出要害，而不再逐字逐句地分析。这应当也是希望士子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真可谓用心良苦。

《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换言之，据现有材料看，是吕祖谦第一次从大量苏文中遴选出少数篇目，然后再施以评点，以便士子研习的。这自然十分考验选家的功力与眼光。仅就篇目选择

而言,《关键》的苏文选目在苏文编选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选目极少、极简又极精,当时以及后世古文选本的苏文选目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关键》的影响。因此,上文不嫌辞费,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楼昉所编名为《崇古文诀》(以下简称《文诀》)。其成书时间约在嘉定八年(1215)以后。^[14]此书卷二十三至二十五选入苏文15篇,包括上书3篇,策、记、铭各2篇,论、说、碑、赞、制、祭文各1篇。与《关键》相比,《文诀》的选目有两个特点:一是涉及文体众多,共有十体;二是重视上书,其中《上皇帝书》篇幅极长,接近万言,一篇相当于数篇,而且被楼昉置于最前,可见其重视程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诀》虽然只选了一篇历史人物论,但是它所关注的仍然是各体文章中的议论成分,这一点与《关键》毫无二致。不仅如此,上书这一文体也完全可以视为策论的延伸。宋人陈说便曾说:“今日以论策取士,观其异时之崇论宏议也。”^{[15]4323}

正指出了两者的相通之处。所以,可能恰恰因为有师承关系,楼昉才在篇目选择上有意避重,以免落入《关键》的范围,与此同时,他还新增了不少其他文体的作品,以弥补《关键》之不足。这就使得《文诀》在继承《关键》编选精神的同时,又具备与《关键》不同的特点,可以并行而不悖。

周应龙所编的《文髓》,约成书于绍定五年(1232)至宝祐四年(1256)之间。

^{[16]108}其卷六至卷九收入苏文35篇,包括论12篇,记10篇,上书、祭文、状、赋、铭各2篇,策、序、神道碑各1篇。《文髓》所选以论最多,占34.3%,在论之中,又以历史人物论最多。这与《关键》的倾向完全一致。这12篇“论”文,有7篇是历史人物论,其中5篇与《关键》相同,另外2篇也出于《关键》重视的《进论》当中;另外5篇,包括4篇程试论与1篇主题论,其中《王者不治夷狄论》这篇程试论已见于《关键》,《文髓》之所以增多程试论,应当也是受此启发。总之,可以肯定,周应龙在编选《文髓》时受到了《关键》的影响。至于重视记体,其原因在于宋代的记文与前代相比,叙事日益减少,而议论逐渐增多,陈师道甚至说“今之记乃论也”^{[17]309}。因此,表面上是重视记体,

但实际上关注的还是其中的议论部分。

谢枋得所编的《文章轨范》(以下简称《轨范》),成书时间最晚,约在度宗初年(1267~1275)。^{[18]16}其书选入苏文12篇,包括论6篇,碑、赋各2篇,书、铭各1篇。《轨范》所选6篇“论”文全为历史人物论,而且均见于《关键》。如果再加上《潮州韩文公庙碑》,一共有7篇与《关键》相同,重合率高达58.3%,受《关键》影响可谓最深。

通观四家所选苏文,就数量而言,多数在15篇左右,最多如《文髓》不过35篇。这一数量与苏文选本相比可谓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就极大地减轻了士子的阅读负担,使得他们可以悉心研读,以求时文写作之法。就文体而言,论体的地位最为突出。在《关键》、《文髓》、《轨范》三书中,“论”所占的比重都是最大的。而且,四书中入选超过2次的篇目共13篇,其中论占了6篇,包括《范增论》(入选4次)、《荀卿论》、《留侯论》、《晁错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秦始皇论》(均入选3次),也超过一半。值得注意的是,这6论全部都已见于《关键》,而且有5篇是出于《进论》、《志林》中历史人物论。可见吕祖谦重历史人物论的选择,成为了后世选家在编选苏文时的主导倾向,其选目也为后世选家所继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清人张云章说当时的古文选本如《文诀》、《轨范》等“皆东莱先生开其宗者”^{[19]133},诚非虚语。

最后,还有必要对苏文在各选本中所占的比重与位次作一交待。这将帮助我们了解在当时整个时代环境中苏文影响的大小。《关键》选录唐宋八家文共62篇,苏文占25.8%,居于首位。《文诀》收入先秦至宋代48位作家之文共193篇,苏文占7.8%,居于第三,仅次于韩文、欧文。《文髓》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五家之文共74篇,苏文占47.3%,不仅居于首位,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另外四家,“尊苏”之意最为突出。《轨范》选录汉、晋、唐、宋15位作家之文69篇,苏文占17.4%,居于第二位,仅次于韩文。不难发现,在各选本中苏文数量的排名始终位居前三,在《关键》与《文髓》中更居于首位,地位十分显赫。根据这一情况,如果说苏文在南宋科场之中产生了巨大

影响，苏轼其人甚至一度成为对时文写作影响最大的古文家，大概并不为过。

二、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评点及其指导作用

当然，若古文选本只有选文，它与苏文选本仍然没有本质区别，士子依然难以通过直接阅读白文来领悟时文写作的技巧。因此遴选篇目还只是选家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施以评点，这才是教导士子以苏文学时文的关键。

评点包括评语与圈点两部分内容。其中评语这一形式直接源于科举考试中考官对时文的批语，从这一角度说，评点正是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产生的。^[20]因此，评点古文的初始目的就是为了指导时文写作。与编选的情况一样，吕祖谦的评点也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关键》中，吕祖谦通过使用灵活多样的评语注解与相对稳定的圈点符号，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文章的主意要语与结构脉络。此后各个选本评点的内容与形式虽然仍有发展，但是总体而言没有突破吕祖谦所确立的范式。因此，本文将四家的评点视为一个整体，综合分析在选家眼中阅读苏文对写作时文有何指导意义，而不再分开讨论。

（一）提示立意之法

南宋时文高手陈傅良说：“凡论以立意为先。”^[21]此处之“先”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时间先后上说，立意是写作时需要最先准备的一个步骤，只有确定了主旨，才好落笔行文；二是就重要性而言，立意是写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立意的高下决定了一篇文章的优劣。陈傅良甚至还说：“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21]由此可见立意的重要。因此，选家在辅导士子阅读之时，也尤其强调关注文章的立意。如吕祖谦便说：“看论须先看主意。”^[22]他们或以夹批与长抹标明主意，或以题下总评与尾评概括主旨。借助这些形式不同的评点，士子在阅读之前就可以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有一个大致把握，从而迅速进入状态，在读完之后也可以通过这些评语重新回顾文章的内容，可谓一举两得。

不过立意之法千变万化，在选家看来，苏文的立意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对于时文写作而言，苏文在立意方面最值得

学习之处在哪里？在这一问题上，周应龙说得最为明白。他一再强调苏文有心翻案、刻意出奇的特点。如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云：“此书亦翻案体。说着用兵，人皆以败为不幸，胜为大幸。公独以胜为不幸，败为大幸。即谚所谓‘姜在树上生’是也。”所谓“姜在树上生”，是指偏要把生在地里的生姜说成长在树上。这里用来形容苏轼以战败为幸的观点，与一般认识截然相反，几近于颠倒黑白。又如评《留侯论》云：“主意在一‘忍’字。亦翻案体。”评《庄子祠堂记》云：“人皆以庄子为诋孔子，而公独以庄子为助孔子，出人意表之议论也。”也都指出这一特点。其他选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翻案”一词总结归纳，但是他们的关注点与周应龙无异。如吕祖谦评《王者不治夷狄论》云：“看上说戎狄，全无分解处，人皆以为如是重深绝不治处。今乃出人意外而说戎如此，乃见其笔力高人处。”楼昉评《范增论》“方羽杀卿子冠军”一段云：“发明人所不及。”也都指出苏文立意不蹈常习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23]的特点。

以《留侯论》及其评点为例，周应龙认为这篇文章是“翻案体”，是因为一般在讨论张良偶遇圯上老人、获得《太公兵法》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比较关注它的传奇性，乃至认为圯上老人是神仙之流，他传授给张良的《太公兵法》也是一部奇书，而且此书在张良辅佐刘邦获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就明确说：“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24]后世对于此事的看法也基本如此，很少有不同意见。但是苏轼却另辟蹊径，别出眼目。他认为圯上老人只不过是“秦之隐者”，而且用意也不在传授兵书，如此一来，几乎完全消解了此事的传奇色彩，从而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使人可以从其他角度讨论此事。然后他从“忍”字切入，并紧紧扣住此字论说。谢枋得剖析得最为详细，他说：“主意谓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气刚，不能涵养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铁锤击秦始皇之类，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之取履纳履，与之期五更相会，数怒骂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气，教之以能忍也。”这样寻找一个缝隙，从他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的确能够跳出原有的论说框架，进而得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诚可谓新巧奇警。而通过阅读选家的评语，士

子也可以对此篇的立意及其方法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但是有心翻案、刻意立异在论证上显然有极大的风险,稍不留神,就会露出破绽,留下被他人攻击的隐患。而苏文的立意之所以比较成功,就在于他善于弥补这些奇论险论可能产生的漏洞,始终可以自圆其说,既能够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生成反常合道的奇趣,真正令人耳目一新。而选家在归纳主意之时,也尤其注意展现其论证过程。就《荀卿论》而言,荀子其人,历代都颇为推崇,《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将之视为可与孟子并称的大儒,韩愈也认为其人“大醇而小疵”^{[25]37},而苏轼却说“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26]101},予以酷评。那么,他是如何论证这一观点的呢?谢枋得评云:“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不喜之论,故其道历万世而不可易。荀卿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历诋天下之贤圣以自是。李斯学其学无忌惮,有甚于荀卿者。”这则评语就清晰地揭示出此文立意的三个环节。首先,从正面高度肯定圣人立言之平易正直。其次,将荀子与圣人进行比较,对荀子提出批评。最后,将荀子与其学生李斯比较,拈出“异说”、“高论”四字,指出李斯继承了荀子之学而变本加厉,其破坏先王之法源出荀子。换言之,在此文中,苏轼以圣人为参照,突出了荀子的不足,又以李斯为参照,说明了荀学的流弊。如此一来,就在历史长河中给予荀子一个准确的定位,断定了荀子的功过。其论点虽然十分苛刻,但又让人不得不承认其中确有合理之处。而借助类似的评语,士子也可以了解到苏轼如何从某一主意生出多个段落,如何以多个分论点支撑起总论点,从而掌握立意之法,在考场中写出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

(二) 详析遣词之法

至于遣词,则是时文写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因此,选家在提示立意之法外,也尤其注重剖析苏文的遣词,以便士子取法。综合来看,诸家评语涉及结构章法、文势脉络以及炼句下字等多个方面,难以尽述,在此只能择要言之。

其一,是在谋篇布局上注重抑扬结合。吕祖谦评《荀卿论》云:“此篇前面说荀卿不好了,后面略放一步与他,言荀

卿亦是一个贤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评《范增论》则云:“这一篇要看抑扬处……大凡作汉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说他好,后面须说他些子不好处。此论前说增不足道,后却说他好,乃放他一线地。”这两则评语都强调在总体布局上要能够抑扬结合论说人物功过。谢枋得评《秦始皇扶苏论》亦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这一观点明显继承自吕祖谦。谢氏还指出,在运用这一方法后,“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因为虽然文章的主要观点已经确定,但是借助结尾部分的抑扬作一反拨,可以使文章在山穷水尽之处忽生变转、突起波澜,避免呆板平滞的毛病。而且论难一概,运用这一方法也能够使观点本身变得更为客观公允、圆融周密,富于辩证色彩,不致于落于一偏。

其二,是在具体行文时多用曲笔斡旋。以《范增论》为例,吕祖谦评云:“渐次引入难一段,曲折。若无‘陈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杀卿子冠军’一段去,则文字直了。无‘且义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后见曲折处。”在此论中,苏轼先抛出了范增当于何时离开项羽的问题,然后自设问难,批驳了范增当在劝项羽杀刘邦不成之时离去这一观点,“渐次难入”。在此基础上,苏轼“微露正意”,提出了范增当于项羽杀宋义时离去的观点。不过在此之后,他却不继续申说,反而宕开一笔,写道:“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也。”^{[26]162}换言之,他为了指出项羽之败在弑义帝,先以陈涉之兴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以立义帝两事作为陪衬,“欲说义帝,先说陈、项”。不过本文主要并不为了说义帝,而是说范增,那么此处引入义帝的目的何在呢?苏轼接着写道:“且义帝之立也,范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同祸福也。”^{[26]162}如此一来,就揭示出了义帝与范增性命休戚相关之处,令人恍然大悟。故楼昉评云:“项羽杀宋义,便是要迫义帝,弑义帝便是要去范增。盖宋义是义帝所爱,而义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关涉,推原得出,笔力老健,无一个字闲。”

其三,是运用设身处地、将无作有之法。吕祖谦评《范增论》云:“大抵文字

要用无作有说，须渐引入，转无为有。”楼昉评《倡勇敢》亦云：“看东坡文字，须学他无中生有。”谢枋得在评《晁错论》《范增论》《秦始皇扶苏论》时也一再申说这一观点。可以说，选家都相当强调要学习苏文的“将无作有”之法。那么，什么叫做“将无作有”呢？谢枋得解释得最为详尽，他评《范增论》云：“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大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若只能责人，亦非高手，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如弈棋然，败棋有胜着，胜棋有败着，得失在一着之间。棋师旁观，必能覆棋，历说胜者亦可败，败者亦可胜，乃为良工。”换言之，就是要把自己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通过大胆的假设与合理的想象，为论说对象出谋划策，提供一个最为妥帖恰当的处置方法。通过运用这种历史情境化的解释方式，作者就可以完全摆脱史迹的限定，看到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从而化虚为实，拓展文境。此处仍以《范增论》为例，苏轼谈及范增在项羽杀宋义后应如何处置这一问题说：“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项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26]¹⁶³谢枋得评云：“此一段最妙，乃无中生有、死中求活。”正揭示出其关键所在。此前苏轼已经论证了范增当于项羽杀宋义之时离去的观点，这里更进一步，提出了“力能诛项羽则诛之”的处置方法。这段文字于史无征，完全是空中结撰，但行文既雄健有力，论断更明晰斩截，既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确令人耸动。借助此法，苏轼将文章推向了最高潮。应当说，历史发展的轨迹当然不可能改变，但是写作文章恰恰需要假设，而苏轼把这一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而不论是运用上述哪一种方法，其最终形成的风貌，都可以归结到吕祖谦在《关键》卷首的“看苏文法”中拈出的“波澜”两字上。所谓“波澜”，本指水波起伏，这里形容苏文多转折，有如波浪一般有起起伏伏。这种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效果既是苏文最具特色之处，也是时文写作所追求的效果。而士子在初学作文之时，不必说难以做到行文富于波澜，甚至还会有前后断裂、文思艰涩乃至无话可说

等各式各样的毛病，因此苏文堪称对症之药。士子如果真的能够结合评点钻研苏文的话，自然不难领悟其立意遣词之法，进而写出曲折斡旋、夭矫百变的时文，“笔下无竭源，亦无窘步”^[27]，真正可以在考场上应对自如。因此，对于时文写作而言，评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沟通苏文与时文的关键所在。

三、南宋古文选家编选、评点苏文的影响

在吕祖谦编选、评点苏文之前，世人所能接触到的苏文都是白文形态。而这一文本形态意味着没有人规定应该如何阅读苏文，观者自可以无拘无束、各随所得，当然，这也同样意味着没有人做出任何引导，读者也未必能够从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专为应举的士子而言，在登第之前，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受到科举考试的制约，夸张一些说，他们所学的一切都是为了科举考试服务的。因此，这些应举士子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阅读苏文，他们阅读苏文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学习时文写作。因此，就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沟通苏文与时文的读本，可以让士子在阅读之后能够迅速掌握时文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换言之，即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的成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古文选家陆续开始编选、评点苏文。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将眼光聚焦在少数篇目特别是历史人物论上；二是通过卷首的读法以及总评、圈点、眉批、夹批等多种评点形式，揭示苏文在立意、遣词方面的特点。所谓“少则得，多则惑”，选家如此编选的确在最大限度上减轻了士子的负担，而且它们在每篇文章之前、之中、之后所给出的提示，也的确能够将抽象的写作理论融入到具体的文章当中，有助于士子领悟苏文中与时文相通之处，从而掌握立意、遣词之法。如果借用“副文本”这一概念来说，^[28]古文选本中的评点也属于副文本，它们附着在正文之上，与之共生。这就塑造了一种与白文截然不同的崭新形态。在此之后，士子们不再会陷入在浏览白文时仅凭一己之力、暗中摸索的困境，阅读这些带有评点的文本，就好像得到了吕祖谦、楼昉等人的亲自辅导。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相当于视力模糊的人带上了一

副眼镜,使得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苏文有资时文之处,由熟知读法而领悟作法。有些选家更直接从时文角度出发审视属于古文的苏文。如谢枋得评《王者不治夷狄论》云:“此是东坡应制科程文六论之一,有冒头,有原题,有讲题,有结尾。”即借助南宋试论的程式术语以解析苏文的章法结构。由此可见,选家的编选与评点都呈现出鲜明的科举导向。这的确缩短了苏文与时文的距离,为士子以苏文学时文提供了方便。作为载体的古文选本,堪称沟通苏文与时文的桥梁。此后古文选本就在南宋科场中迅速流行开来,实属必然。

在开篇时已经提到,南宋初期苏文在科场之中相当流行,时人都认为阅读苏文有助时文写作。在《关键》中苏文所占比重居于首位,就是明证。而古文选本的出现,更使这一观念得到了强化。谢枋得评《范增论》时即强调:“后生只熟读暗记此一篇,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下笔作论,必惊世绝俗。”在评《秦始皇扶苏论》也说:“今人作场屋程文论,当以此为法。”都强调苏文对于时文写作的指导意义。鲁迅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29]¹³⁶古文选本也不例外,它对扩大苏文在科场中的影响有重要作用。进而言之,由于选家编选、评点苏文是出于指导时文写作的目的,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也不限于苏文本身,而是注意从苏文的写作实践中总结规律。苏文评点中涉及的翻新出奇、抑扬结合、将无作有等多种写作方法,在后世已经成为论体文写作的通则。如明人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归纳出多则文章作法,其中尚论成败则、一正一反则都直接沿袭自谢枋得对于苏文的评点。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些规律和现在议论文写作的原理加以比照的话,会惊异地发现其间相通之处极多。换言之,选家从苏文中提炼出的一些基本文法,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不过由于时文写作本身的功利性,这就使得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与评点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摆脱功利的色彩。因此,这项工作虽然对苏文的流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弊端。由于选家在编选、评点苏文时始终以科举为导向,这就使得他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文体也就是论体上,而忽视了苏轼其他文体的

写作。不仅如此,选家对于探讨苏文议论方法的兴趣,也要远大于他们对议论内容的兴趣。选家的关注重点一般都落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就是为文之法上,而不是特别留意文章的思想价值。当然,即便是以法而论的话,此法也应该有多个层面。苏轼曾自评其文说:“(吾文)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26]²⁰⁶⁹

这里涉及到的就是文章写作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至法,但是选家所强调的议论之法,显然与此无关,他们拈出的大多是一些基本的行文法则,而这自然会对士子的阅读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埃夫拉尔在论述副文本的功能时指出:“副文本能够激发读者的一种期待。”^[30]⁵¹具体来说,副文本是读者在阅读“正文本”之前所遭遇的一个“前文本”,它具有一种导读的功能,可以让读者形成一种“前理解”,这一“前理解”能够直接影响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而评点作为一种带有深深的科举烙印的“副文本”,它们虽然可以部分地揭示苏轼构思行文的情形,使其写作方式变得具体可感、有迹可循,但是同时也将士子对苏文的理解局限在与时文相关的范围内,抹杀了苏文的丰富内涵。朱熹在谈到吕祖谦的批选时就曾质疑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

^[31]³³²¹正指出了选家以一种僵化死板的眼光审视苏文的毛病。因此,对于进一步理解苏文而言,评点已经成为一种阻碍了。总之,在古文选本的影响下,士子在阅读苏文时也难免形成重法而轻义、重论体而轻其他的不良倾向。明人钱士璠在《苏长公集选序》中所说的“而世腐儒小生辄举一二论策为便举子,便以尽长公”^[32]⁶²⁸的流弊,当发端于南宋。

钱穆在谈及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时指出,唐以下“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33]³¹,因此可称为“科举社会”。而这一社会形态的最终定型是在宋代,所以在宋代之后,绝大多数士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够踏入仕途、飞黄腾达。而写出像样的、能让考官认可的时文,则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应举士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时文写作,他们的一切阅读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南宋古文选家通过编选与评点的方式教导士子以苏文学时文,也

是这一社会形态下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时文化的剖析方式有利有弊,但是由于切于实用,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中下层士人对于苏文的接受情况,可以视为他们理解苏文的一种底色。

注释

[1]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

[2]关于苏文与科举关系的研究,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五章《宋代科场的学风与文风》第三节《南宋初中期:由谀佞回归欧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2~469页;高津孝《明代苏学与科举》,收入《科举与诗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159页;付琮《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以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第六章《苏文选本与文学教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78页。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8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

[6]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

[7]关于《关键》的研究,可参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8]巩本栋推测《关键》为吕祖谦在“乾道末所编而于九年冬成书、次年春刊行”。参见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7页;巩本栋《南宋古文选本的编纂与文体学演进——从〈古文关键〉到〈文章正宗〉》(未刊稿)。

[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1]苏辙《苏辙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章《宋代的科举时文:策论》第二节《策论的命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9~292页;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第八章《宋朝贡举考试内容》第三节《命题与答卷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2~442页。

[13]赵德麟《侯鯖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关于《文诀》的研究,可参李建军《宋人古文选评之典范——〈崇古文诀〉选评特色及价值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李由《〈崇古文诀〉版本新考》,《文献》2017年第4期。

[15]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

[16]李由《宋代文章学论考》,南京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17]何文煊《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参见叶蕾《谢枋得文章轨范综合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19]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0]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六章《评点论》第三节《科举与评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3页;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0]陈傅良《止斋论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2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2]魏天应《论学绳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3]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2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5]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6]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7]高塘《唐宋八大家钞》,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28]热奈特在《隐迹文稿》中曾列举“副文本”的范围,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性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都属于“副文本”(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弗兰克·埃尔拉夫则认为“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都属于“副文本”(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两家所说大同小异。

[29]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0]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32]祝尚书编《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

[33]钱穆《国史新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

杨曦,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轼禅诗赏析十题（二）

周裕锴

六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
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庐山温泉》

元丰七年，苏轼过庐山汤泉，见壁上有僧可遵题诗曰：“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苏轼读罢虽然喜欢，但觉得在禅学上还有可议之处，于是作七绝一首。因此，苏轼这首诗与其说是和作可遵诗，不如说是翻案。

前两句针对“禅庭谁作石龙头”二句提出疑问：“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如果说石龙头虽有口，而没有水的根源，那么又怎能自在地吞吐温泉呢？“根”字既指水的根源，即温泉的根源，又双关佛教六根之说，即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楞严经》卷六说：“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然而此就“有根”而言，若是“无根”，则既不能返其源，更不能成解脱。所以反过来说，流泉既可吞吐，则其口理应有根；既可自在吞吐，则其根理应返源而成解脱，否则如何能“自在”？进一步而言，若说石龙口有根，那么此顽石凿就之龙头何来根性？若说石龙口无根，那么此流泉又如何能自在吞吐？这两句问语相比于可遵原诗的写实，显然有更深的哲理意味，涉及到一根返源与解脱自在之间的关系。

后两句也是问语形式：“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这是针对可遵“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两句而发。垢，既指人体之尘污垢物，又为佛教术语烦恼之异名。清净而无垢染，称为无垢，也称无漏。苏轼有次在泗州雍熙塔下洗浴时，写了首《如梦令》词：“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虽是游戏之作，却可看出苏轼的佛学思想。词中关于水与垢的描写，来自佛教万法皆空的观念，万法由因缘而生，无有自性，无自性故空，即以空为性。以空为性，所以清水与尘垢

“两俱无有”。这两句诗也表现了同样的道理，若按照万法皆空的观念，则众生本无尘垢，而汤泉也无寒温之分，哪里还谈得上“清冷混常流”。所以苏诗这两句可看作是对可遵誓愿的解构，“直待众生尘垢尽”的大言，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明白这一点，方可悟得“自在流泉任吐吞”的真谛。

七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赠东林总长老》

元丰七年五月，苏轼游庐山，夜宿东林寺，与住持长老常总禅师讨论“无情话”，有所省悟。第二天早上，呈献这首诗偈与常总禅师，以示机缘相投（事见《五灯会元》卷十七）。东林寺，是庐山名刹，为东晋高僧慧远法师的道场，虎溪在寺旁不远处。元丰三年，宋神宗诏改东林律寺为禅寺，江州郡守请常总住持。常总是黄龙慧南的弟子，属临济宗黄龙派南岳下十二世。

苏轼与常总夜论的内容已不可得而知，不过所谓“无情话”的讨论可能与唐代南阳慧忠国师“无情说法”的言论相关。“无情”，佛教指无生命无情识之物，与“有情”（众生）相对。《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认为“墙壁瓦砾”这样的无情之物，照样可以说佛法，“他炽然常说，无有间歇”。我们可推测，苏轼在东林寺时，听到虎溪溪声，终夜鸣响，看到庐山山色，长年青翠，一瞬间觉悟到“无情说法”的真谛。

“溪声便是广长舌”，虎溪水声淙淙流淌，源源不断，不正像佛祖以广长舌说法滔滔不绝么？广长舌，是佛的三十二相中的第二十七相。《大智度论》卷八曰：“是时佛出广长舌，覆面上至发际，语婆罗门言：‘汝见经书，颇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语不？’”溪声鸣响如佛翻卷其广长之舌，这是有声的说法。还有一种无声

的说法，这就是“山色岂非清净身”。清净身，是指佛的三身之一“法身”，即清净无相之身。既然“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那么眼前的青山为何不是法身呢？既然“墙壁瓦砾”可演说佛法，那么眼前的青山为何不可演说佛法呢？所以青山虽然静谧无声，同样可以“无情说法”。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十称此两句：“以溪山见僧之体，以广长舌、清净身见僧之用。诚古今绝唱。”

“夜来八万四千偈”，极言溪声山色“炽然常说，无有间歇”，所说佛偈多不胜数。在佛经的语言系统里，“八万四千”不是实数，而是极言数量之多。《施注苏诗》卷二十一注曰：“《楞严经》等‘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八万四千母陀罗臂’，皆记佛法门之数。”然而，苏轼虽然领悟到溪声山色“无情说法”之意，但此“八万四千偈”只有在此时此刻的虎溪庐山才能真正体会，在离开当下的见闻之后，“无情说法”再也无法向他人演示传达，所以诗的结尾称“他日如何举似人”。举似，意思是举给、举与。就这一点而言，苏轼的看法与禅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观念相通，即自己个人当下的禅经验难以在他日“举似”他人。

总之，苏轼凭借这首“投机偈”被禅门的传灯录追认为常总禅师的法嗣，列在临济宗黄龙派南岳下十三世。葛立方评价说：“如此等句，虽宿禅老衲不能屈也。”（《韵语阳秋》卷十二）然而，宋代的禅门老宿并非都认可此偈。据《罗湖野录》卷下记载：“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与乌巨行禅师为方外友。曾尝于坐间举东坡宿东林闻溪声呈照觉总公之偈：‘溪声便是……’程问行曰：‘此老见处如何？’行曰：‘可惜双脚踏在烂泥里。’曾曰：‘师能为料理否？’行即对曰：‘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八万四千偈，明明举似人。’二公相顾叹服。”乌巨行禅师不仅将苏轼的七言诗压缩为五言诗，而且在末句使用翻案法，将苏轼的反问句改为肯定句。又如圆智证悟法师读了苏轼偈：“通夕不寐，及晓钟鸣，去其秘蓄，以前偈别曰：‘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五灯会元》卷六）证悟法师批评苏轼参禅乃凭借溪声山色，未能透过声色之关，未能在无山无水之处真正获得解脱。

这首偈在明代禅林才遇到真正知音。达观真可禅师说：“众生不悟言说法身，而为文字所转。如悟言说法身，则不必离言说而求法身也。眉山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

净身。’则言说法身与色相法身无别也。岂惟色相哉？鼻之所臭，舌之所尝，身之所触，意之所知，谓之臭味法身、触法法身，亦不悖初言说法身也。故灵云见桃花而悟道，楼子听曲声而明心，良有以乎！”（《紫柏老人集》卷七《楞伽山寺大藏阁缘起》）这就从六根、六识相通的角度，论证了苏轼以溪声山色为“无情说法”，与灵云见花、楼子听曲等公案在佛理上异迹同趣。

八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这首诗自宋以来传播极广，直至今天，中小學生也耳熟能详。常见的诗歌赏析认为，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游山所见。因为庐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变化多姿，所以游人所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相同。庐山山形总体而言是南北走向，如果横着看过去，即从东或西看，山形就是并肩排列的坡岭；如果侧着看过去，即从北或南看，山形就是峻峭陡立的险峰。同样的道理，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看到的景象也完全不一样。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游人为什么不能辨认庐山的真相呢？是因为身处庐山之中，视野为峰峦沟壑所限，只能看到山的某个局部，具有片面性。游山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是如此。人们所处地位不同，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然有局限性。只有超越狭小的范围，避免自己的偏见，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这是今人的普遍看法。

历史上有些学者从儒家认识论角度解释这首诗，比如宋人陈善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见愈大，天下之理，固自如此。虽然，孔子岂但登泰山而后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于是也。东坡尝用其意作庐山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知此则知孔子登山之意矣。”（《扈虱新话》上集卷一《因登山而感所见》）明人杨慎说：“予尝言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处于物之外，方见物之真也。”（《丹铅总录》卷一《宋儒论天外》）这样解释自然有其道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赠东林总长老》作于同时，题在与东林寺邻近的西林寺壁上，写作场景在佛教寺院里。而且“真面目”

三字,也来自禅宗,即禅籍常说的“本来面目”。因此,此诗的哲理便更多与佛禅智慧相关。诚如黄庭坚所说:“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冷斋夜话》卷七)那么,这“般若”是从何表现出来的呢?

苏轼在诗里谈到观察庐山的局限性之时,其实已暗含超越这种局限性的哲理。孔子登泰山,无论站得多高,即使是在绝顶,仍然处于“此山中”,只不过是高处往下看而已。杨慎所谓“处于物之外,方见物之真”,既然站在此山之外,则不能见出此山中的真相细节。跳出“身在此山中”的视觉限制,真正认识“庐山真面目”,这只有般若智慧能够做到。因为这智慧超越了任何一个视觉角度,超越了横看侧看或远近高低看,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观照。苏轼同时代的沈括讨论画山水时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梦溪笔谈》卷十七)正可借来说明苏轼的观照立场。

“以大观小”之法,源于佛教的周遍法界观。《楞严经》卷四:“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站在周遍法界的立场,就再也没有观照的局限,庐山的本来面目再也没有遮蔽。明僧智旭更从万法唯心的角度解释此诗:“诗中有事有理。约事者,谓身在山中,不能尽见庐山全境,故曰‘只缘身在此山中’也。约理者,东坡乃悟道之人,即事以显理也。侧看成峰,横看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者,谓侧看横看。远近高低。皆是心性所成。‘不识庐山真面目’者,不识心性本来面目也。‘只缘身在此山中’者,身在此心性中故也。《楞严经》云:‘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现物也。’”(《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卷一)既然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现之物,那么“庐山真面目”又如何还能隐藏呢?这就是苏轼笔端所吐的不传之妙。

九

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

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之一》

这首诗是《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的

第一首,组诗前有小序曰:“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守钦原作是《拟寒山十颂》,因此苏轼的次韵也可看作是“拟寒山诗”。我们知道,“拟寒山诗”始于五代法灯禅师,后来成为僧家的重要写作传统,文人亦有模仿者,如王安石曾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

苏轼这首次韵诗,有意识仿效寒山诗嘲世悯俗的内容。首联“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是说世上的荣利争夺皆极为渺小,毫无价值。赵次公注:“《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蛮氏;右角曰触氏,争地而战。’高祖破项羽。又淳于梦入槐安国,为南柯太守,既觉,乃一大槐树南向之枝也。《左传》:‘滕侯、薛侯来鲁,而争长,卒长滕侯也。’”也就是说,这两句由四个典故组合而成:《庄子》里的“蛮触之争”,《史记》里的“高祖破项羽”,《南柯太守传》里的“槐安国之梦”,《左传》里的“滕薛争长”。方回评此两句曰:“‘左角’以言争,故以‘破楚’系之;‘南柯’以言荣,故以‘长滕’系之。”(《瀛奎律髓》卷四十七,下引方回语同此)既然“破楚”的胜利如同蜗牛左角上的征战所获,“长滕”的荣誉如同槐树南柯上的梦中功名,世上种种伟业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其他等而下之的争夺,更是极其无聊。

接下来的颌联、颈联四句,描写了怜悯浊世众生的种种善行:帘钩挂起门帘,让乳燕自由出入;纸窗上开个洞,让痴蝇得以钻出去;怕老鼠挨饿,故意留点剩饭;怕飞蛾扑火,故意不点灯盏。“钩帘”句化用杜甫《题桃树》诗“帘户每宜通乳燕”。“穴纸”句化用《景德传灯录》卷九古灵神赞禅师的公案:“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为鼠”句虽无典故,然而鼠之偷食剩饭乃日常所见。“怜蛾”句是化用熟语“飞蛾扑火”,《梁书·到溉传》:“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总之,乳燕无知,痴蝇迂执,老鼠贪婪,飞蛾愚蠢,皆为众生贪嗔痴的写照。而钩帘、穴纸、常留饭、不点灯诸种行为,则是对此愚昧众生困境的慈悲解救。方回指出:“中四句燕、蝇、鼠、蛾,皆悯世之迷,为作方便之意。”苏轼从小受其母程夫人影响,厌恶杀生,怜惜动物,不残鸟雀,纵鱼放生,这四句所写未必皆实,但其戒杀的观念却有据可循,如其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诗《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

客，呼网师迁之西池……戏作放鱼一首》等等，皆可证。

然而，苏轼在此诗里却认为，以上这些充满怜悯之情的慈善行为，只是小乘佛教的做法，并未领略到大乘佛教的真谛。“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集注引李白书“崎岖历落可笑人”，并不准确。因为李白书作“嵌崎历落可笑人”，乃用《世说新语·容止》中语：“周伯仁道：‘桓茂伦，嵌崎历落可笑人。’”意指卓异不凡的可喜之人。“嵌崎”不同于“崎岖”。此处的“崎岖”，形容曲折委婉之情，如古乐府《西乌夜飞》：“感郎崎岖情，不复自顾虑。”（《乐府诗集》卷四十九）此指“未能忘情”乃至矫情，所以说“真可笑”。正如方回所说：“然区区如此，亦小乘所为，非上乘也。”显然，苏轼在次韵酬答定慧长老守钦时，自谦对佛教的理解，还处于小乘僧的水平。不过，这正是诗人谦逊的美德，并不意味着他真是“小乘僧”。诗僧惠洪曾指出：“唐沙门道宣通兼三藏，而精于持律。持律，小乘之学也，而宣不许人呼以为大乘师。”虽然道宣甘以小乘自居，然“竟能为百世师”（《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隆道人僧宝传》）。也许，苏轼的自我定位也当如是观。

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答径山琳长老》

这是苏轼的绝笔诗。径山琳长老，法名维琳，湖州武康人，俗姓沈氏，为沈约之后，好学能诗。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请维琳住持径山，其后退居铜山，自号无畏大士。其事见《补续高僧传》卷十八。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自海南北归，行至常州，病重。维琳自杭州径山前来探望，作《与东坡问疾》偈：“扁舟驾兰陵，自援旧风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维摩诘。我口吞文殊，千里来问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七月二十六日，苏轼作此诗次韵答之。

“与君皆丙子”，苏轼与维琳同龄，都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各已三万日”，此是大略言之，非精确统计。王十朋注引飞卿曰：“《年谱》：先生生于景祐三年丙子，卒于常州，乃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实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万日，举成数耳。”

“一日一千偈”二句，这是用后秦高僧鸠

摩罗什的典故，以赞誉维琳诗偈的机锋。《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毘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维琳当然未必日诵千偈，苏轼这里只是借罗什事喻指其平生诵偈无数，且作偈无数，皆机锋迅疾，如电光一闪，不容诘问。苏轼《金山妙高台》诗曰：“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又《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诗曰：“乐全老子今禅伯，掣电机锋不容拟。”又《和蒋发运》诗曰：“夜语翻千偈，书来又一言。”屡屡称赏禅者诵说千偈，机锋如掣电，不容拟议思考。维琳《与东坡问疾》偈有“我口吞文殊”之句，自诩机锋不容小觑，所以苏轼答以“电往那容诘”之语。

“大患缘有身”二句，是回答维琳“问疾”之事。《老子》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苏轼借用《老子》的说法，认为疾病的产生，皆是由于自己执着于物质组成的身体。如果意识到“无身”，如《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现身有疾而说法那样，意识到“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意识到“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我所”，总之，意识到身体的虚妄性，那么，使人忧患的疾病将不复存在。

“平生笑罗什”二句，意谓自己将平静地迎接死亡，而不相信那些神妙咒语的治病效果，平生一直觉得鸠摩罗什的做法非常可笑，所以维琳长老也用不着再说偈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鸠摩罗什试图用神咒挽救生命，可谓枉费心力。苏轼在病重时，借用罗什将终时事，酬答维琳的问疾，表达了自己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这真达到了悟透人生、任运随缘、临终不乱的境界。周焯《清波杂志》卷三记载：“径山老惟琳来问候，坡曰：‘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细故尔。’后二日，将属纆，闻根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也就是说，苏轼写下这首绝笔诗后不久，耳朵逐渐听不见，气若游丝。后两日，这个千年不遇的旷世天才便离开了人世。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熊朝东《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序

张志烈

2016年4月，三苏祠修缮后新开馆，我曾以一首小词《蝶恋花》致贺：

奕奕纱縠容岂小。坡颡而还，文化光芒绕。千载读书人未少，华章飞舞芬芳草。世界仰瞻人满道，堂殿新辉，万紫千红笑。宵汉惊雷声不悄，振聋发聩驱烦恼。

因为2005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迁址眉山三苏祠时，我曾喜赋《蝶恋花》并用坡词“花褪残红青杏小”韵，故此词复用前韵；而在2017年11月贺眉山第八届东坡文化节时又再用前韵。

这首词的上片几句话，是我近年来积压于心的一点情愫，忍不住冲口而出。清代后期一位名声很大的书法家，在乐山留下一副对联，其上联以轻蔑的口气问道：“江上此台高，自坡颡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对嘉眉地区从宋至今的文化状态这么看，在当时就不够全面，在今天就更不符合事实了。所以，我大声地回答：“千载读书人未少，华章飞舞芬芳草”。

远的不说，我相信会有人研究的。自从1980年9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成立并召开首届学术研讨会以来，在眉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由眉山与全国各地协同主办的大型苏学研讨会已有数十次。在此过程中，眉山的文化学者研究队伍稳步地充实壮大，研究领域与时俱进地扩展拓新，研究成果量与质都不断提高。特别是2017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眉山

人在宏扬三苏文化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新的认识和体会，随之更有新的举措和努力。我说“华章飞舞芬芳草”，当然首先是指眉山学人的琳琅满目的著作，我曾对一些媒体说：“眉山是全国三苏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想说的这一点，也是我对嘉眉地区当代文化建设成就的感受。

与眉山文化界的朋友交往快四十年了。我的总体感受是如坐春风，得益匪浅。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各有鲜明个性，又各有独特文风。但使我最感亲切的是他们那由眉山地理历史文化的熏陶积淀而来的东坡式的灵气与情韵。王勃说“人杰地灵”，孔子说“里仁为美”。人与他所处的环境不可分。现代传记学研究明确认为：天才只诞生于各自的特定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美的事物包围中长大的。东坡故里的美的濡染，体现在他们学习钻研三苏文化遗产中那种昂扬的传承乡邦文化的激情、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尤为使我钦佩。

几个月前，熊朝东先生告诉我，他的这本新书已完稿，希望我能为之作序。虽然我年过八旬，身体有各种毛病，家里和社会上又还有些推脱不掉的事务，但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其一，是他的执著的钻研精神和勤奋作风确实使我感动；其二，是我心存愧疚。他已经出版了有关三苏文化的著作十余部，现在还马不停蹄地投入新时期东坡研究的项目，献上新

的成果。真使我油然而敬。在多年的接触中，出于他的诚恳心意所希望于我的事，皆未如约。比如：很久以前，他想约我共治苏词，因我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处境困难，无法应允。他把百万字的《大写三苏》巨著赠我，希望我写点评议文字，而我因老伴癌症手术加上其他病，诸事干扰，后来竟未能执笔。凡此，我都一直愧疚于心。《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想到这些便觉得此事既是我义不容辞应当做的，也是历史提供给我的绝好的学习机会，没有理由不同意。

近十年来，我在各种场合都爱引用王水照先生在三苏祠的题辞：“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研究、弘扬东坡文化精神的著作，不断涌现。万紫千红总是春。牡丹的富丽，不会掩盖海棠的浓艳；玫瑰的鲜娇，也不能取代紫罗兰的幽芳。从整个文化生态看，各类著作都有其存在的需要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文化的发展传播还有一条深层次的规律，就是永远要立足于当下的认知和社会现实需求去探寻那更具揭示性、更简便、更灵巧、更有创意、更富吸引力、更能激发受众心志的新的传导方式。这是时代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借用前面引用王水照先生话来说，就是当下的研究与传播，应该朝争取说得“更全”“更完”“更透”的方向努力。

全、完、透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就在我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有关爱因斯坦“名言”的文章。其中说爱因斯坦是被引用其名言最多的科学家，但在流传中有些话是走了样的甚至是误传的。该文举证说有一条流传颇广的话：“事情应当力求简单，不过不能过于简单。”该文考证说，这并非爱氏原话，而是从他另外一句的确说过的话断章取义而来。他的那句原话是：“不应否认任何理论的终极目标都是尽可能让基本元素变得更加简单且更少，但也不能放弃对任何一个简单数据的合理阐释。”（见2018年5月5日《参考消息》《西媒盘点·那些爱因斯坦没说过的“名言”》）比爱因斯坦早二千多年的我国《老子》四十八

章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根本精神与爱因斯坦所言完全相合。人类认识史上，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认知，总会超越时空而打通联系起来。苏辙《老子解》释“为学日益”四字时说：“不知道而务学，闻见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为累也。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老子解》释“为道日损”四字时说：“苟一日知道，顾视万物，无一非妄。去妄以求复性，是谓之损。孔子谓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以一以贯之。’”后来，苏辙晚年所作《藏书室记》中也说：“《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贯之者，可得而见也。”

结合老子的话，苏辙的话，爱因斯坦的话来理解，我们可以体会到，任何学识之进步，都首先要博闻广见，积累真知，多多益善。在此基础上，更要不断审问明辨，概括归纳，精思提炼，推断打通，总结升华。孔子说的“予以一以贯之”的“一”，老子说的“为道日损”的“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的“儒者多闻而寡要”的“要”，韩愈讲治学“提要钩玄”的“玄”，陆象山言“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的“本”，这些概念，与爱因斯坦讲的“基本元素”可以看成是同一等级的范畴。老子说“损”，爱因斯坦说“简单”，是因为自然的真理和人生的真理从本质上看都是深刻而简单的。以体悟东坡文化精神为例，我曾提出要在三个领域不停地深入探究下去。其一，是东坡的全部著述。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二，他一生投入生活实践而成就的全部事功，其中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深邃智慧和崇高精神。其三，他的强大的人格魅力、生命形迹（含遗址、遗迹、遗物等）在历史时空中的投射延展、振荡回响。今天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应能以自己精细的感官，敏睿的才智，活跃的心灵，游走在这三大领域中去感受和体验“苏海”的无穷的美，则“更全”“更完”“更透”的妙悟自在其中了。

我怀着如是的期待，断断续续地拜读完书稿，于是产生了下面几点想说出来话。

我感到朝东这本新作，有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博学贯通，集中归一。

作者多年勤恳攻治苏学。举凡三苏著述，前贤论说，当代研究，无不虚心研读，思考体会。故在本书叙述中，对每一具体时段，具体事件，都能集中有关史料，鲜活地还原情景。更能将分散的感人之点，串联集中，以加强对人物内心的深度理解。如第十一章《丧亲之痛》中，叙到王弗逝世时，先叙说苏轼与王弗共同生活期间各种生动情事，引出《亡妻王氏墓志铭》全文，又对《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详细解说，并引陈师道评赞语“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为结语，又引十六年后在黄州时，苏子明之子来省，苏轼送姪安节归十四首短诗之一：“东阡在何许，寒食江头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水到渠成，作者总结一句：“可以说，王弗一直活在苏轼心里，一生不曾相忘。”作者有此精到体会，方有此感人之语。又如第二十九章《山雨欲来》，写到苏轼从扬州回朝时之心态：“苏轼接到朝廷诏令，只能苦笑。两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又要回到朝廷那个政治旋涡中，而这次回京已非往昔，朝廷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状：主持‘元祐政事’的高太后，病体缠身，常常数日不临朝；已经成人的哲宗皇帝端坐龙庭，他表面恭顺幽默，而内心对高太后极为不满。窥伺已久的熙丰旧臣，见时机已到，便乘机构造言语，在哲宗面前诬奏元祐大臣诋毁神宗，尽变神宗法度，以离间皇帝与高太后的关系。”类此的叙说，穿透每一时期的政治风云，看清矛盾的实质，使人物所处环境如棋局，而内心的忧伤得以鲜明呈现。再如第二十一章《五日登州》，先写途经密州的种种情事，展现苏轼与老百姓的真挚情谊。到登州首写“巡视登州边防设施与水军”情况，详细译解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的内容。复写调查所见，再绎解《乞罢登莱榷盐状》的生动事例和苏轼的坚定主张及其德政延至清末之事实。到此，引述清代盐政碑中记载：“有宋时，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世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政绩也。”又引清人王文诰评云：“公无不言事之官，兹以五日之京兆，而两状所陈若此，足见其规模宏远矣。在高密时，深以议京东榷盐为

非，逮一过文登，就便动手，亦见其机警而手辣也。”这一切都集中凸显出苏轼在任何时候都关怀国计民生！这种博学贯通、集中归一的叙述方式，全书到处都呈现。如写密州任上，议罢手实法的前前后后，详研史实，还原事状。又写这时期精神特点，从《后杞菊赋》入笔，联系《书刘庭式事》，张耒《杞菊赋并序》，直到《超然台记》的详析，展示了苏轼当时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思想发展、精神风貌，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又如第二十九章写到王闰之去世，在一般容易忽略处，聚积了众多材料（参阅第三十二章最末自然段），深入展示人物美好心灵。此类例多，不再枚举。

其二，详明背景，深探因果。

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不是偶然的，而产生在真真实实的因果链条之中。苏轼的“黄州惠州儋州”，并非他的“宿命”，而是他思想、精神、性格与历史演化的某些力量碰撞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苏轼一生，首先应理解这场碰撞的必然性。本书第十二章《悲剧序幕》就叙说了这个最大的背景和最深的因果关系。文章从宋初的财政、国防说起，讲清“岁币”的由来，“三冗”的产生，国穷民贫的残酷现实，庆历新政的失败，王安石的变革主张及其受神宗的任用以及他用人的必然失误等，作者以广博的观察和精细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评论：“最终，变法的发展和走向逐渐演变成激烈的权力之争，由此便产生了新党与旧党。新旧党争所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涡流，必然冲撞、淹没变法的实质内容。到后来，变法的实质已彻底变易。事实跟神宗和王安石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们誓欲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雄心，却被一帮寅缘求进的‘勇锐’小人变成了政治上的投机。对历史而言，王安石变法没有错，这是历史运行的必然，历史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而其‘党争’余祸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不绝，这是历史的悲剧、王安石的悲剧，也是苏轼的个人悲剧。”下文简要地分析了苏与王在变革主张上的“三不同”：一是变法目的不同。王只为“富国”，而苏则处处“为民”。二是任法与任人。王安石走极端，重任法而不注重任人。苏则深知任人不任法和任法不任人皆有大弊

病，主张“人法并用，轻重相持”。三是渐变与急进。苏对欲速则不达有深刻的哲理认知和实践体会。王则明知不能“急进”而在实际行动中完全走向反面。这“三不同”注定了双方不可调和的对立。作者说：“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苏轼既不属于‘旧党’，也不属于‘新党’，他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坚持原则的个体。”本书中叙说每一事实，绎解每一诗词都注重说明背景，探究原因。如第十四章讲到《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写作时，既说明他一贯“忧国忧民”之初心，又详叙了当时宋辽在边界上军事、外交的复杂斗争，使读者体会其重大历史意义。又如第十四章叙述苏轼初到密州，写《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将密州蝗灾旱灾严重性上奏朝廷时，将苏轼自为官以来所见蝗灾之重、官吏之不作为、人民之苦难，详实描述，使人如见其状，如闻其声，深刻展示他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现实面前忧心如焚的心境。又如第十六章《湖州惊魂》中，写乌台诗案苏轼被逮之前，先对李定、何正臣、舒亶诸人的卑鄙行迹作具体的揭示，纵深用笔，展露事件之来龙去脉，有引人入胜之效。全书类此处亦多，兹不赘列。

其三，精到解析，思彻古今。

全书讲东坡，讲宋代，但眼光却专注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如第十四章《万古超然》中，由苏辙《超然台赋》引出苏轼《超然台记》，对全文精神重点绎解后，总结说：“这篇《超然台记》……标志着苏轼一生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一次重要转折和飞跃。是他生命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生活的磨练，尤其经受新党派人物的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朝廷‘补外’，急于舍身报国壮志难酬的深刻反思，自身个性的把握，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福与祸、物与欲、喜与忧的对立转化关系。从而较系统地提出正确处理人与物关系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确立，标志苏轼思想的成熟——迈向‘超然物外’的旷达处世态度。是他以后战胜整个生命运行中所遇到大大小小劫难的思想武器。”下文以开阔的笔墨，历叙司马光、文彦博、文同、张耒、李清臣等与超然台的文字关系，元明诸人的题咏，历代对超然台的重修（只

清代就有七次），2009年的最新一次重建。最后叙写当代密州人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与苏东坡《超然台》的“特别情份”，引用臧先生《仰望苏轼》文中那特别亲切、特别崇敬的话语作结，最后几个字是“苏轼，他的业绩，他的声名，却万古超然！”整个这节文字，集中精萃资料，详叙历史事实，分析文情，神思飞越，读来真有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感受。又如第三十章《定州戍边》中，写到苏轼在定州所作大盆景“雪浪石”时，先引《雪浪斋铭并引》，交代基础事实。复引《次韵滕大夫三首》中之《雪浪石》全文，见此诗之雄姿奇横，语语挺拔，大气鼓荡。于是作者分析说：“苏轼一生对石头情有独钟。他最早的诗作中就有一首著名的《咏怪石》，以‘怪石’高风亮节的品德和不畏权势的铮铮铁骨之气自喻，其‘怪石’‘雷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是苏轼一生的写照。当他在定州又得此奇石，回视自己当前的处境，虽然仕途危艰，命运有不测之忧，但其胸襟如雪浪之无垢，其精神似雪浪飞空，不为命运所折困。这才是苏轼钟爱雪浪石的真谛。”简短数语，说明了东坡喜爱雪浪石的深刻含蕴。据《墨庄漫录》载：东坡南迁北归时，张芸叟守中山，葺治雪浪斋，重安盆石。后闻东坡逝世，曾作哀词：“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本书又补充交代：明万历八年（1580），真定令郭衢阶在定州发现原盆，万历十年原石也为知州唐祥兴发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州知州韩逢麻将盆石移至众春园内。清代乾隆皇帝是宋以后历代帝王中最崇敬苏轼的，曾六次驻蹕定州，对东坡雪浪石咏诗达三十余首，还命画家绘制了四幅《雪浪石图》。这一切说明什么呢？东坡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投射延展，对中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东坡平生的遗址、遗踪、遗物，也和他的宏伟大著述、光明事功一样，提示我们看到东坡文化精神在历史天空中的飞腾变化，气象万千。雪浪石是其中一个典型。

其四，片言居要，警句生辉。

陆机《文赋》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

之警策。”片言居要则众词效绩。凡文章必有一段或数语为一篇精神所团聚处。所谓警策，乃是通过辛勤的观察阅读、研究、思考、贯通，对所论事情能抓住根本点，说到要害处的很简洁很精要而很有力量的语言。如第十八章《躬耕东坡》，在写完黄州生活，将其特定生存环境的状况、成因、影响作了分析之后，激情点赞说：“我们似乎看到历史在这里停步，时间在这里凝结，是要让苏轼在这段动容的岁月里，升华他生命中最完美的诗篇。黄州五年，是苏轼享受生命乐趣的五年。这是历史赋予的五年，也是留于后世百读不厌的五年。”又如第十九章《一路行吟》，写苏轼离黄后的吟唱时说：“苏轼激越的情怀与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旦相融，便佳句迭出，传诵千古……每一座山峰，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会激发他的灵感，都会让他有创作的冲动，都会使他对生命有更深的感悟。”又如第二十四章《高风亮节》中，讲到苏轼与司马光在“尽废新法”问题上的争执，引用了《与杨元素书》：“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作者赞云：“苏轼就是‘不随’，因为这个‘不随’，使他在政治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这个‘不随’，他的人品高洁才光耀千秋！”读到这里，真有掷地有声之感。又如第二十八章《烟花三月》中，写到苏轼由颍州调任扬州时的心态，作者分析说：“他虽然面对变幻莫测的仕宦险境而‘不自惜’，虽然‘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可一个彻底的民本主义者的胸襟包容了所有对命运不测的担忧，牢固的民本思想使他昂然阔步，跨越他人生旅程中的不幸，他一如既往，为民解困鼓与呼。民本思想使他内心世界无比敞亮，为国计民生而终生努力不息。像苏轼这样的人，是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的初心。”苏轼被打不倒是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这是走进苏轼内心世界的关键。再如第三十二章《痛失朝云》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情不自禁地写下精警的结语：“对王弗的情感侧重于‘其言多可听’，一曲‘十年生死两茫茫’，尽诉心曲，惻然动人。对王闰之的情感侧重于夫妻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的患难之情。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所作《菩萨蛮·新月》、《菩萨蛮·七夕》两词，尤为感人：‘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无人知，愿人无别离。’‘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无不充满对王闰之的感激和赞赏。对王朝云的情感侧重于精神上的慰藉与交流。虽然三种情感侧重不同，但仅以一个‘情’字是无法包容苏轼伟大的‘人性美’，无法包容‘两妻一妾’在苏轼生命运行中的无私付出。苏轼为他们付出一腔挚爱真情，她们完美了苏轼人生意义的真谛。”全书类此警策语还多，不再枚举了。

以上四点，是我在阅读书稿中对本书行文特色的粗浅感受，自己都觉得说得“不全”“不完”“不透”，我还将继续学习、思考。

就全书而言，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幅背景鲜活清晰而形神真切丰满光辉的东坡画像。

作者在绘画时，每一笔都深挖道理，饱蘸感悟；一切叙述描写都在显示东坡的精神风貌；全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走进苏轼的内心世界！

《论语》开篇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抱着这个态度，读东坡的著作六十多年，总是心存感激。感谢伟大的乡贤苏东坡先生。感谢今天我们这个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时代。感谢朝东先生提供给我的这一特殊学习的机会。是为序。

2018年7月28日于成都锦江区橡树林路
碧鸡书屋

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俯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六）

——历代对苏轼《易传》、《书传》、《论语说》的研究

舒大刚

第三节 “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

一、东坡《书传》的卷数和主要版本

苏轼青年时期即对《尚书》有所研究，其应制举献《进策》，即有《书论》一篇，后来又陆续对《尚书》中的重要议题撰有专论，如“乃言底可绩”、“圣谗说殄行”（俱《舜典》）、“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始终惟一，时乃日新”（俱《太甲上》）、“王省惟岁”（《洪范》）、“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洛诰》）、“惟圣罔念作狂，惟克念作圣”（《多方》）、“庶言同则绎”（《君陈》）、“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亦克用久”（《周官》）、“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毕命》）等（见于《苏轼文集》卷6），但集中反映其《书》学成就的则是晚年所作《书传》。

如前所述，《东坡书传》成于海南，宋代重要目录书都有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东坡书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亦13卷。万历《两苏经解》本为20卷、明末朱墨套印本亦20卷。诸家著录亦多作20卷。据《苏轼文集》卷66《与郑靖老》（三）：“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检阅也。”则其13卷本较接近其书原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之误也。”此说实误，今传各明刻本都作20卷。其实《四库全者》所著录本为20卷，馆臣撰提要时也作20卷，后来纪晓岚删定《总目提要》，依据《宋志》的13卷来否定20卷，是没有必要的。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郑堂读书记·补逸》都有驳正。据张海鹏考察，无论是13卷，或是20卷，“书之首尾既全”，“卷帙之分合于说经要旨无关

耳”（《学津讨原》本《东坡书传》跋）。可见，《东坡书传》初撰成时本为13卷，后来因卷帙过重，又分为20卷了。

元符三年苏轼获赦渡海北归，“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当时世间“未有别本”；到常州又把“《易》、《书》、《论语》三书”“尽以付”钱济明，其所“携以自随”和交付钱济民的都是抄本。宣和中，除《东坡易传》在蜀中有刻本外，《书传》、《论语说》皆以写本存世。南宋和元儒《书》学著作，屡屡称引苏氏《书传》，其间有没有刻本不可考。不过，根据明嘉靖年间胡直（1517～1585）《书苏子瞻书传后》所述，似乎直至明初尚无刻本：“昔唐荆川先生（顺之）语予曰：‘曾见苏子瞻《书传》乎？’曰：‘未也。’‘盍求之？’岁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诸乡大夫张中丞，得其写本读之。……乃归其本张公，而寓书其末云。”“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此前唐顺之要胡直求苏子瞻《书传》而未得，至此时胡按部眉州才在“乡大夫张中丞”家寻到《书传》“写本”。万历丁酉（1596）毕侍郎刻《两苏经解》，焦竑《东坡易传序》说是从“荆溪唐中丞（亦即唐顺之）得子瞻《易》《书》二解”，汇而刻之，是为《两苏经解》，这是迄今可见的《东坡书传》最早的刻本，其时上距胡直接蜀32年。如此看来，焦氏从唐家得到的“子瞻《易》、《书》二解”，其中《书解》可能是胡直从蜀中带回的副本。

今存善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三种：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年间刻本”《东坡先生书传》20卷，有缪荃孙收藏印记。王据《艺风堂藏书续记》，认为即《两苏经解》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有“《东坡先生书传》二十卷，明刊本”

一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明万历……本,皆二十卷。”也许就是此本。《两苏经解》本是后来最为流行的本子。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指出:“瞿氏目录有焦竑刻《两苏经解》六十二卷,其中《书传》亦二十卷。”该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是以后各种《东坡书传》刻本的祖本。

二是“明朱墨印本”,题名《东坡书传》,20卷,卷端有凌濛初所辑杨用修、袁了凡、施承庵、沈则新、子渊(陈深)诸家评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称“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东坡书传》“闵刻朱墨本”。该朱墨本是闵刻,抑或是凌刻,具体不详,也许与《东坡易传》的情形相同。彭元瑞《天禄琳琅阁书目后编》卷12载有“乌程闵齐伋所刻”的朱墨本《东坡易传》,王重民《善本书提要》怀疑其“不知为凌刻,抑或为闵刻”。似乎《易》、《书》两传的朱墨本都有闵刻、凌刻之争。

三是《津逮秘书》本,为毛晋所刻。并有《秘书》“零本”传世。

清代版本主要有三:一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续录》著录“清顺治刊本”。二是张海鹏《学津讨源》本。三是《四库全书》抄本。三本皆20卷(《总目提要》作13卷,实误)。此外,还有各种明、清写本尚多,兹不备列。

二、《东坡书传》的学术价值

苏轼为文主张“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晁绎先生诗集叙》)。他耗费后半生心血撰著的三部经学著作,自然更是如此。他撰《易》、《书》二传和《论语说》的原因,除了中国知识分子想“立言”以垂不朽的共同目的外,也有其欲“中当世之过”的现实目的。此书的学术价值,可概括如下:

第一,力矫时弊,驳正王氏“新学”。《东坡书传》所要针砭的“当世之过”首先就是当时由王安石“新学”引起的穿凿附会学风。晁公武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其说为多。”(《郡斋读书志》卷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也有类似说法)可见,从原创动机上讲,此书之作有针对王氏“新学”的意图。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力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组织撰写了《三经新义》。熙宁六年(1073)置经义局,王安石自任总提举,

自撰《新经周礼义》,命其子雱与吕惠卿等人撰《毛诗》《尚书》二经义。熙宁八年(1075)《新经尚书义》13卷成,与已成的《周礼》、《毛诗》新义,合为《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用以取士,谓之“新学”。《郡斋读书志》说:“是经颁于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于世六十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谓“王氏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科举之士熟于此乃合程度,前辈谓如脱鞴然,按其形模而出之者”。^{〔1〕}王氏新学以政治高压为手段,以利禄之路作诱饵,一时间排斥旧学,倾动天下,吕祖谦《王居正行状》说,当时“概以王氏说律天下士”,而将“老师宿儒”之说称为“曲学”,“当是之时,内外校官非《三经义》、《字说》不登几案,他书虽世通行者,或不能举其篇帙”。但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并未遵循儒学发展规律,也没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而是纯粹将经学当成现实政治的奴婢,南宋学者汪应辰指斥:“王安石训释经义,穿凿附会,专以济其刑名法术之说。如《书义》中所谓‘敢于殄戮乃以久民,忍威不可讫,凶恶不可忌’之类,皆害理教,不可以训。”(《经义考》卷80张纲《尚书讲义》条引)正切中了他的命脉。南宋时并不反对王安石学术的朱熹也认为“王氏说伤于凿”、“今人多说荆公穿凿”(《朱熹集·续集》卷3《与蔡仲默书帖》;《朱子语类》卷78。又《经义考》卷82蔡沈《书集传》下引何乔新说),正是南宋多数学者的看法。干禄士子,不再认真读先儒传解,只诵习王安石《新义》就可以了;也不需涵泳圣贤经典,只要沿着“新学”路子信口雌黄就足以自出新意。于是世风日偷,“士习胶固”(《直斋书录解题》卷2),全没有学术的尊严。

针对“新学”穿凿傅会之习,一些正直的学者一开始就对“新学”口诛笔伐了,《郡斋读书志》说:“而天下学者喜攻其短,自开党禁,世人罕称焉。”也就是说对“新学”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至徽宗末年废除党禁后,人们更对之不再提及了。如当时范纯仁即作《尚书解》进神宗,以反对王氏新法及新学;文彦博作《二典义》一卷、《尚书解》一卷,洛学首领程颐作《书说》一卷、《尧典舜典解》一卷,也是针对《新经尚书义》而发。当时的苏轼兄弟以其特有的恢谐和幽默,对“新学”也多所嘲讽,邵博《闻见后录》卷3载,熙宁初苏轼通判杭州,刘道原欲刻印“七史”,轼《答刘道原书》:

“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日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鸱，《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之类甚众，大可痛骇！”（按，“有其善，丧厥善”，即《尚书·说命中》文）陈善《扞虱新话》）卷1亦载“荆公于《三经新义》托意规讽，至《大诰》篇则几乎骂矣。《召公论》真有为而作矣。后东坡作《书》、《论语》诸解，又矫枉过直而夺之。”朱戡《萍洲可谈》卷1也有苏辙反“新学”的内容。苏轼居海南，正是“新学”泛滥成灾之时，一种对学术负责的使命感，促使苏轼不惜老迈之躯，犹奋如椽之笔，撰《书传》数十万言以驳正之。犹之乎孟子辟异端、斥杨墨，岂好辩哉，亦不得已也。王十朋有诗：“三等策成名烜赫，万言书就迹危疑。《易》《书》《论语》忘忧患，天下《三经》《字说》时。”（《游东坡十一绝》之八，《梅溪先生文集》卷15，四部丛刊本）苏轼幼子苏过《大人生日》（一）诗：“云何困积毁，抑未泯斯文。欲救微言绝，先惩百氏纷。韦编收断简，鲁壁出余焚。论斥诸儒陋，功逾绛帐勤。”（《斜川集》卷2，校注本）所谓“惩百氏纷”、“斥诸儒陋”即是对东坡撰定三经解用意的明白揭示。

第二，究心世务，言必中当世之过。《四库全书总目》说：“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卷11）《东坡书传》所论多切近人事，特别是当时现实。如《西伯戡黎》“祖伊反曰”云云，他解说：“祖伊之谏，尽言不讳，汉、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祖伊得全。则后世主有不如纣者多矣。愚读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君无诤臣则国亡，人无直友则事败，这连一代昏君纣王都知道，可是自以为圣明的统治者却常常害怕忠言，拒绝纳谏，故亡国破家者不绝于史。东坡借祖伊说纣之事而发感慨，其“后世之主有不如纣者多矣”一语，其实是有感于自身遭遇而发。《秦誓》“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东坡解：“至哉，穆公之论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龄，后一人似李林甫。后之人主，监此足矣。”忌贤妒能，壅明蔽贤，不特秦有其人，唐有其例，恐怕更直接的当是苏轼所处的宋代，此番感慨实际是苏氏自己的体验。《周官》篇解曰：“今律令之外，科条数万，而不足于

用，有司请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呜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苏轼反对任法而忽视人才的简拔，正是直接针对王安石新法而言的。都表现了苏轼文章“皆有为而作”的特色。

《东坡书传》中像这样的内容不少，由于议论恺切，言之当理，南宋理学的代表作蔡沈《书集传》俱一一引录，全用其说。“四库馆臣”说：“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又《四库简明目录》说：“盖轼究心经世之务，又长于论说，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轼如水火，而不能不取此书，则大略可知矣。”）程、朱理学诸人，由于洛、蜀党争的缘故，凡事与苏轼作对，但对《东坡书传》却一致给以好评，大加引用，可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东坡书传》的成就已超越学派、朋党利益之上，在更加广泛的学术范围内，赢得了声誉。

注释

〔1〕王氏《新经义》已佚，清人从《永乐大典》只辑出《周官新义》一书，台湾大学程元敏有《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二），从诸文献中辑出其《尚书新义》、《诗经新义》佚文。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裕锴、李熙、李栋辉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出版，精选了诗135首、词27篇。第一次外放杭州时，苏轼甘之如饴，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后贬到黄州时，即使生活拮据，还是喊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气；即使贬到偏远的惠州，他依然笑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最后到了荒僻的海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的豪迈旷达依然未减。

王晋川印象

山流水

王晋川（1952— ），祖籍山西临汾，出生四川眉山。退休前曾任眉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调研员，眉山市文联副主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王晋川弃医从文，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颇能讲，侃侃而谈，条分缕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背地里有人叫他“王八点”，或者避嫌叫他“王九点”，让人忍俊不禁。

王晋川是歌词作者，亦颇能唱，常常演唱自己的作品，尤其宴席上，击席而唱眉山《祝酒歌》，常常把宴席气氛推向高潮。录制歌曲300余首，《因为有你》为抗震感恩歌曲，入选2011年央视春晚。《我爱苏东坡》为全国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会歌，也是眉山东坡小学校歌，童声合唱，旋律优美，深受喜爱。在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上由东坡小学学生在开幕式上演唱，获得专家、领导、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晋川是诗人、作家，其诗集《醒着的玫瑰》（代序）云：“在夏天的那些晚上/我的玫瑰不肯睡觉/睁大眼睛聆听/风穿过楼道的足音/玫瑰在夜色中摇曳/我知道她想唱歌/唱一支给自己听的歌/性感的花瓣如红唇张合/就有一些阳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在我的小屋里悄悄播洒//我醒着/我的玫瑰也醒着/目光相视的那一瞬/有一种温暖在心底升起/没有了初春的骚动/没有了蓓蕾的招摇/我的玫瑰成熟地开放/走过那么多风风雨雨/静静地快乐地开放/该是一份预期的回报//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只想拥有这份宁静/走过每一个花开花落的日子//”他创作文学作品6部、合集15部，创作了大型音乐舞剧《千古东坡》《一醒惊天》《竹韵天下》，作品多次获文化部、广电总局、央视大奖。

王晋川是摄影迷，我们一起去黄冈、常州等地出差，他都带着摄影的长枪短炮。在黄冈，一次开箱包，不小心摔了一个镜头，他一下子叫了起来，心疼极了。在常州，离开的前一天傍晚，我们在返回酒店的车上，一个街巷一闪而过，一座老桥引起了王晋川的注意，他说：“今天光线不好了，明天早上来拍。”我说：“明天早上7:30出发去机场，来得及吗？”他说：“来得及，早点起来。”第二天早上，天未大亮，他就起来敲我的门问去不去，我睡眼惺忪地说不去。出发去机场前，他赶回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步行前往时掐了时间，然后再留足返回的时间，剩下时间便用于拍摄，拍了不少好照片。

在三苏研究方面，王晋川自1987年起，担任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化顾问，三次为三苏祠撰写陈列大纲，参与展陈艺术设计与策划、制作。他曾参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弘扬三苏文化，建设中国诗书城”（2004年度）和“苏东坡全传丛书”（2014年度），出版有关三苏的书籍3部：《苏东坡故事精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东坡味道》（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和《东坡东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王晋川编著的《苏东坡故事精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本书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民间流传的苏东坡故事资料，按时间、地域整理编排，篇幅完整，语言流畅，再现了百姓心目中苏东坡的独特性格和美好形象。通过这些故事，既可以看到人民对苏东坡的热爱之情，又可以看到苏东坡精神在当代的流传与弘扬。如《只认衣冠不认人》颇为传神：

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很多人只知其名，并未见过他本人。有一天，他带着侍女王朝云进城去，刚走进城门口，便听说一群要

进京应试的举子在一间酒楼里吟诗作赋。苏东坡许久没有饮酒唱诗了，心头痒酥酥的，想进去看看，哪知被门口做针线活的老板娘挡了道。老板娘眼睛翻到天上，冷冰冰地说：“举人老爷们作诗，闲杂人等一边玩去。”苏东坡说：“我也喜欢作诗，想去凑个热闹，请老板娘行个方便。”

老板娘把苏东坡上上下下打量了几眼，看他素衣小帽，一身穿得巾巾吊吊的，心想这老头儿酸不溜秋的还想作诗？于是，鼻子一哼，说：“会作诗嘛作一首给老娘听听，看看你是白菜丝还是萝卜丝？”

苏东坡哪里受得了这份气，正要发火，酒楼里走出几个喝得脸红筋胀的举子。他们看了看苏东坡，也不认识这个老头，只是觉得好奇，便请苏东坡随便来首小诗。苏东坡也不推辞，说：“那就请你们出个题吧。”

一个举子指着老板娘用的针线说：“就以这针线为题。”苏东坡哈哈一笑说：“这些针头线脑的小诗，就叫我那丫头去作吧！”

朝云一听，知道苏东坡是要她在这些举子面前露一手，略一沉思，开口吟道：

二分白铁打磨成，一拱一拱往前行。

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

那老板娘听了朝云的诗，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那几位举子听了，大吃一惊。忙问姓名，才知道这素衣打扮、其貌不扬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王晋川著《东坡味道》，现代出版社 2016 年第 1 版。此书是作者在研发“东坡家宴”时创作的诗歌作品集，辑录现代诗 100 首，分四季，即第一季“东坡家宴”，第二季“眉山菜谱”，第三季“乡野食趣”，第四季“大厨印象”。诗集从不同侧面，围绕东坡美食和东坡菜系，诗意展示东坡的美食情怀，抒发家乡人民对东坡的眷恋之情。如《东坡鱼》云：“东坡先生唱罢大江东去/便将那条巨口细鳞的鲈鱼/捉进《后赤壁赋》的夜色中/舀一瓢江上的清风/煮出山高月小的意境//待到鱼汤熬得酃白浓香/款款放入念奴娇的曲牌/临江仙的平仄/卜算子的韵脚/装进渔家傲的食盆//酒是一定要有的/那是润之夫人备下的义樽/否则无法吟风弄月/于是乎一箸鱼肉一口酒/先生渐渐醉入心旷神怡//谁在江上弄箫声/唤醒孤鹤南飞/大千世界先生莫非也

是一条鱼/待游回临皋亭的家门/只见月光如水疏影横陈。”

王晋川著《东坡东坡》，为《苏轼全传》之黄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年第 1 版。全书分十三个篇章：第一章风雪东京，第二章千里赴黄，第三章初到黄州，第四章巴河迎眷，第五章情暖临皋，第六章月上东坡，第七章老农忧国，第八章十游赤壁，第九章书斋耕夫，第十章东坡味道，第十一章一蓑烟雨，第十二章南堂春晓，第十三章泣别黄州，描写了苏轼谪居黄州四年又四个月的艰难岁月。如第三章《初到黄州》云：

有一天晚上，苏轼不知不觉踱出定惠院，来到长江边。一钩残月挂在稀稀疏疏的梧桐树上，一只孤独的鸿雁从夜空中惊慌地掠过，扑扇着疲累的翅膀，在远处缥缈的树丛上空久久徘徊。它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总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枝丫。忽然，它一声长啸，冲天而去，像一片秋叶，飘落在江心的沙洲上。这孤鸿的身影让苏轼看呆了，他觉得那只孤独而高傲的鸿雁就是自己的化身。他的寂寞无人懂，他的痛苦无人知，他那颗滚烫受伤的心无人抚慰，他那颗尊贵高昂的头颅，怎能在世俗的红尘中久久低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

他退休之后，退而不休，比之前更忙。以最近两年为例，2017 年，他参与创作眉山策划的《苏东坡》电视剧本、参加东坡区东坡精神提炼征集活动和首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提交了论文《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今年，创作完成九场民族歌剧《苏东坡》，他听说要召开“苏东坡税收思想研讨会”，又完成论文《三苏与税》，还参加了 2018 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以老当益壮称之，一点儿不为过也。

山流水，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清辉几缕照客眠

杨 惠

盛夏，我伴着骄阳的热情远足山东。对于常居蜀地的我而言，山东仿佛远在群山之外，诸海之滨。可是今夏的头一次试探，它的风土人物就使我震惊，并且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感到欣喜，那时我刚刚从湿润闷热的大西南走来，突然间，茫然的心里涌进了这么一股通透、碧蓝的浸润。山东，齐鲁，彷徨中，我已经几次琢磨着这两个词儿，内心莽莽撞撞地生发出对广博与精深的憧憬。

话超然

站在山东诸城的超然台上，已是黄昏，白天的燥热已经被此时齐鲁的晚风带走了不少，清凉正来。夕阳也正收拾一抹抹余辉，超然台的城墙在夕照中，便渐明渐暗地沉默着。

无语是墙楼，是一块块青灰色的方砖。

我斜倚着高低起伏的墙垛远眺。极目处，腥红的落日在林立的高楼间逐渐低矮着，天边的绯云羞答答的注目着我，注目着超然台。

流云非昨日，楼台亦非往昔。

如今，重修后的超然台坚实、厚重、大气，楼阁飞檐极尽古风，但与此城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两不相宜。我只能将自己沉浸在徐徐而来的晚风中，不说一语，毕竟这楼台的名字还是会令人遐思的。

超然台，名自苏辙择“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声噪于苏轼“以见余之所往而不乐者，盖由于物之外”之语也。

曾经废旧的楼台经苏轼稍加修葺，便成为其与众官员认同的“台高而危，深而明，夏凉而冬温”的“放意肆志”之场所，确有燕处超然之态势。

而此刻，临于台上，光线已是阴暗，我却能感到凉风猎猎而至。周边景物在黄昏的光线中，只剩下淡淡的轮廓。倚在墙头，随风涌起苏轼的“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无欲者有尽”，“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可不大哀乎”。

好一个超然物外，平和生乐，这是苏轼的生活智慧，也是其面对困苦纷争的处事原则。

念及这两日的寻迹游历，更加体会到苏轼的物外之平和，物外之安乐。

一个常山，苏轼曾亲临两次的祈雨之地，海拔不高，只算作蜀客眼中的丘陵。山上几乎种满了矮松，植株还不高大，估计树龄也算不得长。所以即便有形状奇特的，但一言松之奇美，能言及的还是黄山的迎客松。

一个零泉亭，后人护泉而建，仍是仿古痕迹明显。仅泉左侧一突兀岩石，幸许是岁月的凿痕，抑或是人工的雕琢，一把石椅之状，惹得同行友人纷纷攀坐拍照留存。

一眼泉水，顶着烈日寻至，却不过是一尺见方的凹凼。水倒还算清透，但却被落叶斑驳，杂草掩盖，纷乱的紧。

最意外的：一处石碑，赫然刻着“东坡狩猎处”五个鎏金大字，而碑周遭是几株矮松，几丛荒草，还有不远处的几方豆田，颇露荒芜与落败之象。

咦，这些场所哪有苏轼笔下“碧连天，晚云闲”，“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的意境啊，更休说“为报倾城随太守”的那个“千骑卷平冈”的壮阔意蕴。

苏轼，难不成你用生花的妙笔，唬了天下人吗？

凭楼，晚风渐凉，夜已笼来，华灯初上。今夜无月，可巧的是超然台的广场之侧，有一处灯，高挑着点亮。灯光是冷光，如圆月之清辉，清清凉凉地笼罩过来……

思绪在凉风中翩飞，在清辉中跳跃——

超然台，超然物外！

好一个物外，好一个苏轼。

纵使密州苦楚，你也能悠然描绘出“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的画面；“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使人世两隔，你依然在哀楚中开出花来，铭记“小轩窗，正梳妆”的温馨；纵使兄弟久别，你还是在思念的凄楚中沉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后，振臂高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你将困苦融在岁月的酒杯中，一饮而下，而后化作淡然，抬眉一语，便是口吐莲花，“诗酒趁年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

天狼”……

灯光如月，笼罩超然。

凡能超然物外者，莫不是生机盎然者也！

苏轼生命之强光来自于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苦也罢，甜也罢，皆化作生命强大之源泉。曾客居于此的苏轼，便在这清辉一缕中，安然睡去，留下超然台静默在岁月的长河中。

说曲阜

假如是有月的晚上，夜游东方的圣城，那披着清辉的孔庙会有怎样的情景？会不会更有肃穆与神秘之感？

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古今文人雅士朝圣的地方。

李白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王安石云：“虽传古未有孔子，蟪蛄何足知天高”。孔子就是文化人崇拜的楷模，而祭祀孔子的孔庙就处处体现着其文化思想内涵的核心内容之一的礼。那殿宇庙堂，从形式到布局，无不是固化的礼制样式，是需要用心解读的文化符号。

而我喜欢孔庙中成行成排的柏树，它们是生命用树的呈现方式在此站立，三千年风雨雾电中，或握戟，或持剑，或倚，或立，丝毫不懈怠。那孔庙中一千两百多棵的古树就这样地排列以表道，周礼之道由树再次表达。

我想，如果树在月之清辉里，影子就是它们能游走的灵魂，那浸润了儒家思想，周礼之道的文化的魂。它们借风、借雨、借着自然的力量，将根深深扎入这片土地，把枝叶高高擎起，一座座有着生命的丰碑，便会在月色中清晰与高大。

历经坎坷而“许国心犹在”的苏轼，也许就伴着这缕从孔庙透来的清辉，毅然决然地坚定地、从容地在宦海浮沉。

心有所期，便行者无疆。

如果有月，那初探圣地的我，定会在朦胧的月影沉沉中睡去……

万松浦

龙口，原只道有粉丝，毕竟它是全国范围内畅销的商品。现在来此，才知道这里居然有比粉丝更幸运的万松浦书院。

机缘巧合，得幸夜宿书院。

月，真正的明月，终于在这夜圆满而皎洁，倾泻的清辉伴着海风，摇曳着书院的万亩松林，沙沙轻响，月光摇落在草坪上。那草坪上忽隐

忽现的光亮，如大自然轻盈的足尖，舞出一句句好诗，“风月影徘徊”、“月影静摇风柳外”、“风动花枝探月影”。

蓦然想起白日在书院会客厅所见的横匾：

“这里人人皆诗人——张炜”。此刻看来，诗人何止人人，还应有这松、柳、月、风、影……

月下沉思：也只有懂得生活、热爱自然的人，方能守着这万亩松林，不让地产商鲸吞蚕食，诗意便在自然中产生，意趣便在物外生发。念及此，觉得此处也是适合苏轼客居的，不知他见此院此景又会有着怎样的感慨？！但他一定会超然物外，诗意生活，撷一缕清辉香甜入梦！

忽然明白那日青岛观海，我为何激动而兴奋，原是大海的广博与深邃永远有吸引人的魅力；也明白那天烈日下苦登泰山，几近力竭时问顶，便疲乏不再，转而心中迸出的是万物退于脚下的豁然开朗，还有天地间一粒人的渺远与微小。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

没来由的想起零泉亭中的一幅对联：“山川不以人遇不遇而兴云海，君子不以人知不知而敦道德”。

院中有梨树，踩碎月光，我摘取一只品尝，甚涩。但青涩中，分明嚼出月亮的味道——那穿过超然台、透过孔庙，辗转至书院的那抹月光的味道。

那涩，留存在舌尖久了，竟生出甜丝丝的味道。

嚼着月光，我欣然睡去……

杨惠，眉山市东坡区东坡中学教师。

2018 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综述

刘清泉

2018年9月29日,由眉山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的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在眉山举办。主题为“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收到相关论文88篇80多万字,编辑成为上中下三册论文集,海内外学者96人出席论坛。

在上午的开幕式上,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荣誉退休教授唐凯琳女士作了题为《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里的“苏轼”》的演讲,介绍了英国牛津网页中“苏轼”题目下的12个专栏和170条提要的概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衣若芬女士作了题为《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的演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先生作题为《东坡精神的当代价值》的演讲,阐述了温和的改革、思想的包容、人性的尊严、超然的审美、潇洒的人生、智慧的关照、实干的精神、亲和的人性、对女性的尊重等东坡精神的当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冷成金先生作了题为《把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的演讲。

在下午的分论坛上,与会学者分为文化传承研究、文献作品研究和生平思想研究三组,发言与评议结合,交流气氛异常热烈。

第一分论坛文化传承研究,论文大致包括文化精神、接受传播和传承创新三部分。

文化精神的现代阐释包括杨胜宽、安熙珍、胡燕、张建伟、马银华、乔云峰等人的论文,涉及开放精神、饮食精神、清廉品德、当代价值、文化启示、文化使命等,杨胜宽《弘扬东坡文化开放精神,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

从思想开放的本质特征、自主创新的生命力和多元合作的价值取向来论述东坡文化的开放精神、倡导文化建设的开放理念。韩国安熙珍《苏轼诗歌饮食意象里的东坡精神》以饮食为线索,从苏轼诗歌中饮食意象的特征:以饮食取乐、以饮食当药,探讨了苏轼的思想与人生态度:在贬谪中仍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旷达。其他,胡燕论苏轼清廉处事为人、惠民济世的作风,张建伟论东坡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马银华论苏轼经时济世、尊主泽民的淑世精神,乔云峰指出超然台已成为培养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干部教育的良好教材。

接受传播论文有16篇,包括王永波、杨曦、卓夕又、周于飞、林于弘、刘浩渤、肖久艳、孙君恒、何勤华、汪单、喻世华、张爱东、李静、向恩瑞、张思齐、苏慎、杨何银的论文。其中,孙君恒《美国的苏轼研究和传播(2010~2018)》从唐凯琳、本杰明、黛米、詹姆斯、艾朗诺等学者的研究,从专业网站、华人网站、Youtube上的视频等新媒体,以及苏轼翻译家华兹生,概述了美国的苏轼研究和传播情况。何勤华、汪单《英语世界中苏东坡研究再探》介绍了英语世界研究苏东坡的起步、人物、作品、内容和特点,重点介绍了林语堂、傅励君和艾朗诺。喻世华《基于数据库平台的苏轼研究综述(2008~2017)》利用中国知网、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万方数据三个数据库平台,对中国大陆学界2008~2017年以来苏轼研究的数量、质量情况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并就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张思齐《苏轼涉鼠作品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梳理了苏轼涉鼠作品,指出苏轼《黠鼠赋》与十七世纪越南经典《贞

鼠传》有三重契合性,以涉鼠作品为例,论述了苏轼创作对越南文学发生过的触媒作用。张爱东论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王永波论述了南宋三苏文章选本的价值,杨曦以南宋四种古文选本为中心论述了苏轼古文在南宋科场中的影响,李静以晁无咎词为例阐述了晁补之对苏轼的追随,向恩瑞阐述了苏轼自我精神力量的自主觉醒对晚明士人的影响,卓夕又论汪绂的《苏轼论》,林于弘以康轩版语文教材为例介绍了苏轼诗作对台湾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苏慎论苏轼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影响,刘浩渤以东坡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为例探索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肖久艳论述了三苏文化在家庭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另有几篇论文是关于传承创新方面的,如叶升平介绍了浮雕佛寿图的铝合金作品,蒋懿丹论东坡文化元素的陶瓷产品设计,衣若芬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苏轼盘陀塑像的文图学审美,张淘论宋元时代的木假山诗文,刘清泉论与沉香相关的海南风俗并衍生出沉香文化节的策划,张斌论如何在大裴村打造“东坡文旅小镇”等。

第二分论坛文献作品研究,论文大致包括苏诗、苏词、苏文、书画等研究几部分。

苏诗研究部分,台湾陈金现《苏轼有关飞禽的诗》论有关雉、乌鸦、布谷鸟、快活、力作、异鹊、竹鹤、姑恶、蕲州鬼、僧爽白鸡、五色雀、阿滥堆、杏花白鹇、白头翁等苏轼禽鸟诗,剖析其寄托心声与抱负、展现理想与主张的含义。其他,任树民《“白战体”与中国文学体物传统之建构》、阮怡《苏轼与韩国汉诗中的“白战”》均论及诗歌中的“白战体”,王琪《论苏轼抒情诗中的佛经故事》,司聃《苏轼岭海养生诗研究》,商拓、盛洁《试论苏轼诗歌对夸张修辞手法的运用》等。

苏词研究部分,邹建军《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论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认为体现在诗人自我、诗中自然、诗中人文、诗人思想,以及诗中地名等方面,认为来自于所到之处、自然敏感、地理意识、空间建构,认为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其他,刘尚荣《老生常谈赤壁词》,谢安松《苏轼、章

棗杨花词地位升降考论》,罗浩春《苏轼与陆游渔父词之比较》,江惜美《苏轼黄州词人生哲学的探究》,姜晓娟《论东坡词的叙事艺术》,焦宝、彭文良《论苏轼诗词间的问题分工意识》等。

苏文研究部分,乔建功、苏航《读〈东坡先生墓志铭〉札记》依据有关文献,对《东坡先生墓志铭》的石材规模,何人书丹、题盖、刊刻进行了有益的探析和推测,同时比较中肯地阐释了《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写作特点和历史价值。其他,乔建功、王文一《简析〈宋苏轼墓志及其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子勉《〈潮州韩文公庙碑〉与苏轼的用世情怀》,李华康《强弱势文化视野观照下苏轼黄州、儋州的散文创作》,高云鹏《苏轼历史人物评论三题》,潘浩《苏轼诏诰文用典析论》,李剑锋《苏轼论陶诗为李白、杜甫所不及》,程圳生、林冠群论及书画。

苏轼作品整体研究部分,周美慧《论汉语动补结构书面与口语的竞争——以苏氏兄弟文学作品讨论》以苏轼兄弟文学作品语料为例子、以太田辰夫、志村良治与梅祖麟所提出的形式标志“V杀”、“V死”为学术背景,讨论汉语动补结构书面与口语的竞争问题。彭文良论苏轼文学与酒之关系,吴振华论苏轼创作中“破体为文”的现象,赵伟东论苏轼文艺观之三维,朱春洁论苏轼与中国诗歌美学中的“快境”,马蓉论苏轼山水诗的悲剧意识及审美超越等。

第三分论坛生平思想研究,论文大致包括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两部分。

生平研究9篇论文中有4篇为交游考,潘守皎、孙赫男皆论苏轼与晁补之的交游,黄惠菁考苏轼与“圆照”的交游,苏慎论苏辙的师承与交游。吴增辉《苏轼黄州期间的心态演变》根据苏轼黄州期间诗文作品提供的信息,将苏轼的心态演变划为苦闷、超旷、幻灭与归真四个阶段,并逐一考察。其他,郑慧梓论“乌台诗案”的文学重叙,何勇考苏轼栽植松树,孙晓东考苏辙苏谡筠州宦迹,苏青龙探三苏颍昌后裔等。

思想研究内容丰富,涉及乡土意识、佛教情怀、香文化、人格境界、创造力、科技活动、心理结构、贬谪文化、艺术论、休闲观、教育思想、法制思想、税收思想等。陈才智《闻思所及共香煮——苏东坡与海南的香道之缘》认为海南不仅孕就了其特产沉香,也成就了具有沉香性格的苏轼。(下转第79页)

2018 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召开

2018年9月28日至30日,由眉山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的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在四川省眉山市举行。

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主题为“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共收到相关论文88篇80多万字。1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苏轼研究学者齐聚一堂,集思广益,交流研究成果,从依法治国、廉政建设、科技强国等角度诠释东坡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当下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9月29日上午的开幕式上,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荣誉退休教授唐凯琳女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衣若芬女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冷成金先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先生,分别作了题为《英国牛津网页数字化书目录里的“苏轼”》、《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苏东坡》、

《把东坡文化文旅项目建成川南的旅游目的地》、《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的主题演讲。在9月9日下午的分论坛上,与会学者分为文化传承研究、文献作品研究和生平思想研究三组,发言与评议结合,交流气氛异常热烈。

与此同时,还举办了2018四川音乐周,主题为“音乐点亮生活”,活动包括眉山城市音乐会专场和东坡音乐节两个部分。9月29日上演的眉山城市音乐会专场,以苏轼诗词作为节目创作蓝本,通过精心编排,以歌唱的形式展示苏东坡多首经典诗词作品。10月1日至3日的东坡音乐节,有200余名国内外艺人演出国际国内优秀的流行、民谣、摇滚、电子音乐及汉服古风歌曲。东坡音乐节期间还举办了东坡国漫展、三苏集市、国风文化展、三苏文化长廊等活动,让百姓感受音乐艺术魅力,感受东坡文化的厚重和多元,领略眉山民俗文化的特色。(有余)

(上接第78页)沉香的皮朽而心香,正可作为苏轼历难而不屈性格的最佳写照。藉由其咏香诗文的书写,苏轼与海南结下不解之香缘,他将传统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国香道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庆振轩《苏轼与“说诨话”探论》论苏轼说诨话的诙谐个性,从谐谑趣谈、探寻奥秘和个性魅力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有5篇论苏轼的税收和法律思想。眉山市税务局“苏东坡税收思想探析”课题组从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和核心内容三个方面阐述,指出苏东坡具有参用所长、轻税薄赋、从价计税、利商安商的税收思想,颇具现实意义,值得借鉴。余红艳论苏轼税务思想、实践、反思及意义,袁丁论苏轼对榷盐的危害及对盐政的建议,何勤华、李琴再探苏轼法律思想,彭林泉论苏

轼《三法求民情赋》中的慎狱恤刑观。其他,刘晗论苏轼的家园意识,马强比较苏轼、陆游巴蜀地理情结的差异与意义,杨吉华论苏轼的佛教情怀,海滨论苏轼解证互济的人格,张国文论苏轼的创造力,王友胜论苏轼的科技活动,李常生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宋颖论苏轼的情理结构,方星移论黄州贬谪文化,马琳探苏轼道家式的艺术论,张翠爱论苏轼的休闲观,胡先酉论苏轼修身立人的学校教育思想等。

由于分论坛交流时间短暂,无法展开深入讨论,让与会者意犹未尽。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第 23 届苏轼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东坡诗云：“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东坡 14 次路过常州，终老于此，与常州有不解之缘。经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研究同意，决定第 23 届苏轼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至 21 日（星期日）在江苏常州召开，由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和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承办。素仰您学殖深厚，长期从事苏轼与东坡文化研究，特邀您以文会友，共襄盛举。

一、会议主题

东坡精神与常州文化

二、参考论题

东坡与常州关系研究

东坡的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研究

东坡文学与文献研究

东坡与江南文化的关系研究

东坡文化研究：酒文化、茶文化、养生文化、医药文化、美食文化

东坡的人物交游研究

常州市东坡文创产品开发与旅游线路打造研究

三、格式要求

题目字体，黑体小三号、居中；正文，宋体小四号；引文（独立段落），楷体或仿宋体小四号。段落行距 20 磅。注释格式请参考《文学遗产》。

四、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 1801 号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五、联系人

韩舒立 手机：18516315044 电子邮箱：shulihan2018@sina.com

张瑾 手机：13921071357 电子邮箱：zhangj@jsut.edu.cn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2018 年 11 月 1 日

2018 年发展会员名单

经会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以下学者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林于弘 台湾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文学博士

黄惠菁 台湾屏东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阮怡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刘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焦宝 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赵伟东 哈尔滨商业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邓子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潘守皎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

左芝兰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

胡立新 黄冈师范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

刘永涛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任永辉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胡燕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周奎生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

谢仿贤 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姜伦 安徽省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赵贵堂 大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工程师

苏青龙 河南三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